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拉美文化璀璨之謎



引 言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翻开地图，呈倒三角形的南美大陆会映入眼帘。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吸引了多少个探求者的目光。然而，对我们来说，她似乎是太陌生而又太遥远……

这册《拉美文化璀璨之谜》将会帮助我们走进拉美，亲眼目睹古老的印加帝国、拉丁化的神秘大陆以及亚马逊河的一泻千里、潘帕斯草原的牛羊牧歌和火地岛的冷雪寒冰……当您领略过巴西的桑巴、阿根廷的探戈、智利的奎卡舞，读完那风情万种的风俗文化、人文地理和各国的经济历程后，您会重新想起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拉美是一片文明的沃土，勤劳智慧的土著人民给它涂上了印第安的底色。随后，殖民者的黄金欲和宗教狂热摧毁了古老文明的殿堂，这儿成了拉丁化的世界。然而，文明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血与火的历史使民族意识迅速复苏，铸造了文明的新生，拉美诸国在告别殖民时代后，走上了色彩纷呈的发展之路。这巨大的历史变迁将使我们启迪智慧、开阔视野。

从地理上讲，拉美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委内瑞拉、秘鲁等众多国家。虽然本书难以向您一一展示她们的风姿卓韵，但它至少会在您知识的宝库里添上一块小小的彩砖。

拉美文化璀璨之谜

第一章拉美文明的底色古老文化的绝韵

一、崖壁上的记忆——巴西、秘鲁的崖壁画

长期以来，几乎令所有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倍感迷惘的是：在拉美没有发现任何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和化石。是文明的真空还是记忆的丧失？面对这一片扑朔迷离的大陆，学者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然而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渐拨开了这团迷雾：远古的人类不仅存在，他们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创造——崖壁画。迄今为止在拉美发现的崖壁画已有多处，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巴西和秘鲁境内的发现上。

皮奥伊州崖壁画。

1963年，在巴西皮奥伊州东南的一个无名小城——圣·莱蒙特·诺纳托附近，考古学家们首先发现了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址和岩石上的崖壁画，这一发现引起了很大轰动。1969年，在人类学博士尼那德·凯顿的率领下，欧美学者互相配合，对皮奥伊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有重点的发掘工作，结果发现了多种大型动物和花粉的化石，这为我们研究远古巴西的物候无疑提供了最重要的科学材料。向时，这些发现也表明：数万年前的巴西东北部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水草丰茂，是适合人类和动物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1990年7月，考古学家们终于在层层石灰岩块中发现了一具人骨化石。经研究表明，这具化石是一位四十多岁并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距今约一万年左右。根据她身旁有用火的痕迹，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妇女是当时正在用火取暖时被掉下来的石块砸死的，而且还可以乐观地估计，在岩石下面也许还掩埋着她家族成员的化石，而发现他们，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皮奥伊州地处半沙漠性气候的高原山区，长年的风化将高原的许多地方削为平地、溪谷和绝壁，绝壁之间残存着部分平形岩块，绵延数里。考古学家们正是在这些平形岩块中发现了印第安人最早的文化创造。至今在皮奥伊地军共发现了三百三十个遗址，其中二百六十个有崖壁画。据碳—14测定，这些画多是距今五万至三千年间的作品。由于当时的巴西气候湿润、草茂林密，于是各种野生动物和狩猎活动成了崖壁画的主要题材。狩猎劳动的生活体验为作者们奠定了艺术创作的写实基础，他们往往以突出特征性部位和省略细小部位的手法来描绘动物，不仅形象而且精巧。

崖壁画中廝科动物最为常见。由于鹿生性机敏、动作快捷，猎人们要捉住它并非轻而易举。为了让青年狩猎者便于识别和掌握技术，就有必要用绘画的方式来突出猎取鹿的情形。一幅名为《回首》的壁画便是这种作品：可怜的鹿在猎人的追赶下拼命逃奔，尽管它跑得很快，然而胆怯却使它不住地回头观望，也恰恰就在这一瞬间，它成了猎人的俘虏。犰狳也是常见动物，在一幅取名为《成功与失败的狩猎》的画中，犰狳尾巴高高翘起，只有用双手牢牢地抓住它，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并非所有的猎人都能如此幸运，他们往往被犰狳的尾巴所绊倒，这幅画以此表现了作者的幽默感。画中还画有三趾鸟的形象。《捕鸟》一画描绘了两个人拉扯着用网捕鸟的场面，真实地再现了捕鸟的细节，生动活泼、极具情趣。印第安人还用“歪曲远近法”来刻画美洲虎：即画中老虎的头是从正面观察得到的形象，而身体则又是从侧面观测得到的形象。此外，作者还用石器在老虎的胴体上凿出许多的斑点，以显示老虎的凶猛，给人以恐怖之感。社会关系、生活礼仪也是皮奥伊壁画的重要题材，从《婚礼》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群婚和性交的描绘。《舞蹈》也有对性的刻画，猎人们在一人的率领下，翩翩起舞、尽情欢乐，画中的男性

皆突出生殖器，女性则突出臀部，暗含着祈求人丁兴旺之意。

皮奥伊的崖壁画中有不少杰作佳构，无论是鹿之优美、虎之凶猛、鸟之活泼，还是人们的欢娱场面，皆表现得逼真而又富于气韵。

秘鲁托克帕拉崖壁画。

托克帕拉是一座铜矿山，位于秘鲁的最南部。这一带既无树木、也无草地，附近的喜马河早已因断流而干涸见底，景象一片荒凉。1950年，一位来自美国的技术员在此山上架设高压线时，走进一个山洞想休息一下，无意之中他发现洞窟的四壁上全是形形色色的画。1963年，秘鲁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对这里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发掘工作后发现：托克帕拉壁画洞长6米，宽4米，壁画高1—2米，一共七千多幅，形状大小不一，且都是以赭色为主并着以黄、红、绿等色的彩画。作品描绘的多是各种动物的形象：有的像猢猻，有的像马，还有的像骆驼。一幅名为《动物与人》的画真实地再现了狩猎和围猎的情形，画中的动物造型浓墨重彩，是自然主义风格的完美体现；而人的造型则已经格式化，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手持弓箭的形象。

几乎与托克帕拉彩色壁画产生的同时，印第安远古人群开始了向定居农耕生活的转化。1981年4月，秘鲁的考古学家在利马南面的帕洛马地区，发掘出了一个八千年前的印第安村落遗址。这个村落中有五十六间圆形草屋，几百个贮藏食物的洞穴。此外还发现了二百二十具人体骨架和人们使用过的草席、木棍、绳子和鱼钩等工具。这个原始人群永久性聚居遗址，标志着秘鲁境内的印第安人已经迈出了走向农业文明的第一步。1979年，考古学家们在秘鲁中部港口瓦尔梅近郊又发现了一座古代玉米仓库，距今已有4700年的历史。这个仓库由十六个用大型石块建成的储藏室组成，内存有三个品种的玉米。玉米仓库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秘鲁为中心的南美大陆最终走进了农业文明时期。远古南美文明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二、废墟寻梦——多中心的玉米文化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印第安人在南美安第斯山中部的秘鲁和玻利维亚高原及其海滨地带定居下来,踏上了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文明之路,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玉米文化中心。

(1) 查文文化。

查文文化是安第斯文明的发源地,第一代玉米文化的光辉代表,距今约 3000—1500 年。它由秘鲁高原北部的查文·德·万塔尔(Chavin de Huantar)遗址得名而来,包括查文、纳斯卡(Nazca)、莫契卡(Mochica)等几个文化中心。

查文文化建立在广泛种植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的农业基础上,位于秘鲁中部山区北端的安卡什地区。在这里,石板建筑是最主要的遗迹。这些用砂岩石、玄武石和方形石修造的建筑物包括地下神殿、城堡、石柱、石碑等,此外各建筑物之间有用石块铺砌的引水渠道,地下还有排水的暗道。在这个安第斯山区最古老的大石建筑群中,一座被称为“卡斯蒂略”的大厦格外引人注目:它高达十五米,外观像个大碉堡,内部则间隔重叠,有走廊、楼梯、通风的烟囱和无窗的房间。大厦内的石柱上既有鬼斧神工的深浮雕,也有形象逼真的浅浮雕。也许因为宗教的图腾崇拜,虎神成了浮雕的主要题材。大厦规模庄严宏大,装饰考究漂亮,极有可能是部落首领的住宅或许是宗教祭祀的场所。

查文文化的雕刻艺术别具特色。在查文遗址上,人们曾发现一块巨型石碑,上面有许多用线条镂刻的兽头人身形象,兽头上还刻有比身高几倍的蛇形羽冠。这块石碑基本上是线刻的而没有用浮雕的手法,但严密的线条构成的画面复杂而精确、生动而副真。此外,在秘鲁西海岸的塞琴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座方形泥土建筑,它的周围嵌着 88 块石板,上面雕刻着虎、鱼等动物,还有战旗和武士,这表明到了查文文化末期,原始氏族公社开始解体。

查文文化的陶器和金属器物也很有影响。陶器是单色的,主要有黑色和棕色两种,上面常饰有几何图案,是在潮湿的陶坯上用钻眼、打印和抠刮的办法制成的。此外,查文陶器中马镫形的提梁嘴壶独具特色。金属器物主要是金片、匙箸、耳环等装饰物,它们的加工艺术水平极高,常有用金片在模子上打印虎、兀鹫和蛇的图案,这些图案回纹极为精细,动物的头、腿和爪清晰可辨。

查文文化中的帕拉卡斯文化位于秘鲁的南部,主要以墓葬出名。由于帕拉卡斯地区空气十分干燥,干了的尸体不用涂防腐剂也能够保存长久。迄今为止,人们在用石砖砌成的墓穴里共找到了 429 具木乃伊。他们身穿丝绸衣服,完好无损。织物和刺绣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色彩鲜明而又协调,线条复杂而又细致,致使帕拉卡斯的纺织成了世界优秀纺织工艺花苑中的一朵奇葩。

纳斯卡文化遗址也在秘鲁南部。这个文化虽然也以农业为基础,但却没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常见的陶器主要是敞口碗和提梁壶,多半属于彩陶,一般是以红色作底色,以黑色勾画轮廓,并将黄、灰、紫和白色协调地搭配在图案中,有的陶器涂彩釉多达七次,使用的颜色共有十余种。陶器上的画面多是图案化的鸟、兽、鱼、虎、豹等形象,多姿多采,新奇独物。纳斯卡的丝织品和棉织品制作技术精细,色彩绚丽而又图案多样,有的丝织品色调

竟多达 190 多种。

莫契卡文化发源于秘鲁沿海北部的河谷地区，有较为集中的灌溉系统。从莫契卡河引出的古运河长达 113 公里，人们又在它的两旁引出了至 5 公里长短不一的许多渠道，方便了灌溉。莫契卡陶塑特别发达：人头塑像、房屋塑像、动物塑像、果实塑像、船形塑像等，无不惟妙惟肖、形态逼真。特别值得提的是人头塑像，制作它需十分考究，即要将粘土碾磨成细粉，做成泥模后用火焙烧而成。这些作品神情各异、极富个性，令人赞叹不已。此外，莫契卡文化的创造者们还修建了许多“金字塔”庙宇，最大的一座被称为“太阳神庙”，长 228 米、宽 136 米、高 18 米。在它的南面还有一座长 103 米、高 23 米的神庙，估计这些神庙需一亿三千万块土坯才能建成，其工程之浩大令人难以想象。

（2）蒂瓦纳库文化

蒂瓦纳库文化是南美第二代玉米文化的重要代表，它发源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的喀喀湖东南，由玻利维亚的同名小镇而得名。与查文文化一样，蒂瓦纳库文化也是由几个中心组成的，它包括：蒂瓦纳库文化（Tianuanco）、奇穆文化（Chim）和瓦里文化，所处时期约在公元六世纪至十世纪之间，其影响的地域十分广阔，包括现在的玻利维亚高原、秘鲁北部高原、厄瓜多尔南部、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部等地。蒂瓦纳库文化遗址是一个巨大的、精美的石头建筑群，长一公里，宽四百五十米，学者们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一个宗教中心。遗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一处被称为“卡拉萨亚”的梯形金字塔。这是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方形场地，占地约 210 平方米，高 15 米。场地内有地下庭院，庭院之间有阶梯相通，顶都是一座大型庙堂。蒂瓦纳库遗址中最重要的古迹是闻名遐迩、的太阳门，它高 2.4 米、宽 4.5 米，是由一块重达百余吨的巨石雕凿而成，比例匀称、造型庄重。太阳门两边壁面光滑，门楣上有精美的浮雕，为后人展现了一个深奥而又复杂的神话世界：浮雕中间是虎头人身的天神，面庞环绕着光芒。他的眼睛下画着小圈，恰似两泪涟涟。天神头戴羽毛冠，左手拿着流星索，右手持狼牙棒并用它们制造电闪雷鸣。在天神的两旁，分三列共排着 48 个较小的人物形象，其中上、下两列是有羽翼的人，中间的一列则是手持族旗枪矛的、人格化了的鸟。据考察发现，蒂瓦纳库文化遗址附近不产中长石、玄武石和砂石，离它最近的产石场地也有五公里之遥，当时的人们是用何方法将巨石运到此地并创造了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蒂瓦纳库遗址的出土文物丰富多样，有青铜和铜制作的刀斧、柄杯和别针，也有用黄金造成的金片、面具和小首饰。此外人们还发现了形式各异、用途不同的陶器，这些器皿上多配有色彩鲜明的图案，其中以对周围山形摹拟的阶蹬式图案最多，带有纯自然主义的风格。

奇穆文化是南美第二代玉米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同样，它也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个时期的农业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当时的农作物种类已与现在相差无几，并且能够利用堆积在海岸附近岛屿上的鸟粪作肥料。奇穆部落成员在社会上和宗教上的地位有很大差别，女性倍受歧视，不能参加宗教仪式。社会职业分工出现祭把、巫医等集团可以不事农耕，贵族和平民有天壤之别，武士特别受人尊敬。这一切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开始了严重分化。

奇穆人的金银，有的来自于天然采集，有的则是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

当时还发明了青铜，并用金、银和铜制造出合金。铜制的工具主要有锄、刀、狼牙棒等，一般由冷锻加工而成，具有相当高的硬度。

奇穆文化以“昌昌”古城名扬天下。这处遗址在今秘鲁特鲁希略市西北八公里处，该城长 12 英里、宽 5 英里，占地共约 60 平方英里，是当今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大土城。据科学家们检测发现，砌墙的土坯是用粘土、沙粒和贝壳粉末拌成泥模，经火烧制而成。这种土坯十分坚固，虽经风侵雨蚀、地震破坏，昌昌古城依然容颜如初。城内有平顶金字塔、庙宇、宫殿、蓄水池、花园、市场、军用建筑和民宅等。所有这些建筑物都自成群落，形成了九个小城堡。房屋的墙壁都由泥浆抹光、十分平滑，上面刻有浮雕，多为海鸟、游鱼和猛兽。其中的海狗有蹲着的、卧着的、站着的、跳窜的，姿态万千。也许，当时的人们是以海狗为图腾的，因此今天，人们往往将昌昌古城称作是“海狗之城。”

此外，奇穆文化的陶器是与查文陶器一脉相承的，器皿以马镫壶和提梁壶居多，且以磨光黑陶为主。我们可以将奇穆文化看作是莫契卡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南美文明，特别是秘鲁文明源远流长、不断发展演化的一个明显例证。

三、古老的殿堂——集大成的印加文明

随着南美考古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揭开了古老印加文明的神秘面纱。这个曾辉煌一时的文明中心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长期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晶和升华。

(1) “新世界的罗马人”

公元六世纪时，安第斯山区和沿海地带大约共生活着一百多个部落，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个：艾马拉、莫契卡、普基那和克丘亚。普基那和艾马拉部落活跃在的的喀喀湖周围地区，莫契卡部落则占据了秘鲁沿海北部地区。与它们相比，居住在库斯科谷地的克丘亚部落无疑是十分原始的，然而这个不甘落后的部族很快就吸收了其它文化中心所取得成就，从而迅速发展起来，萌生了印加文化之源。

到了公元十三世纪，克丘亚部落群中的印加部落开始崛起，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印加国家由大酋长统治，它与周围的部落和国家进行着和平的产品互换和社会交往。随着国势日益强大，印加国家开始谱写自己的征服史。

据传说，印加王国大酋长曼科·卡帕克带领军队，穿过利利奥高原，征服了科利亚人，最先占有了库斯科谷地；迈塔·卡帕克率军渡过阿普里马克河，到达了今天秘鲁的莫克瓜和阿雷帕；此后的卡帕克·尤潘基是个英勇的武士，他率众到达了今天的玻利维亚，控制了沿海的纳斯卡人。

1438年，帕查库蒂（又称作帕查库特克）上台执政。这位印加王国史上最著名的君主是第九位统治者。他对外进行大肆扩张，屡建奇功。特别是他率军征服了阿班凯，消灭了昌卡族入侵印加国家的基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印加王国走出库斯科谷地、向安第斯山区的扩张扫清了道路。据说，在这次征服活动中，帕查库蒂被敌人砍去了一只耳朵，他嫌一只耳朵难看，便命令工匠打造了一个金耳壳戴上。后来他又觉得独自如此过于显眼，于是便下令所有贵族都必须戴上金耳壳。在战胜了昌卡部落后，他又率军征服了卡哈马卡、纳斯卡、利马和奇穆等地区。他的南征北战使印加的疆域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完成从早期奴隶制王国向帝国的过渡。继帕查库蒂之后，印加王帕克·尤潘基开始向北扩张，取得了基多，向南推进到了今天智利中部的毛莱河。

印加部落经过近百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各个部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帝国。十六世纪初的印加帝国以秘鲁为中心，向北包括厄瓜多尔的大部分、玻利维亚的大部分和阿根廷的西北部，向南到达智利中部的毛莱河，东达亚马逊河丛林地区，西濒太平洋，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以上。由于印加帝国是美洲空前强大的帝国，被后人称之为“新世界的罗马”。因此，印加人也就成了“新世界的罗马人”。

印加帝国的社会制度是早期奴隶制。国王是统治全国的专制君主，不仅立法、行政大权独揽，还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和首都库斯科太阳神的祭司长。除了国王的姐妹和妻子外，没有人敢正视他。臣民在觐见时，必须背负木柴、脚不着鞋，行走时两眼注视地面以示恭顺。印加王的特权和高贵有两个标志：短发和象牙权杖。他出外时必须乘坐华丽的轿子，穿最精美的衣服，佩戴象征特权的头饰。驾崩之后，要以妻妾和奴仆献祭或殉葬，有时多达好几百人。在决定王位继承人时，国王要听取贵族理事会的意见，合法继承人必须“血统”纯洁，即只能是印加王与王后所生的儿子。王后称作“科利亚”，是印

加王从自己的姐妹们中挑选出来的最漂亮、最丰满的一位。除王后外，后宫粉黛很多，可谓妻妾成群。

印加帝国分为四个行政区（苏尤），北部是钦查苏尤，包括今天的秘鲁中部、北部和厄瓜多尔；西南部是最大的科利亚苏尤，包括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南部是孔德苏尤，地处秘鲁南部；东北部是安蒂苏尤，占据安第斯山脉中段地带。这四个行政区合称“塔万蒂苏尤”，即“大地的四方”。行政区最高长官叫“苏尤约克阿普”，由贵族世袭充任。同时组成贵族理事会，附属于国王之下，负责王位继承人的挑选。苏尤以下是统辖四万户的军区，长官叫“马志尼”。军区以下是“村社（Ayl-lu）”，这种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约有一百户左右的人家，共同住在一个村庄内，或者散居在许多邻近的小村落里。村长叫“帕查卡—卡马约克”，村社成员都属同一血统亲属，受同一族神的保护。

印加奴隶制文明是南美各玉米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个美洲古代最发达的文明，不仅有比较发达的农艺，而且在建筑、道路、冶金、纺织、制陶、医学、天文历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印加文明深远地影响了南美近现代文明的发展。

（2）发达的农业文化

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同欧洲、亚洲古代奴隶制文明不同。旧大陆文明的主要农作物是麦类和水稻，而印加文明的主要农作物则是玉米。印加玉米农业经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它独特的生态环境、耕作方法和技术装备。玉米生产对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学者甚至认为“秘鲁”一词在克丘亚语里就是“玉米之仓”或“大玉米穗”的意思。

印加农业文明是在极为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今天秘鲁沿海中部安第斯山麓延伸到智利北部，主要是沙漠地带。这里的气候十分干燥，只有乌鲁班巴河、阿普里马克河、卢林河、马腊尼翁河、里马克河和其它几条河的河谷地带。

印加人发展农业的地区主要是安第斯山脉的各个谷地，特别是库斯科谷地，这是印加农业文明不同于旧大陆各个古代文明的生态环境特征。古代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母亲”；苏美尔文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发源于恒河流域；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些大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而安第斯山的山谷深而狭窄，山坡较陡，土层贫瘠。到了雨季，山水顺坡而下，冲刷土层，旱季则干旱缺水。但正是在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下，印加人继承了前人修筑梯田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农业耕作技术。他们栽培了大约四十多种农作物，如：根菜类的芋、珍珠薯、番薯、木薯、马铃薯；瓜果类的南瓜、木瓜、胡瓜，还有番茄、花生、菜豆、可可、菠萝、草荡、辣椒；此外，还有玉米、滨藜稻、栗棒、胭脂、龙古兰等植物。这些植物在当时都是其他大陆没有的，可见，印加人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印加人广泛利用秘鲁南部和玻利维亚山区的草原，发展畜牧业，饲养骆马、羊驼和豚鼠。骆马的饲养是畜牧业上的重大成就，这对解决印加人衣和食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骆马的肉是很好的食品，皮可以制成垫子和斗篷，骨头可以做成各种器具，筋腱可以代替绳索，毛可以制成线和做成衣服。甚至骆马的粪便也是上好的燃料。

印加帝国对外扩建过程也正是玉米农业文化的移植过程。印加统治者实

行一种迁移制，即“米特马埃斯”制。按此制度，印加人在征服一地之后，就把那里的居民，甚至整个部落从原来的居住地迁移到另外地区，给他们建立居民点和村社行政单位，并命令他们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印加帝国时期，海拔四千米玻利维亚高原的广大草原地区早已被人们开拓、种植，玉米的变种多达七百多种，这真是人类农作物栽培史上的奇迹。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以梯田为主要特征。印加人在小山岗和山坡上建成层层梯田，扩大生产面积，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们先用石块在山坡上砌成几堵围墙，然后分别将迳土铲平和填满。第一块梯田建成后，再建第二块，第三块，……这样就在整个山坡上建成层层平平展展的梯田，使全部土地都得到利用，成为能够灌溉的可耕地。对于多岩石的坡地，他们先搬掉石头，然后从其它地方运来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泥土修筑梯田。一般看来，第一块梯田面积较大，第二块梯田面积较小些，直到最后一块梯田只能种两五行玉米。这些梯田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扩大耕种面积，这不能不说是印加文明在世界农业史上的杰作。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印加人懂得，要想在贫瘠的旱地上获得良好的收成，就需要人工修建灌溉系统。因而，印加人根据需要灌溉的土地面积的多少，建造相应的水渠。水渠是用石板砌成的。通过水渠把水从山溪引入梯田。印加人建成的最长水渠达一百多公里。水渠建成后，人们把土地平整为水平方形梯田，以利灌溉。灌溉系统保证了农作物的收成。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是建立在一种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基础之上。印加人没有耕畜，用人工翻地。主要的工具是一种叫做“塔克利亚”的木撅，至今，在秘鲁一些极为闭塞的山区仍在使用它。这种工具是在一根长约一点八米的木棍上装上一个青铜金属或硬木弯曲的尖头，在尖头以上约三十厘米处，与木棍成直角装一横突作为踏脚装置。翻地时用脚踩着它，将尖头插入地里，旋转一下拔出来，就可以深翻耕地，这是印加人一大发明。

妇女使用名叫“马卡纳”的锤子和“拉乌卡内”的锄头。马卡纳就是在粗木棍上装上平滑的石头，用来打碎土块。拉乌卡纳是在一个像凿子或切削刀形状的青铜宽锄板上安装一根硬木的短把。与其说它像现在的锄，毋宁说更像手斧。锄用于掘孔、培土等等工作。此外，他们还使用青铜齿镰和链枷。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有独特的施肥技术。在库斯科谷地和附近高地，印加村民将人粪施到玉米地里。印加人平时十分注意堆积人粪，并把它晒干打成粉末，在播种季节将肥下到地里作底肥。在其他地区，印加人还用骆马和羊驼的粪便作底肥。在南美洲沿海地带，印加人以鸟粪作肥料。如在秘鲁、智利的沿海地带有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岛上由于有鸟栖息和繁殖，积下了大量的粪便，从远处望去，岛上长年积累的鸟粪堆，酷似一座座小山峰。那些鸟粪是一种肥力很强的自然有机肥料，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如氮、磷、钾等，为此，印加人十分注意保护鸟粪。在海鸟繁殖的季节，禁止人们到岛上去，以防海鸟受惊而飞走，违者要受到惩处。无论何时，在岛上或其他地方，杀死海鸟者要被处死。按照印加国王的命令，将每个岛上鸟粪划给指定的地区使用。如果一个岛很大，就由几个地区分享。每个地区在划定的区域树立标记，禁止他人盗肥。地区内对鸟粪再作更细的分配。鸟粪的份额由村社按每个村民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如果某一村民侵占了别人的一份，就等于犯了偷窃罪行，会遭杀身之祸。不过，一般印加人都会自觉遵守有关规定。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的繁荣是靠独特有效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印加帝国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国王所有，而实际上是由各个村社支配。每个村社把可灌溉耕地划分为三部分：太阳田、印加田和村社田。太阳田属于最高大祭司、祭司、庙宇管理人，印加田属于印加国王和王室所有，村社田属于村社所有，并在村民中进行再分配。关于村社田再分配的情况是这样的，村社酋长“库拉卡”负责每年分配土地工作，每对村社夫妇享有一份土地，大约一图普，约合四千平方米。如果这对夫妇家增添一个男孩，就给这家增加一图普；如果这对夫妇家增添一个女孩，就给这家增加半图普。村社田的使用都是暂时的，每年必须重新分配。

印加帝国土地耕作生产者主要是村社男性社员。他们年龄为二十五岁到五十岁，被称为“普里克斯”。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子里，首先耕种太阳田，接着耕种印加田，最后耕种村社田，太阳田上的收获归祭司所有，印加田的收获归王室所有，以作贡赋，村社田的收获一小部分作为全村的公共储备，保障村社的各种需要，并用以救济困难的村民，大部分用以村社社员各家的家庭生活。

（3）卓越的工艺技术和科学文化

如果说玉米文化是印加村社社员的创造，那么以手工业工艺技术为主的科学技术便是奴隶、奴仆、杂工和手工业者的创造。印加帝国的世袭奴隶叫“雅纳科纳”。据传说，雅纳科纳起源于印加上对某一个地区反叛部落的惩罚。有一次，数千名反抗印加统治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在起义失败后，被强制性地赶到雅纳科纳城准备处死。后来，由于印加王后的讲情而改为服劳役和做杂工，这些人就以该城名字而得名为雅纳科纳，成为终身奴隶，他们为主人所有，完全受主人支配，没有任何自由。印加奴隶和手工艺人不仅继承了古代安第斯山地区人民的农艺、冶金、建筑、纺织及制陶方面的生产传统，而且在手工艺技术上有了新的发展与创新，并在医药学、天文学和历法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每年夏天，印加统治者驱使大批“雅纳科纳”开采矿石。主要有铜、锡、银、铅等矿石，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炼铁的工艺。

印加人的冶金工艺技术有长足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受安第斯山地区人民金属加工技艺的影响，进行黄金加工；另一方面同时受到被征服地区，特别北部沿海奇穆工艺的影响，主要进行青铜合金工艺加工。据历史文献记载，印加国王曾把奇穆的冶金工匠迁到首都库斯科来发展冶金业。

印加冶金技术发展主要表现在加工技艺的多样化和浇铸技术的完善化。印加人懂得对金属进行各种加工。锻造、冲压和镶嵌工艺主要用来制作金银器皿、斧、镰、棍、针和半圆形刀等工具。印加人的浇铸技术极为高超，他们采用成型蜡模浇铸，先用泥沙制成模型，在它上面涂上一层蜡。蜡模经过仔细加工后，再被附上一层新的泥沙。在模型上部留下一个孔，把融化了的金属注入孔内。蜡层溶化后，从下面的孔流出，原来蜡层的位置就被金属所占据。冷却后，再把泥沙模型打碎，金属铸件便成型了。浇铸主要用来制造铜和青铜物件。

印加入冶金技术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装饰艺术的发展。他们用金银制成男女人像和骆马塑像。库斯科太阳神庙的太阳神金像和金银装饰品，更显示了印加人在装饰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其技巧已接近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制品。金属装饰艺术也体现在贵族们的生活之中，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

在一个贵族的坟墓中，往往藏有几十镑到几百镑用金、银制成的各种装饰品。

印加人的创造才能还集中表现在纺织技艺上有较高水平。他们的某些织物至今仍没有人可与之相媲美。与此前相比，印加帝国时期织出的布更加精细。如一千年前留下来的一幅地毯，每英寸含纱线达五百根，而欧洲中世纪的地毯每英寸只有一百根。在今天秘鲁南部沿海皮斯科附近出土的木乃伊套服，被称作是“世界纺织品奇迹之一”。

印加人纺织物分毛织品和棉织品两大类，其织物品种之多，足以使现代的观赏者惊叹不已，陶醉其中。在印加人的织品中，既有简单结实的单层布，也有精致美观的双层布和多层布。布面上的花边色彩多样和谐，主要颜色有红、黄、橙黄、深褐、蓝、紫红、绿、白和黑色，每种基本颜色有又深浅不同的区别。这样，印加人可以染出一百九十种色调不同的线。

纺织技术的发展刺激了装饰画的发展。印加人喜欢在衣服、毛毡、布匹等织物上面绘制装饰画。题材主要取之于自然界，除了植物和动物外，还有人类的活动和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呈方形、圆形和三角形小几何图像也很讲究对称性。在这些装饰图案中，印加人还夹杂使用金光闪闪的金线和色彩鲜艳的羽毛，这使印加纺织品更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印加时期有原始的竖式织布工具和横式织布工具，这两种工具都有两根平行的横档。用这种工具织布时，上面一横档固定在树干上，下面一根用一条长带子系在织工的腰带上，织工坐着或跪着工作。

同纺织业相比，印加帝国时期的制陶业进步不大，但也有一定的发展。陶器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引人注目的磨光技术，雅致的装饰，优美的几何图案和绮丽的色彩都令人赞叹不已。陶器的几何图案精美小巧，具有平衡和对称的特征。与纺织品一样，陶器上饰有菱形，还经常绘有印加国家的自然景色、历史情况以及花鸟等画面。这些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表现了印加人的审美意识。

印加陶器制品以瓦罐和钵头最为闻名。瓦罐大小不一，它的外形是肚大而圆，上部有两个竖提手，罐口边成喇叭口形，有的还有两个较小的提手。有些瓦罐特别富于表现力，形似人体，在器皿的颈部雕出眼睛、嘴巴和鼻子。在这种瓦罐艺术品的正面，罐体与上部的衔接处雕出一个动物的小头，它不仅作为装饰，而且可以用来穿绳，把器皿背在背上。圆锥形的底部便于装水，也便于保持平衡，避免用力时倒翻，大瓦罐是一种很实用的器皿。

印加人的建筑用料主要是玄武石、中长石、闪绿石，有些石料重达几十吨至百吨。石块经过加工，方方正正，有的石块因形就势，位居其所。各种石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石块和石块的接合处，非常严实，甚至连最薄的刀片也插不进去。有的专家据此推测，印加人已经会应用模型或以建筑平面图进行工作。印加人建筑所使用的工具是石制工具和少量金属工具，石块和石块之间不用任何粘合剂，而又结合得那么坚实，天衣无缝，真是天下一绝。

印加人的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军事建筑和世俗建筑，它们结构简单，朴实无华。

印加建筑的风格首先是人工建筑和大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世俗建筑由于空间、时间不同，有不同的风格，但却着重同自然协调，沿海地区以砖坯结构为主，山区以石料结构为主，森林地区以木质结构为主。大型的军事建筑也注意建筑结构同自然环境的协调。印加人常把人工凿成的建筑石料移植在巨大的天然岩石上，使得建筑物与地形浑然一体。印加人更喜欢用石块

建成水渠，使断断续续的泉水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间有小瀑布和水他的小溪。

印加建筑风格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注意建筑的民俗性。首都库斯科城是印加建筑的象征。主要体现了首都的中心地位和地方民俗多样性相结合。库斯科城位于海拔三千四百米的库斯科盆地，由十二个区组成。城内有王宫、官邸和中心广场。各地酋长在库斯科建造房屋，以备朝见君主时住宿。他们中间来自北方部落的，就住在城北，来自南方的就住城南，来自东方的就住城东，来自西方的就住城西。而每个酋长的房子又由他们子民的房子围绕着。若是有人走遍库斯科的街区，就如同游览了整个帝国。因为不同的街道代表了不同地域的习俗，所以可以说库斯科是印加帝国的缩影。正如西班牙的史家所说的那样，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或中心）。

印加建筑风格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建筑的高大、巍峨与壮观。

印加的主要建筑，除了我们后边要提到的太阳神庙外，还有萨克萨瓦曼城堡，它特点鲜明，别具一格。

萨克萨瓦曼在印第安克丘亚语里就是“山鹰”之意，或者说是“帝国猎鹰”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太阳之家”的意思。萨克萨瓦曼城堡是建筑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山峰之巅，可以俯瞰库斯科城的巨大防御体系。它既是保卫库斯科的要塞，又是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更是库斯科城被围困时供所有居民的安身之地。据传说，这座古堡是印加王帕查库蒂设计的，约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图帕克·尤潘基时期动工兴建。人们推测，印加各地人民轮流出入，每班二万人，工作一个月，这样竟持续了五十年以上，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还没有完全竣工。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认为，萨克萨瓦曼堡是美洲印第安人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萨克萨瓦曼堡建筑群占地面积四平方公里，从上到下，有三层围墙，每道城墙都高十八米，依山势而建，蜿蜒曲折，气势宏伟，最外一道城墙长五百四十米以上。这些城墙是用巨石砌成，其中有一块巨石，高八米，厚三点六米，体积为一百二十一立方米，重达二百吨。城堡的层层台阶由许多独块石板铺成，长达八百米。古堡的最高区域是由三座塔楼围起来的一个整齐的三角形。圆柱体主塔基层呈辐射状，主塔内有一个温泉，供印加王享用。其它两个正方形塔楼是驻军的地方。三座塔楼由石头砌成的地下通道相通。这座古城堡以其结构复杂，新颖宏伟，坚固无比而著称，充分显示了古代印第安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也显示了印加帝国的强大和威严。

萨克萨瓦曼堡也是印加入哲学思想的体现。据专家们研究，印加人相信三重世界的哲学，上层是神所住的地方，下层是水和火，中层是人。这三重世界是由彩虹和闪电连接而成的。所以，印加人把城墙修成闪电形，就是取贯通三重世界之意。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许多民族古代都有天堂、地狱、人间之说，可见，历史上各国人民虽然各居一方，信息隔绝，但其思维方式却十分相似。

印加人在医药治疗方面，特别是外科手术和用草药治病上也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印加帝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妖术和巫术，它是同宗教密切相连的东西，里面却含有某些医学成分。巫医们推测，疾病是由惊吓或灵魂附身，本人罪孽或使人中妖术而引起的。他们推断出病因后，就用魔术驱妖，并用草药治疗疾病。据《印加医学》一书统计，为印加入熟知的草药名多达六百种之多。印加入最常用的药材是奎宁、吐根、香膏、番木鳖和可可。研究医药史的专家们还指出，是印加人民首先发现了金鸡纳霜、古柯碱、颠茄、

洋地黄等药品，它们丰富了人类的医学宝库。

印加人的穿颅术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当时世界外科医术上的领先地位。他们经常对头盖骨施行穿颅术，以取出头部挫伤而造成的骨头碎片，或治疗患有精神病的病人。印加医生使用的手术工具是成“T”形的铜刀和十分锋利的石头工具。外科手术也使用两种麻醉药对病人进行麻醉。一种是含有大量酒精的饮料；另一种是从一种名叫“古柯”的灌木叶子里提取作麻醉用的古柯硷，这是他们最常用的麻醉药。印加医生已懂得使用绷带和纱布。

印加人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独树一帜。印加历法是印加人长期观察天体和行星运行的结果，同时，它同农业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印加人根据对许多行星的观察演算出一种太阳历的中心广场上建筑了一个大文观测台。人们从太阳影子的倾斜角度和长度的变化，便能测知日辰。印加人还确定出冬至和春分的时间。

印加人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历法观念。根据太阳历，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天零六小时。根据太阴历，一年分为三百五十四天。印加历法都规定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年的开端和结束都以十二月的冬至日为标准。这一天正好是雨季的到来之日。印加人民还把日月和星辰都视为神灵，他们历法中的每个月都有专门名称，分别表示相应的宗教仪式和活动。十二个月的名称是：

| | |
|-----|----------|
| 十二月 | 卡柏克·拉伊米 |
| 一月 | 乌丘克·波科伊 |
| 二月 | 哈通·波科伊 |
| 三月 | 保卡·瓦拉伊 |
| 四月 | 艾里·瓦伊 |
| 五月 | 艾穆拉伊 |
| 六月 | 因蒂——拉伊米 |
| 七月 | 安塔——西图阿 |
| 八月 | 卡帕克——西图阿 |
| 九月 | 乌玛·拉伊米 |
| 十月 | 科亚·拉伊米 |
| 十一月 | 阿亚·马克 |

印加人发明了度量衡。测量长度的单位以人体的四肢为基础。最长的长度单位是手臂的长度，其次是相当于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这样宽的长度，测量土地用的单位是图普，每图普约四千平方米。不同的地区，图普的长度不一。粮食以斗计算，每斗合二十七公升，重量以3.11克为单位。人们在印加古墓葬中还发现用骨头和木头以及用银制造的天平秤。

(4) 以崇拜太阳神为主的印加宗教体系

宗教在印加帝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很大地位。印加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力，更是崇拜太阳神。印加帝国的统治者把印加部落的主神——太阳神强加给安第斯山地区的各族人民，要他们信仰和崇拜，同时又允许保留和继承各部落与村社或者家族的各种宗教信仰。

图腾崇拜的残余是最为古老的。印加人崇拜一些被认为是神圣的草、木和动物。动物主要有美洲豹，还有南美兀鹫、大鹰和猿。某些村社地区以动物命名。植物的宗教化身，首先是玉米神和马铃薯神，因为这两种农作物在印加人的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瓦卡(hauca)崇拜也是最为普遍和较原始的宗教。瓦卡崇拜同祖先崇拜

联系极为密切，它把氏族祖先神演化成公社土地神和一般地方的保护神。瓦卡就是崇拜圣地或圣物，或者说是崇拜能引起人们崇敬之心以及能使人联想起传说中的历史事件的地点。如山岳、岩石、河流、湖泊、泉水和山洞等等。有的地方被看作是一个部落或村社的起源地，因此，人们经过此地时，都要唱哀歌进行祈祷。有些瓦卡崇拜已成为一种习俗而保持至今。如一条道路上的某一处被认为是地方神的所在地点，行人经过该地时就把一块石头加在多年堆起来的石头堆上，以求地方神保佑行人一路平安。还有些地方，如桥梁、河流、岩石，或传说中英雄首领的墓地，也成为瓦卡崇拜的对象。譬如，库斯科附近山上的一些石头，被认为是曾变成人来帮助帕查库蒂打败昌卡人的圣物，所以，这些石头就成为受崇拜的神。库斯科的瓦纳考里小山上有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人们认为它是传说中印加始祖的兄弟卡奇变的。这块石头也就成了印加青年们举行成年仪式的圣地标志。库斯科附近的帕卡里坦普岩洞也被当作瓦卡崇拜、因为，它是传说中印加首领曼科·卡帕克的出生地。

印加人崇拜木乃伊之风也很盛行，这与崇拜祖先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常把木乃伊埋葬在用岩石凿成的坟墓里。木乃伊穿着盛装，戴着首饰，旁边放有日常用品以及食物和劳动工具。印加人对统治者的木乃伊崇拜尤为虔诚。所有印加王的木乃伊都被仔细地保存着。它们在庙宇里受到崇拜、在盛大节日时，祭司抬着它们去游行，以示神圣。印加人认为国王的木乃伊具有超自然的威力，所以，人们出征时常常把这些木乃伊抬到战场上，以示祖先之威，相信战争定会因此取得胜利。

印加人还热心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各种星辰和星座都被看作神。印加人同样崇拜地球和海洋。据传说，两个蛇形的神话人物能够联系宇宙中几个不同的世界。一条叫做“亚库玛玛”的蛇，到达地面时就变成大河，经过天界时就变为闪电，它被认为是水神，威猛无比。另一条叫做“萨查玛玛”的蛇，有两个头，能直立缓行，像棵老树。它到达天界时就变成彩虹，成为肥沃富饶之神。这两个神都受到印加人的热烈崇拜。

大地母亲崇拜影响深远，根深蒂固。大地母亲叫“帕查·玛玛（Pachamama）”。在奇楚亚语中，帕查就是土地，在今厄瓜多尔境内的印第安部落叫做“依圭”。大地母亲崇拜是地方性的，在每个地方，人们都把大地母亲当作自然界的女主人，无论土地的收成，骆马的繁殖和经济的繁荣都取决于她。在专门的节庆时，人们用玉米和马铃薯做成类似妇女的形状，来作为他们的保护神。

无论是图腾崇拜，瓦卡崇拜，还是木乃伊崇拜，大地母亲崇拜，它们都有共同的属性，都是地方性的原始宗教，是地方部落意识的体现，也是安第斯山各地区人民的潜在意识。它们在印加向统一帝国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太阳神本是印加部落之神，后上升成为全国的主神。它在印加语中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因蒂（Inti）、维拉科查（Vera-cocha）和帕查马克。太阳神的形象，一般是人形，面部如金盘，光芒四射。太阳神的三个名字反映了人们对它崇拜的不断政治化的过程。印加人传说中的祖先曼科·卡帕克是太阳神在太阳岛中创造出来的，是“太阳之子”、神的使者。他享有印加的称号，拥有最高权力。这是太阳神崇拜向王权神圣化方向发展的开端。

十四世纪，即帕查库蒂执政年代，是印加太阳神崇拜、王权神化的制度化阶段。“帕查”在克丘亚语就是时间，“库蒂”就是转变的意思，所以，

帕查库蒂名字本身就含有改革者的含义。帕查库蒂本人厉行宗教改革，并树立新神，使王权进一步神化。这也可能是解决王权同太阳祭司教权冲突的结果，因为，据说专掌太阳神的祭司曾企图限制王权。帕查库蒂并非否认崇拜太阳神。但他宣扬说，一切神灵都是由无形的、永恒和万能的主神创造的。

“太阳神操劳得很好，早晨起来很早，照暖大地；晚上退走，可是如果没有上帝即万物之主——伟大的帕查马克，那么谁来指挥太阳神呢？”这样，库斯科神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新的含义。帕查库蒂把库斯科太阳神庙变成全印加的圣殿，增设新神帕查马克的神位，确立起王权神化的政治制度。

帕查库蒂增设新神的运动也可能是王权同地方贵族妥协的结果。相传，他征服了秘鲁卢林河谷的部落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部落神祇，竟是人们朝拜的圣地。他懂得要巩固王权，特别是“萨帕”的大王之权，必须把这个圣地的神包括在自己的国教之中。因而，他给这个神取了一个克丘亚语的名字，并供养在宫廷神庙中。

印加人的太阳神崇拜与祖先崇拜有关。印加人广为流传的印加起源神话保留着祖先崇拜的痕迹。印加起源神话认为印加人的祖先是神，印加王朝是“太阳之子”阿亚尔四兄弟和玛玛四姊妹开创的。这四男四女是从库斯科东南三十五公里处帕卡但普里地方（起源之地）里出来的。他们决定寻找一块肥沃的土地，来建立代表他们的父亲和保护人的太阳王国。这四兄弟的名字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阿亚尔·曼科是首领之意，阿亚尔·乌丘象征生长胡椒的国土，阿亚尔·奥卡是反叛和抗拒权威的人，阿亚尔·卡奇则象征有盐滩的海岸。四姊妹的名字也有不同意思：玛玛·沃利奥是生殖力旺盛的母亲和照料家庭的主妇，玛玛·瓦科代表有男子气概，勇于承担责任的妇女，玛玛·科拉是生长在东部森林中一种野草的名称，玛玛·拉瓦代表安第斯山区种植最多农作物玉米。兄弟姐妹八人都将去瓦纳考里，在那里播种太阳赐予的玉米。神话传说认为，阿亚尔·卡奇是力气最大的人，他一路上用单刀开山劈岭，他的兄弟们因妒嫉他的巨大力量，设计陷害他。起初，卡奇中计被引进一个山洞里，接着一块巨石滚落下来，封住洞口。卡奇痛斥他兄弟对他的陷害，并祈求创造天地之神来援救他。后来，创造天地之神把他变成神鹰，让他从山洞中逃出，飞往瓦纳考里山顶上，还把他变成岩石。这岩石就是印加青年崇拜的最神圣的瓦卡之一。另一个兄弟阿亚尔·乌丘由于亵渎圣物而被变成石头。这样，只剩下曼科和奥卡去库斯科了。他们有一根太阳神赐给的金杖，是开辟通向库斯科之路的圣物。在去库斯科途中，曼科多次试图把金杖插进地里，但毫无成效，并引起奥卡对曼科的蔑视和反叛。曼科耐着性子，任其弟嘲弄，直到这根金杖插进了地里，这就是适于人们生活和植物生长的湿润之地——库斯科。后来，曼科从地里拔出金杖，打破了奥卡的头颅，迫使他服从太阳神和曼科的意志。最后，阿亚尔·曼科同他妹妹玛玛·沃利奥结为夫妻，曼科成为库斯科的祖先和印加王朝的统治者，沃利奥则成为印加王朝的女祖先。印加起源神话通过库斯科的发现过程，展现了太阳神崇拜同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

印加人的太阳神崇拜与自然力崇拜也是紧密相连的。对于生活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人们来说，初升的旭日会创造出无比美丽的晴空，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也会发出无限的光和热，给人们送上光明和温暖，这正是印加人祈求的赐予，他们多么希望大地永久处在璀璨的阳光照耀之下。黄昏时，太阳的

余辉往往沉入浩瀚的大海，这十分自然的引起印加人依依惜别的心情。所以，印加人崇拜太阳是十分自然的选择。

库斯科中心广场和太阳神庙是举行宗教仪式和节日的狂欢之地。传说认为，库斯科是太阳神的儿子曼科·卡帕克的金杖插入的地方，是神和人的接触点，是吉祥之地。太阳神庙，名叫“科里坎查”，或叫“金宫”，堪称印加人建筑智慧的象征。据记载，这座太阳神庙是由一个大殿和周围几个小殿组成的。大殿占地四百多平方米。西班牙史家对这座大殿作了夸张，但又是细致的描写：

“太阳神庙是在朝东的一块圣地上建造起来的，整个庙宇是经过精心修整和用平坦而巨大的石板砌成的。为了让空气流通，屋顶造得很高，用茅草盖成。还有一个很优美的祭台，大殿的四周墙壁从上到下全部镶上较厚的纯金片。所以，神庙得名为‘金宫’。在正面墙壁上有太阳神偶像，它是个绘有男子脸形，周围环绕着光芒和火焰的用黄金制成的圆片。它面朝东方，受太阳光照射时，放出万道金光。在太阳神偶像的左右两侧，按照古代习俗，在金御椅上供奉着历代印加王的木乃伊，远远望去，它们就像真人。大殿中央置有一个华丽的御椅，举行典礼时，印加王便坐在御椅上。”

大殿的外围有五个正方形小殿，第一个小殿用来供奉月神——太阳神的姐妹和妻子。小殿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用纯银制成的。月亮神偶像是个绘有女子面容的银制图片。第二小殿供奉金星和七颗启明星，似及天国其它星星，故名为星房。像月亮神殿一样，里面的东西都是银制的。第三个小殿供奉雷神和闪电神。第四个小殿供奉彩虹，墙壁上绘有一个横跨的宽阔弓形，名为“马伊五”，它像神一样受到崇敬，有七种不同的颜色，绚丽多彩、光艳照人。第五个小殿是供祭司们使用的密室。据说它的墙壁是用金银宝石装饰起来的，有很多是用黄金制作的偶像，后来被西班牙殖民者洗劫一空。

在太阳神庙的旁边，还有一个献给太阳神的“黄金花园”。园中点缀着用黄金和白银做成的各种植物花卉以及飞禽走兽，它们神态各一，栩栩如生，起初，西班牙人竟认为他们是真的，用手一摸，方知是假。

关于太阳神庙和“黄金花园”的描述有很大的夸张，但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印加统治者驱使劳动人民建造金碧辉煌的太阳神庙，不仅是为了供奉他们的主神太阳神，而且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印加王把太阳神庙作为全国的宗教中心，并以太阳神的化身自居而号令全国。

印加人庆祝太阳神有四个宗教节日。第一个节日是春分时举行的叫“拉伊米”，是王室祭神之日。第二个节日叫“西图西”，在秋分时举行。这一天，克丘亚人半夜起床点火，然后去洗澡赎罪。第三个节日叫“拉伊米·因蒂”，是在夏至时举行。这一天，全国都要供奉太阳神。清晨人们等候日出，并向初升的太阳欢呼致敬。仪式由印加王主持，朝臣、祭司和居民都要参加，并用骆马肉和玉米酒举行盛宴。最后一个节日，叫“阿莫拉伊”，冬至时举行，向太阳神献祭。国王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地位。拂晓，国王穿着太阳使者的眼装，右手拿着印加军队统帅的标志——金氏矛。他从萨克萨瓦曼堡出发，跑下山坡，来到中心广场。四个王子挥舞长矛在那里迎候他，并等国王发布赛跑的命令，此举象征在整个国上上将驱除邪恶。四个王子每人在一条通向一个行政区的道路上赛跑，跑完一公里多的路程后，把长矛传递给另外三个人，这样依次传递，直到三十多公里路程像接力赛一样跑完，最后一人把长矛插进地里，象征驱除邪恶。

印加宗教仪式的基本内容是供奉牺牲和祭典。祭典主要用海豚、骆马作祭品。在非常的场合下，例如庆祝新的印加王登基时，在发生地震、旱灾、传染病时，在发生战争和印加王出征时，则用活人作祭品。活人祭品主要来自战俘，或是被征服部落作为贡物送来的小孩。仪式神秘庄重，气氛恐怖，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5）英雄史诗《奥利扬泰》

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印加人对人类文化宝库的可贵贡献。在印加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叙事诗、抒情诗和颂歌，其中有印加人的创世神话，有对外扩张史，有王室宫廷的掌故轶事，也有男女青年的浪漫恋曲。《奥利扬泰》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奥利扬泰是克丘亚民族的英雄，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大约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些传奇被改编为戏剧，但究竟是谁所作，已无从查考。据专家们研究，《奥利扬泰》的作者很可能是印加贵族的后裔，因为剧中对印加上层社会的描述非他人所能及；根据剧中对奥利扬泰极尽赞美和对印加王的贬抑，我们甚至也可以猜测作者或许就是奥利扬泰的后裔。原剧是用克丘亚语写成的，其中混有一些西班牙语词汇。此剧作成后曾一度失传，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巴尔特斯的秘鲁传教士重新发现了它，并用拉丁文记载下来，改编成多幕剧，它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奥利扬泰》。此后，该剧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

戏剧歌颂了印加王帕查库蒂时期武士奥利扬泰的英雄事迹和他对纯真爱情的追求。故事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奥利扬泰是印加王最为宠信的将领，在对外征讨中，他屡建奇功，不断地被提升晋级，最后成了地位仅次于印加王的大将军。由于奥利扬泰从小就在宫内保卫王族安全，经常陪伴小公主科尤尔，两人青梅竹马、心心相印。当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他便请求皇帝将公主许配给他。然而当时的国法和教规都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印加王便以奥利扬泰出身低微为由拒绝了这桩婚事，并将科尤尔公主送往修道院。在那里，公主生下了她与奥利扬泰的女儿依玛·苏玛。印加王大为恼怒，他给公主戴上锁链，把她关入地牢。

求婚不成的奥利扬泰极度失望之余，断然起兵反对印加王。他自立为王，拥戴他的武士有三万之多。印加王帕查库蒂十分震惊，立即派绰号叫“石眼”的鲁米纳维前去平叛。在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中，皇室军队惨遭重创。于是“石眼”将军施出苦肉计，诈称遭到印加王的斥责和毒打，愿意投奔奥利扬泰麾下。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信任后，一天夜里偷偷地打开城门，王军军队一涌而入，活捉了奥利扬泰，奥利扬泰被押送回京，他的鲜血将被用来祭祀太阳神。然而此时老王驾崩，新君不喜武功，他不仅赦免了奥利扬泰的死罪，还让他官复原职，并与科尤尔完成了一段苦难姻缘，帝国复归统一。

《奥利扬泰》十分注意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完整。第一幕，作者就将奥利扬泰摆到冲突的漩涡之中，通过他与仆人的谈话和与最高牧师的谈话揭露矛盾的焦点：他与公主的爱情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奥利扬泰在表露对库西·科尤尔的心迹时信誓旦旦：“我将永世爱这只温柔的小鸽子，我的心只找她一个姑娘。就是在举着镰刀的死神面前，我也会冲上去；即便是一座大山，所有的敌人都来阻挡我，为了拥抱我的库西·科尤尔，我会战斗到死。……海枯石烂不变心，我奥利扬泰决不背叛自己的爱情！”然而忠

实的奴仆提醒他：“魔鬼迷住了你！一旦印加王发现了你的想法，就要砍去你的头，或将你活活烧死。……女孩子多得是，在你老死以前，满可以找到一个可爱的姑娘，何必要走这条路呢？”可是爱情的火焰是无法抑制的，奥利扬泰于是派仆人去给公主送信。不巧这一秘密被最高牧师发现了，于是奥利扬泰告诉他，科尤尔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她怀有了他的孩子。但牧师却仍坚持不要再提这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像法官似的判决说：“尊贵的奥利扬泰，你别老谈这事了！这件婚事不可能，这个戒指碎了，这根线断了，你来梳理这团乱麻吧！你想单独地和印加王谈话？没什么用的，不管你多么悲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也没什么好说的！记着，不管我在哪儿，我要阻止你，打破你的迷梦！”这样，作者一开始就将观众引入问题的焦点和矛盾的核心。

紧接着在第二幕中，作者将观众的视线引入爱情矛盾的另一方面。在印加王宫的一间屋子里，公主正和她母后谈论着。公主不听母亲的劝告，一心想着奥利扬泰，多日的未见使她放心不下，不禁吟唱道：

月亮披上黑纱，
太阳盖上一层灰烬；
大地迷漫着灰色的冷雾，
云彩燃烧得像火焰一样；
此时我的心中，
只有无限悲哀惆怅，
一颗明星坠落了，
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人人都说这是不祥之兆，
将要发生地崩天塌！”

正当公主极度忧伤烦恼之际，印加王帕查库特克来到她面前。她对公主的疼爱，更衬托出了以后惩罚的残酷。他说：

库西·科尤尔，我的心肝宝贝，
你是我胸前的护符，
你是我所有孩子中最出众的玫瑰。
搂住我这温厚的脖子，
像鸽子一样来寻求我的保护。
你在我的肩上安睡吧，
我给你筑起金色的巢窝，
让你自由地舒展羽毛。
你身上寄托着我的最大幸福，
你是我掌上的一颗明珠。
你的眼睛像太阳一样，
映照出太阳的无限光芒。
当你抬起眉睫时，
你的眼睛能收尽天底下的阳光；
当你张开嘴唇时，
你的呼吸能把空气吸完。
只有你才是父亲的一切欢乐，
连我的生命也系在你的身上；
你活着也是为了我，

为了我的幸福能地久天长。

但是，尽管有父王的亲切抚慰，公主依然闷闷不乐，两泪长流。这使印加王六神无主，他唤来歌女表演歌舞，欲以此为公主排忧解难，但仍无济于事，他不得不退出。公主将歌女们轰了出去，自己则恸哭不止。

第三幕，印加上和奥利扬泰等人商谈国务军机，决定是否对外用兵。会议结束时，奥利扬泰向印加王表白了自己的赤胆忠心后，提出了要向公主求婚。这使国王勃然大怒，他将奥利扬泰赶出了王宫，并扬言要惩罚他，于是矛盾最终爆发。

第四幕，悲愤交加的奥利扬泰回到了安蒂苏尤。他对印加王痛恨切骨，于是宣布自己是库斯科的死敌，他要报仇，他要“无情地撕开印加王的胸膛，把他的心撕成碎片，用这个专制魔王的尸体来喂养山鹰。”他宣布要与印加王战斗到死，他要武装成千上万的安蒂苏尤人，使“起义的人像玉米粒那么多”，“让你印加王看我像沙克沙·乌玛峰顶的火山那样爆发，要让你倒在我的脚下。那时候，你还会不把女儿嫁给我吗？我再也不会那样愚蠢地跪在你的脚下来求亲了，我将是印加王，你会看到这一切的，这一切很快就会实现！”最后，奥利扬泰宣布起义，脱离印加帝国，矛盾发展到顶点。紧接着的两幕是奥利扬泰的军队以智慧取胜，打败了印加军队。

第七幕描写了公主的艰辛生活。自从奥利扬泰被轰出库斯科后，印加王便把公主关在太阳圣母修道院里不得与外人相见。在那里，公主生下了一个美貌出众的女孩，名叫伊玛·苏玛。这个女孩渐渐长大，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第八幕。十年后，印加帝国的石眼将军利用苦肉计活捉了奥利扬泰。在最高牧师的帮助下，新王赦免了他，并让他在王宫中挑选一名妻子。奥利扬泰告诉印加王他已与科尤尔结过婚了，但却不知她现在身居何方。正在此时，伊玛·苏玛跑进宫中，请求她舅舅主持公正，把她母亲从修道院地牢中救出来。印加王救出自己的姐姐并让她与奥利扬泰完婚，他十分钦慕奥利扬泰非凡的勇敢和对王室的巨大功绩，于是把王位让给了他。全剧以大团圆告终。

就这样，从矛盾的出现、到发展、到冲突的顶峰，再到矛盾的解决，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此外，全剧结构完整、感情充沛、语言生动、诗韵准确，充满了生活气息，具有浪漫主义的氛围。

（6）没有文字的信息传递文化

我们知道，每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有一定的信息传递手段。而文字是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手段，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思维和语言的符号。但印加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印加陶器上那些类似豆子的符号是一种尚未破译的特殊的会意文字。有的学者则认为，十六世纪来，在库斯科太阳神庙里的金柜装饰物上的那些“图画”就是传说中的象形文字。1980年5月，英国工程师威廉·伯恩斯·格林在经过七年考证后，发表了题为《介绍印加人的秘密文字符号》的学术论文，认为印加文字由十六个辅音和十五个元音组成，这种秘密文字是美洲最早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之一。然而，大多数学者指出，上述几种论断都还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我们认为，印加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创造了结绳记事的方法，管理有序的驿道制度和有关宗教和技艺的教育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也有效地维系着印加帝国的正常运转。

印加结绳记事方法有两种，基普和基尔卡，主要用于辅助记忆、统计和

记事。但这两种方法通常为少数祭司、贵族所垄断。

基普(Quipu)是印加人用羊驼毛或骆马毛编成各种结的彩色绳子。具体他讲,基普是在一个横粗的主绳上垂直地系上许多根细绳,有时多达一百根,像缨子一样垂着。并在垂着的细绳上距主绳不同的距离处打着一个个结头。结头的形状和数量表示数目。距主绳最近的结是个位,再上一个结是十位,然后是百位和千位,越是大数越接近主绳。人们认为基普上最大的数不超过一万。印加人还不知道零的概念,所以在基普上没有表示出来。1981年1月19日,在利马省拉帕斯村发现的印加古记事绳长二百五十米,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记事绳。

细绳的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事物。据专家们研究,褐色表示马铃薯,白色代表银,黄色代表金,黑色表示时间,红色代表士兵。印加人借助绳的颜色,结的形状、大小和位置,来记载各种重要事件和自然现象,也用来进行各种统计,特别是村社社员的人口统计。有人认为,印加境内各地区还存在一种历史基普,用于辅助记忆,记载印加国的编年史。对此,比较谨慎的专家则认为,这还有待于深入调查研究。总之,基普是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而不是一种文字形式。

基尔卡是另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具体他说,基尔卡就是画在毛织品、布板、石板上的没有年表的历史图画符号。基尔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在一些奇怪的石板上画有像堡垒开放状的一排排四边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计算和统计的符号。还有的是在一些布板或织物上画上的历史图画符号。据最初侵入印加帝国的西班牙人记述,他们在库斯科的太阳神庙附近的一所专门的祭司秘方中,发现了贴在木板上的大幅粗布画,画有印加人的传说和历史事件。这间秘方,除了印加王和专门负责保管的祭司外,其他人不能进入。十六世纪,西班牙驻秘鲁殖民总督托莱多曾亲眼见到过那种布板,上面画着印加统治者的像,人像的周围有关于印加神话传说的符号。由于布板的金框被西班牙殖民者劫走,金框中的历史图画被毁,所以,印加人的历史图画符号都没有保存下来。

善于利用基普的专门祭司或官员,称“基普卡马约克”,是印加帝国的会计兼秘书。他们的职责主要是陪同印加王的钦差大臣——图库伊里库,到全国各地视察。钦差大臣是帝国宫廷和各地酋长之间的联系人,也是帝国重要公共工程的组织者。钦差大臣根据印加王和国家的需要,编制劳力统计,征收贡物,挑选民间美女,增减地方官员等。钦差大臣每到一地,按村社为单位召集村民会议。基普马约克根据到场人数进行统计,分派贡物,征召新的奴隶和美女。基普马约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收集描绘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画符号,并把它送往库斯科,备王宫秘密收藏。

如果从传递信息手段的角度来理解,印加人没有文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印加人创造了驿道制度,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交通建设和良好管理是印加人通讯技术和文化上的巨大成就。

古代印加铺砌的驿道,攀山越岭,跨河渡谷,绵延数千里。有两条道路自北而南,贯通全国。一条是沿海道路,北起厄瓜多尔的通贝斯,纵断沙漠,向南贯通秘鲁地带,进入智利中部,全长四千公里。另一条道路是高原道路,北起哥伦比亚,贯穿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进入阿根廷,最终抵达智利,全长五千六百公里。从这两条主干道分出许多小道,把首都同最遥远的地方连接在一起。主干道宽三点五米至四点五米。道路通过有灌溉渠道的平

原地区时，常有栅栏围护，栅栏上饰有动物图像和浅浮雕，精美绝伦。在有些地方，渠道和道路平行，道路两旁栽有果树。在沼泽地带或容易泛滥的地区，道路则筑在石堤上，有时高达一至两米。经过沙漠地区时，道路两边立有树桩。沿高原筑路时，为了人们便于攀登，道路还筑成曲折形；在坡度很陡的地方，则凿成梯级，在岩壁处，则穿凿隧道。在道路被河流和峡谷切断的地方，人们还架设桥梁，铺上横木。有时用大石板，长三至四米。印加人制造的吊桥，巧夺天工，享有极高的声誉。桥是架设在深渊之上的。吊桥的支柱为石柱，分别立在河流或深渊的两边。在这些石柱上拴着五条用柔韧树枝或藤条编成的粗索。三条粗绳构成桥体，两条作栏杆，下面的粗索用树枝编缠住，然后上面铺上横板。栏杆的粗索也与下面的粗索编结，从两侧加固桥身。桥的中部因本身重力而下垂，整个桥身因振动而摇摆。有的吊桥竟长达六十米。为了保护桥梁和道路，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看护和保养，附近村民必须认真维修，不得有误。当时印加人既无马车也无轮车，通报信息，全凭接力快跑传递，公路两旁设有驿站，驻有驿卒，负责传递信息。古印加人靠接力传信息之快，每天竟达二百二十五公里。据说，南部沿海捕获的鲜鱼，运到库斯科献给印加王，只需两天时间。印加人的烽火信号系统组织严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传到很远的地方。印加人修筑道路，其工程水平，远远超过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杰出的工程之一。据亲自考察秘鲁驿道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说：“印加大道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可以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各国的大道相媲美。”

印加人没有文字，但他们有独特的教育方式，把自己的文明、生活习俗、礼仪和工艺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印加人的基本工艺技术知识是在家庭和村社中自然传播的。譬如：手工艺方面，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以此保持手工艺的持续发展。印加人的社会职业分工明显，有时甚至全村人都从事一种手工艺品的生产，代代相传，历久不衰。

印加人通过“知识之家”传授印加文化。“知识之家”是在首都库斯科的学校机构，供库斯科和被征服地区的贵族子弟学习。在“知识之家”里，有专职教师传授各种知识。“知识之家”的目标是培养从事专职工作的专业人才。例如，从事研究战争的知识，掌握和运用基普以及研究克丘亚语，宗教或印加历史等。他们还培养一些专门技术人才，从事道路、房屋建筑工程。“知识之家”的教师，被称为“才子”或“圣贤哲人”。这些“才子”不仅是贵族子弟的教师，而且是宫庭的历史学家和宗教问题顾问，受到人们广泛尊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知识之家”学习期限四年。第一年学克丘亚语，第二年学天文历法，第三年学会表达和识别基普，最后一年学习其他专门知识。

在妇女教育方面，印加统治者把十岁的女孩分为两部分，绝大部分留在村社里，以待出嫁，承担家务和农业劳动；少数美貌、灵巧的少女则被选美进入官府，接受培训，诸如编织、烹调、宗教等，时间长达四年。这些少女被称为“白面相中者”。印加统治者从她们当中选出一部分献给贵族作妾，给皇帝作妃子；也有一部分须发誓保持童贞，供奉太阳神至死，被称为“太阳贞女”。“太阳贞女”的女教师称为“玛玛库纳”（母亲）。她们是未被选去作贵族之妾的成年妇女。培养太阳贞女的地方叫“阿克利亚瓦西”。太阳贞女毕业后，必须终生幽居，类似修道院的修女，只参加宗教仪式，供奉太阳神，为祭司贵族和宗教庆典编织服装、饰品，制作玉米酒和祭品，不得

有任何男欢女爱，否则处以死刑。据传说，印加皇帝每年都要以酷刑处死一些不贞之女，以谢神灵。

第二章痛苦的深渊希望的顶点

许多年以前，我的太阳父亲就启示我，在他和善的孩子们统治了十二代以后，从未见过的怪人就会来征服和镇压我们的王国。他们是勇敢的人，各方面都比我们强。我们也很清楚，我就是第十二代皇帝。因此我向你们预告，我死后不几年，那帮怪人就会来到……

——印加帝国第十二代太阳王海依那临终时的预言。

一、黄金·荣誉·福音——殖民者征服的信念

十六世纪初，走过了千年辉煌之后的南美文明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分水岭。它的耳畔，第一次响起了征服者的脚步声。这些征服者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那个未知世界，在他们脚步匆匆之中，克利斯托弗·哥伦布最先踏上了南美大陆。

十三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为世人描绘了一个财富无穷、神话般的东方世界。在当时，他的游记点燃和激发了多少冒险家的欲望和想象力！两个世纪后，热那亚的水手哥伦布完全沉湎于这个神话中而不能自拔。他日夜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黄金的产地。后来，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哥伦布终于开始了他的远征。从1492年8月3日他的3艘小帆船向西驶入茫茫的大西洋，到1504年间，哥伦布一共四次出航，其中他的第三次航行对于南美大陆来说，可谓意义深远。1498年8月，哥伦布的船队缓缓驶入了今委内瑞拉的帕里亚湾，那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水果甘美，居民和善，一切都酷似人间仙境。哥伦布对此赞叹不已，他甚至相信奥里诺科河是从天堂里流出来的，而自己则已经接近伊甸园了。从帕里亚湾出来以后，哥伦布到达了库马拉。这一带盛产珍珠，热情的印第安人以为满脸髭须的白人是从天上来的神祇而对他们大加款待。最后，哥伦布从那里回到了西班牙，尽管他到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然而他却向欧洲殖民探险者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同时他的到来也意味着南美文明独立发展的时代行将结束。

哥伦布之后，探险家光顾新大陆者络绎不绝。1499年8月，西班牙航海家伊·尼尼奥和克·格拉绕过了阿拉亚半岛，对西经64°—66°之间的新大陆北海岸进行了考察；同年，阿·奥赫达在北纬6°附近到过圭亚那，绕过巴拉瓜纳半岛后进入一片海湾。在那里，他发现海边的印第安人都居住在水上的棚屋中，于是便将此地称作小威尼斯，亦即委内瑞拉。他最后直达马拉开波湖；1500年2月，维·平松到达巴西东北部海岸，然后他向西北航行，发现了亚马孙河口；同年4月，莱佩到达了大陆东岸的突出部，并对亚马孙河下游400公里的河段进行了探险，而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率领的远征队此时在南纬17°的巴西海岸登陆，他在那里树起了一个刻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这块土地也因之被称作“圣十字地”。探险家中亚美利哥·韦斯普奇贡献最大。1501年至1502年间，他率队详细地探查了南美东部的海岸线。他从圣罗克角出发向南航行，发现了拉普拉塔河，后来到达南纬47°的圣豪尔赫湾。至此，他坚信这块大陆不是亚洲，而是新大陆。他的观点得到了地理学家瓦尔德西穆勒的认同，1507年，这位地理学家在他的《宇宙志导论》一书中，便以亚美利加作为新大陆的名称。从此，南美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第一次出现。随着探险活动的不断深入，古老的南美文明一步步地被卷入到历史的漩涡中去，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十五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制内部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要求开辟贸易新途径和扩张领土。这种内在的要求加上地圆学说、航海术的发展等外部条件的具备，使远洋征服成为了可能。在当时，征服者飘洋过海的首要目的便是黄金，他们对黄金的崇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503年哥伦布在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信中说：“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得到一切。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这种狂热决非个人的贪欲，而是代表了当时西班牙王室和整个工商业界的要求。恩格斯对此曾经尖锐地指出：“黄金

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殖民征服者的第二个重要目的便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当时的西班牙是狂热的天主教国家，教会极力要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宣称要把异教徒从黑暗世界里拯救出来，加以开化，使他们沐浴基督教文明的温暖阳光，过上幸福日子。强行将福音传遍世界便成了当时巨大的精神动因。另外，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西班牙正值鼎盛时期，王室一再要扩疆拓土，所以极力提倡武功。国王常授予战功卓著者以贵族头衔和其它特权，这些举措就刺激了大批冒险家和落魄之士去新大陆追求功名利禄。这三个目的，在当时被归纳成一个口号：“黄金、荣誉和福音”。在高呼这个口号的探险家们之后，殖民者便开始了以剑和十字架对南美大陆的征服。接下来便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最终，失掉了旧世界的南美文明就从这里转弯……

二、太阳的陨落——印加帝国的覆亡

十六世纪初，正当西班牙殖民者叩关入侵之际，南美文明的代表印加帝国已经走到了它的顶峰。在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印加人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成就，他们以勤劳和智慧将这里变成了人间乐园。然而这样一个人间乐园为殖民者所知，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

1511年，西班牙探险家巴尔布率众征服了巴拿马地峡的一个印第安部落之后，得到了大量的黄金。但由于分赃不均，他的部下之间剑拔弩张，拔刀互斗起来。这使在场的一位印第安酋长大为不解，他告诉巴尔布：“你们何必为这点意思而大动干戈呢？如果这就是你们远离家乡、冒着生命危险所要追求的东西，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有一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吃喝用的器皿，都是用金子做的，那儿的黄金如同你们带的铁一样便宜。”说完他向南方一指，那地方就是印加帝国。正当巴尔布准备南下寻找这个黄金国度时，他却被新西班牙总督疑为隐瞒黄金所在地而砍去了脑袋。他死后，有关南方那个神奇国度的传说不断涌来，而且愈来愈动人。这些传闻大大地刺激了殖民者的征服欲，在一批又一批的探金热潮中，1524年，印加的征服者皮萨罗终于出发了。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本是西班牙一位穷乡绅的私生子，作为印加帝国的征服者，他却一生连签写自己的姓名也没学会。刚到美洲时，除了一件外衣和一把剑外，他一无所有。皮萨罗曾是巴尔布征服巴拿马远征队中的一员，1524年11月，他和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伙：逃避杀人罪的亡命之徒阿尔马格罗和有“疯子神父”之称的卢奎一起，率领一百多人的一条小船，从巴拿马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远征，最终到达哥伦比亚的圣·胡安河口。这次远征收获甚少但损失却很惨重，在一次与印第安人的较量中，远征队死伤多人，阿尔马格罗被揍瞎了一只眼睛，皮萨罗也只以躺在地上装死方才保全性命。1526年，皮萨罗第二次南征。当他们历尽艰险到达厄瓜多尔海岸的加略岛时，巴拿马新总督却因为不信任而要求他们放弃征服。绝望之中的皮萨罗拔出剑来，在沙地上划了一道线，向南一指道：“选择吧！诸位，愿去秘鲁发财的到这边来，愿回巴拿马受穷的到那边去。要我说，到南方去！”结果只有十三个人跨过了那道线，追随皮萨罗继续南下。他们最终到达了印加帝国的边境城市通贝斯，但由于后援不继，皮萨罗只好就此折回。这次远征尽管得到的黄金不多，但皮萨罗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印加帝国的第一手信息，为以后的征服创造了条件。在赢得印第安人友好接待的同时，皮萨罗的征服狂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通贝斯，他对当地的印第安人大肆宣扬西班牙国王是最伟大和有威力的国君。他还曾举行过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典礼：让当地的一个印第安人举起西班牙旗帜以表示臣服。这出丑剧让印第安人莫名其妙而放声大笑，而皮萨罗却很是满足。

1527年底，被两次远征耗得山穷水尽的皮萨罗回到了西班牙。经过周旋，1529年7月在一份协议书中，西班牙国王授予他在普那岛以南六百英里的地区内具有“发现和征服全权”，而且任他为征服地区的终身总督。曾在加略岛上追随他的十三人也全被授予骑士称号。1530年，皮萨罗重返美洲，次年初，他率领一百八十多人开始了最后的征服。然而皮萨罗自己也未曾料到，这次远征可谓是天赐良机，因为此刻的印加帝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1526年，印加王海依那不幸在天花瘟疫中丧生，他死后，将疆土分给了

两个儿子：阿塔华尔帕在北部，华斯卡尔在南部。但不久，两个人就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起来。华斯卡尔得到了宗教领袖的支持，而阿塔华尔帕则与军队结成同盟，兄弟俩先后打了九次恶仗，双方伤亡惨重。1532年4月，在库斯科附近两军展开了激战，日出日落，双方拼杀了一整天。结果阿塔华尔帕获得了胜利，他占领了库斯科后俘虏了华斯卡尔。在战争的废墟中上台的阿塔华尔帕要以鲜血来祭典夺得的皇位，他残杀了所有支持过华斯卡尔的贵族和军政要员，还将王室成员1500多人处死，库斯科周围的和平居民被杀去了五分之一左右。尸骸遍地，血流成河，库斯科昔日的繁华变成了“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景象。这场内乱对印加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据史家估计，死于内战者竟达十万之多。同时内战也破坏了通贝斯等边境城市，致使国门洞开，不足以抵御入侵。二是内战使印加帝国分裂，有些部族后来竟成了西班牙入侵者的忠实帮凶。正是因为这场内乱，才使皮萨罗仅180人组成的远征队成了庞大的印加帝国的埋葬者。

皮萨罗到达普那岛时，就得知了印加国内乱的消息。他们在普那大肆砍杀印第安人后，便渡海向通贝斯行进，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占领了这个被内战破坏得千疮百孔的边境城市。与此同时，皮萨罗入侵的消息经驿站千里传送，很快就报告给了阿塔华尔帕。这位印加皇帝派人送去了大量的美女和黄金，劝说皮萨罗退出帝国的领土。然而狡猾的皮萨罗一方面极力向阿塔华尔帕保证友好，另一方面又和支持华斯卡尔的势力拉笼关系。这使得阿塔华尔帕对殖民者犹如雾里看花，辨不清其真实目的，因而也就未做任何防备。

皮萨罗率队继续向南，在印加帝国千里撤防的皇家大道上行进如入无人之境。1532年秋，他们翻过了安第斯险峻的山隘后，到达帝国北部重镇卡哈马卡，而此时，印加皇帝阿塔华尔帕的大军就驻扎在距此不过两英里的库努温泉附近，这样面对面的较量就开始了。皮萨罗派人去阿塔华尔帕营中要求会晤，印加皇帝用黄金器皿盛装着水果美酒款带了使者后，从容地答应明日相见。这天夜里，皮萨罗纠集了全体队员，布置了突袭方案：他将众人分成三队，隐藏在广场旁边的小屋中，并将两门小炮对准广场，约定以挥动白色缓带、呼叫“圣地亚哥”为信号开始冲杀。这一夜，惊恐和激动使这帮基督徒们彻夜难眠，他们在修道士的率领下集体做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并宽恕他们即将犯下的罪孽。

1532年11月16日傍晚，印加帝国终于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而愚昧狂妄的阿塔华尔帕却毫无警惕。他率领五千名手无寸铁的随从进入了广场。夕阳的余晖之中，他的黄金宝座光芒四射。接下来便是基督徒传播福音的一幕。神父瓦尔弗莱特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捧着圣经去向印加皇帝布道。结果，他的有关上帝和三位一体的说教，被蹩脚的翻译译成为一个上帝加上三个上帝，这使在场的人不知所云。当讲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印加皇帝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异和鄙夷的神色。最后，瓦尔弗莱特说：“如果你愿意受洗皈依圣教，并服从督军（即皮萨罗），像一切基督徒一样行动起来，督军将保护你，否则就要用残酷的战争对付你，用火与剑消灭一切手持长枪的人。”阿塔华尔帕平静地让神父讲完，然后说：“这里的一切都归我所有，我不知道圣彼得把土地赐给了任何人，即使赐给了，我也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改变我的信仰，我不知道创造天地的人和基督，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太阳创造的，你们的上帝是被他所创造的人处死的，而我的上帝——太

阳父亲，现在还活在天上，照看着他的孩子们！”说完他把圣经扔到了地上。瓦尔弗莱特神父赶忙报告了皮萨罗，并对他说：“马上攻击，我宣告你们无罪。”于是在皮萨罗一声令下，伏兵从四面八方冲进广场，一时间战鼓齐鸣、炮声震耳，毫无准备的印加人一片混乱，饮弹身亡和因拥挤而丧生的印加人尸体堵满了每个出口。据估计，有 2000 多印加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而殖民者却无一伤亡。曾夸耀没有他的命令天上的鸟儿也不敢飞的太阳王阿塔华尔帕，最终沦为了皮萨罗的阶下囚。

皮萨罗以阿塔华尔帕为人质向印加人索取赎金。赎金的数目简直骇人听闻：必须用金子填满一间长二十二英尺、宽十七英尺和一人多高的屋子。当时消息一传出，为营救自己的领袖，印加人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将金银运往卡哈马卡。赎金很快就够数了，然而这笔价值二千多万美元的财富最终仍挽救不了阿塔华尔帕的性命，不愿放虎归山的皮萨罗决定处死印加皇帝。他们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幕审判丑剧后，便以篡夺王位、杀害兄长、多妻、血亲通婚、崇拜邪神和阴谋反对西班牙等十二条罪名判处阿塔华尔帕火刑，殖民者唯一的宽仁则是告诉他，如果皈依天主教，火刑可以改为绞刑。1533 年 8 月 29 日深夜，阿塔华尔帕在卡哈马卡广场上被绞死，他的尸体后来被印第安人从教堂中取走，制成木乃伊，埋藏到一个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地方地去了。

阿塔华尔帕死后，海依那的后代和高级贵族继续分裂，他们为了各自的显达和消灭对手，纷纷投靠西班牙强盗，助纣为虐。皮萨罗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而各个击破。1533 年 11 月，古都库斯科被占领，到了 1535 年，整个秘鲁全境被征服。就这样，在这片信奉太阳神的土地上，太阳最终陨落了，而皮萨罗，这个西班牙的殖民头子，一举成了印加土地的实际统治者。1535 年 1 月 18 日，他按照西班牙的传统形式建筑了利马城，即“诸王之城”，这是秘鲁历史的新起点。然而这些最初的征服者下场也是不妙的，征服的胜利反而加速了他们内部的分裂。由于野心和贪婪，每个人都把伙伴当成仇敌。在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内讧中，皮萨罗、阿尔马格罗等人相继暴死身亡，而西班牙的王室和教会就在这种明争暗斗中趁此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

皮萨罗将庞大的印加帝国从南美版图中永久地抹去了，在野蛮的蹂躏之中，古老的文明在哭泣……出于对黄金的本能和渴求，殖民者杀人放火、洗劫皇宫、神庙和陵墓，四处抢掠。如前章所述，库斯科的太阳神庙是印加财富和艺术的宝库，这里有历代皇帝的木乃伊和精妙绝伦的黄金花园。皮萨罗进入库斯科的当天，就派人去将太阳神庙抢劫一空。他还派人将库斯科二十多万居民挨家逐户地进行搜抢，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细工。为了便于运送，他们将这些金银器加以熔化，多少精美无比的艺术品毁在了他们手上！据史家估计，西班牙殖民者在最初几年里所掠得的金银价值竟高达二千多万美元！然而他们对印加的文明破坏是难以用这笔帐来算清的，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当初一位征服者临终时的忏悔吧！1589 年 9 月 15 日，奄奄一息的雷赫赛马在他的遗嘱中写道：“我是一个何等的天主教徒啊！我要忏悔以减轻灵魂上的负担，因为我们从印加君主手中夺走了属于他们的王国，……他们将王国治理得没有小偷，没有坏蛋，没有懒虫，没有荡妇……他们从不争执，无论事之大小，一切都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我们以丑恶的行为毁灭了如此治理有效的人民，对此，我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由于殖民者的贪婪残暴，当时在印第安人中竟产生了这样一个神话：西班牙人不是陆上的人种，而是海的后代，即毕拉科琪（印加人把海叫做科琪，

把泡沫叫做毕拉)。这种人形动物一从海中爬上大陆，就要毁灭世界。他们为了夺取黄金而抢劫、厮杀，时而冲到这儿，时儿冲到那儿，永不满足。印加人在儿童还不会说话时就指着西班牙人说：“看，那儿走的是一个毕拉科琪！”表明了他们深深的诅咒。

印加帝国在殖民征服中覆亡了，然而印加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成就却永远辉映历史星河。今天，面对太阳神庙的断壁残垣，这些文明的碎片岂不给我们以更多的沉思？

三、圣十字地和白银的河 ——南美其它地区的被征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美其它地区被征服的情况。

智利的征服。皮萨罗等人征服秘鲁后，便以此为中心向北向南扩张。1535年，阿尔马格罗被西班牙国王任命为未来智利那片土地上的总督后不久，他便率领大批冒险家和众多被奴役的印加人从库斯科出发向南进发。这次行军是十分悲惨的，他们翻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后，才发现自己处于阿塔卡马沙漠的不毛之地。历经艰辛穿过沙漠，等待他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阿劳坎人的顽强抵抗。远征队损失惨重，沮丧之极的阿尔马格罗无奈之下只好沿海岸返回库斯科。不久，他又在那里的内战中掉了脑袋。1540年，皮萨罗又将智利的征服使命交给了德·瓦尔迪维亚，后者率众沿海南进，直到马波齐河，1541年他便在那里建起了圣地亚哥城；1542年，他又修建了瓦尔帕莱索港口，这在当今仍是智利最重要的港口。与此同时，瓦尔迪维亚不断地与阿劳坎人作战。骁勇善战的阿劳坎人使西班牙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1553年，他们在年轻领袖劳塔罗的领导下与瓦尔迪维亚展开决战。战斗开始后，阿劳坎人按事先制定的车轮战计划，第一队战士挥着长矛向敌人冲去，但在殖民者火器的强大优势下，他们几乎全部牺牲；但紧接着第二队又冲上去，之后是第三队……最终，西班牙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瓦尔迪维亚被俘，劳塔罗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处罚这个殖民头子，他对瓦尔迪维亚说：“你来我们这里是为了获得金子，现在我将满足你的愿望。”说完便将黄金熔液灌进了他的嘴里。

这之后德·门多萨继续展开殖民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智利的征服，但阿劳坎人的斗争却一直坚持到十九世纪，民族之星劳塔罗更是英勇不屈的象征，直到今天，智利许多地方都竖立着他的雕像。

阿根廷等地被征服。“阿根廷”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是“白银”之意，但当地并不产白银，那么此名缘何而来呢？原来在西班牙人踏上这片土地以前，传说这里有一个“白帝”统治的国家，还有一座取之不尽的银山。1527年，西班牙航海家塞巴斯蒂安·加沃托进入拉普拉塔河，看到当地印第安人确实佩有许多银制饰物，于是便误以为传闻得到证实，他就将拉普拉塔河称为“白银的河”，这片土地也以银命名，“阿根廷”一词从此沿袭至今。

从1531—1582年五十年间，西班牙人在拉普拉塔地区展开了殖民活动，他们对印第安人进行残暴屠杀竟多达12次。1580年，德加莱建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基本上确立了对拉普拉塔地区的统治。

巴西的被征服。葡萄牙人在殖民地开拓方面并不比西班牙逊色。还在十五世纪，被誉为大航海家的亨利王子就创办了航海学校训练海员，他还多次派人向西和向非洲南端航行。到了十六世纪，葡萄牙尽管将目光主要放在东方，然而对美洲也未置之身外。最早为葡萄牙国王在南美大陆上树起十字架的是航海家卡布拉尔。1500年3月，他率领船队本想绕道好望角去印度，结果却被季风吹到了巴西海岸。4月22日，他在今天的巴伊亚以南二百英里处一个名叫塞古罗港的海岸登陆后，便在岸边树起了一个刻有葡王室徽章的十字架，他将此地称作“圣十字地”，并宣布它已归属葡萄牙。卡布拉尔以为自己发现的仅是个大岛，便没有停留，除了派人向王室报告以外，他继续向印度航行。尽管象征归属权的十字架已经树立起来，尽管王室也多次派人来

勘探过，然而巴西这片土地起初却始终扮演了灰姑娘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当时葡萄牙已有一个富庶的东方；其二则是葡萄牙只是一个 150 万人口的小国，力量不足以进行更多的征服，而巴西本身又不可能像印加帝国那样引起轰动效应。

这个时期巴西出产的一种木材被看成是唯一的财富。这种树名叫“巴西木”，它的木质中含有一种在当时被认为十分珍贵的红色染料。后来“圣十字地”逐渐被这种树木的名称所代替，这就是巴西国名的由来。

到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长期不重视，法国人在巴西海岸大肆活动，得寸进尺；而此时葡萄牙东方殖民地的香料价格大大下降，迫使国王若奥三世不得不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这块长期被冷落的“圣十字地”。1531 年，大贵族索萨率领 400 多名移民到达巴伊亚海岸，在那里，他驱逐了长期盘踞的法国人并逐步向内地推进。1532 年他兴建了圣文森特城，建立起了葡在巴西的第一块永久性殖民地。1553 年皮拉蒂宁加城建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圣保罗。索萨的远征确定了西、葡之间在南美殖民地分界线，随后王室便在巴西实行分封制，将沿海分成十三个管区，由亲信大贵族管理来发展大种植园。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史是巴西殖民地化的历史，也是印第安人充当奴隶的血腥史。大量印第安人被奴役，种植园主只需一根棍子、一块面包和一块布就足以让奴隶创造出巨大财富。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他们还经常组成奴隶捕猎队深入内地，袭击土著部落，或进行长期战争。他们手段之卑劣毫不比西班牙人逊色。比如故意把那些患天花、腥红热病死的人们的衣服放在树林里，让印第安人取用后，便在他们中间引起可怕的瘟疫。总之，屠杀和谎言，煽动和挑拨，这便是葡萄牙把巴西变成殖民地的真实写照。1548 年，王室设置总督管辖整个巴西，不久第一任总督索萨兴建了巴伊亚，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近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

此外，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乌拉圭等地也相继被并入了西荡的殖民地版图。随着南美大陆的被征服，古老文明的载体印第安人逐渐濒临绝灭。福音的传播者们一手举着圣经，一手大肆砍杀。拉斯·卡萨斯曾经对此作了如下揭露：“对于这些温顺的羔羊，西班牙人一踏上他们的国土，便露出凶残、贪婪和虎狼般的面目来，他们用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办法来屠杀印第安人。老人、儿童、妇女成了他们逞凶肆虐的牺牲品。他们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用标枪和剑剖开她们的肚子……他们把婴儿从母亲怀里夺过来，用石头砸碎脑袋……”据说皮萨罗洗劫库斯科后，西班牙人竟以杀人为乐！而在秘鲁的蒂马纳，一个名叫马丁的葡萄牙人为了让他的狗能追捕印第安人，竟惨绝人寰地拿印第安人的四肢去喂养它！除了杀戮以外，殖民者还奴役印第安人从事各种艰苦劳动。在皮萨罗征服印加及后来的内战中，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沿岸的路上，输送供应物资、接运掳掠赃物，完全靠着印第安人用肩扛过崇山峻岭和茫茫沙漠，有多少人因不堪其苦而倒毙于路！

随着印第安人口的锐减，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殖民者便常组织大规模的猎捕。一次，西班牙人卡利塞率众深入帕里亚湾七百英里，捕捉了大量印第安男女。在这些赤身裸体、疲惫不堪的人群中，有不幸的母亲，年幼的孩童，备受凌辱的姑娘……他们全被用绳子或铁链拴住脖子和手，在漫长的押运途中，饥饿和悲伤使大批人死去，而最终被卖为奴隶的还有 4000 多人！另一幕更为悲惨。一个名叫伽斯卡的西班牙殖民者率领一支 1500 人的远征队去讨伐冈萨罗·皮萨罗。这个家伙役使了大批印第安奴隶为他运送武器和给

养。为了防止一哄而散，他用长绳把印第安人拴成长列行进。在沙漠和崇山峻岭的行军中，许多人饥渴难当而举步维艰。但是，要解开任何一个落伍者的绳索都会延误行军速度。于是这个“聪明”的西班牙人发明了一个简便的办法：凡是拴在四肢上的，砍断肢体；拴在脖子上的，则砍去头颅。对他来说仅是一刀之劳，却夺去了多少印第安人的生命！

屠杀和蹂躏竟使有的印第安人选择了自我毁灭以求解脱苦难。在巴拉圭，瓜拉尼人到十六世纪中期差不多完全灭绝了，因为他们下令绞死所有的儿童，以免孩子们长大了沦为西班牙人的奴隶。在哥伦比亚，大批印第安人走进森林自缢而死，没有绳索的，便彼此把头发拴在树上，然后各自吊在那里，以凄惨恐怖的怒吼和哀号向上苍诉说他们的苦难，直至生命的终结……英国作家霍维特曾经写道：“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至少屠杀了一千万印第安人。读那些记载，谁也禁不住愤怒，恨不得上帝伸出手来，把这些暴君从地面上彻底消灭！”

殖民征服特别是印第安人的绝灭，严重破坏了古老灿烂的南美文明。这个征服时期尽管十分短暂，但却具有深远的意义，走出千年孤独的南美大陆从此加入了世界体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了全世界的历史”。

四、血与火、刀与剑——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从被征服到十九世纪初发生独立运动、建立民族国家为止，整整三百年间，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对南美大陆实行血与火的统治和奴役。同时由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本身还是封建专制的重商主义国家，因而它们的殖民统治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专制和重商主义的烙印。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西班牙的统治状况。

(1) 西印度院和总督辖区制。

在征服和开拓初期，殖民者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主权，他们自筹军费、自建军队，王室只处于赞助地位。国王与他们之间往往以一纸协议便规定了双方在这一冒险事业中的分赃：征服者向王室交纳所获财物的 1/5 并承认国王的宗主地位，而国王则以各种封号和特权赏赐他们。这些征服者实际上成了殖民地上的土皇帝，他们各自为政，相互倾轧，这种混乱状况显然对专制王权十分不利，于是建立系统管理便成了必要。1524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在马德里建立了统一管理美洲殖民地的中央机构：西印度院，这个由法官、神甫、参议员、史学家、地理学家等人组成的机构是美洲各殖民地的发号施令之所，它制定政策、颁布法令、委派官吏、审核财政等，一时成了国王的喉舌，到 1635 年，它所颁布的法令竟达四十万条以上。然而设在西班牙的西印度院是无法对南美大陆进行直接统治的，这项任务便由总督来完成。1542 年，西班牙在利马设置了秘鲁总督辖区，贝拉为第一任总督。在以后的两个世纪内，整个南美大陆都处在秘鲁总督的统辖之下。到了 18 世纪末，总督辖区增至三个：

新格林纳达总督辖区：1718 年设于波哥大，辖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地；

秘鲁总督辖区：辖今秘鲁、智利等地；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设于 1776 年，辖今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等地。

此外，还在总督之下设立若干都督辖区。由国王任命，总督是国王在殖民地的代表，荣登此位者是对王室忠心耿耿的贵族。总督在殖民地大权独揽，显赫无比，他的意志差不多就是法律。每当新的总督到达时，殖民地人民都要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建立凯旋门。一次有位矿场主为了迎接新督来到利马，竟用白银铺了一个十字路口。

为了防止总督权柄过重，一系列监督限制措施相继出台。王室规定：总督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任期不得超过五年，不能携带已婚子女赴任，不能任人唯亲，不能在殖民地购置产业等。此外，王室还常派钦差大臣前往巡视，总督周围也是暗探成群。尽管如此，毕竟是天高皇帝远，王室鞭长莫及，牵制措施往往流于形式，致使总督们实际上成了独霸一方的海外天子，他们将自己的任期看成一生中“永远不会再有的幸福时代，在这些年代里，假如不置下财产，就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强取豪夺、竭泽而渔，粗暴和监禁、流放和处死便成了他们的统治特征。

(2) 恩科米达制和大地产权制。

恩科米达制即是委托监护制，这种制度本是西班牙国王在与摩尔人的战争中奖励有功之臣的一种封建领地制，皮萨罗征服秘鲁后又将它推行到南美

地区。恩科米达制的具体内容如下：将印第安人以区域为单位委托给白人殖民者监护，对于印第安人，监护主则有“教化”之职责，使他们能够领会基督的福音，沐浴文明的阳光。监护主在自己的区域内征收贡赋，但他却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且一旦国王和殖民政府征召，他们必须自备戎装鞍马，率军效劳。印第安人在名义上是“自由”的人，并能分得一块少得可怜的贫瘠之地。印第安公社内部事务则由酋长管理。印第安人一生下来就被固定在监护区内，他们不能离开居住地，必须对监护主承担一定的劳役和地租。可怜的农奴们往往必须供奉四个主人：向国王交纳赋税；满足监护主的穷奢极欲；讨好中饱私囊的收税官；养活不劳而获的部落酋长。这些受层层盘剥、生计多艰的印第安人甚至有时连自己也养活不了。1720年，王室一声令下，恩科米达制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大地主制，它与前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大地主和庄园主往往由先前的监护主摇身一变而来，他们不但拥有名义上属于国王的原有土地，还不断鲸吞蚕食印第安人的份地，失去了土地的印第安人被迫做了大地主的雇农。庄园主十分残忍刻薄，他们常常用预付工资或赊购货物的办法，使雇劳集债一身，永远没有还清之日，从而世代代沦为债务奴隶。

此外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区，还盛行种植园土地制。这种制度的残酷性比起前两种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种植园主不但另有土地，还占有劳动者本身，农奴的境况更加悲惨。

（3）双船队制。

为了垄断贸易，防止海盗袭击，从1543年起西班牙开始实行双船队制。这种制度即是将开往美洲的船只组织起来分成两队，第一个船队叫做法洛塔，在四五月间起锚开往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所载货物销往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另外一支船队名叫洛斯加莱阿内斯，于八九月开往哥伦比亚的古老港口卡塔赫那，货物主要倾销南美各地。船队一般有40—70艘商船，并有6—8艘军舰护航，除了运送货物外，大批殖民地官吏、士兵、教士和商人也随之而来。洛斯加莱阿内斯船队抵达卡塔赫那后，利马总督便传令将货物运往太平洋岸的贝里欧港，并在那里举办盛大的集市。筹办集市颇费时间，开集时四面八方的人都闻风赶来，广场上货物堆积如山，周围是临时搭起的掩护棚。商人、伙计、官员、行会代表、妓女、水手和骡夫等相集如云，此时的赌博斗鸡更是盛极一时，但当集市一过，贝里欧港又变成一座死城空空如也，充斥着垃圾和臭味。

船队在指定港口卸下货物后，便满载南美的金银、糖、可可、靛蓝等土特产开往哈瓦那，与法洛塔船队相汇合，次年三月，两个船队一道返航西班牙。另外，当时西班牙船不准直接开到阿根廷，货物要从利马用骡驮过安第斯山，三千英里的辗转运输，使货物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成本竟增加了八倍，耗时也达两年之久。

双船队制这种垄断性贸易的利润常常惊人地高达300%。不过，遇险船翻、海盗劫掠等因素也使这种航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持续了两个世纪后，由于西班牙本身国势日衰，1749年，双船队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4）社会金字塔。

在殖民统治下，南美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

半岛人处于金字塔顶端，他们是国王派来的军官，各级官吏和教会僧侣等，当时流行把他们称作“新来娇客”，这些人身居高位，显贵无比，掌握

了殖民地几乎全部大权。

克列奥人。即土生白人，是殖民者和移民的后裔。他们中既有大地主和种植园主，也有在政府、军队中担任低级职务的寒士阶层，一些自由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也多由他们从事。尽管同为西班牙人的后代，但他们却一向为半岛人所排斥。据统计，在殖民三百年间总共 170 名总督和 602 名将军中，克列奥人只占 18 人。克列奥人的敏感心理使他们将所受到的蔑视转化为对宗主国深深的矛盾，分立主义因之而产生。

印第安人。在监护制下，印第安人为西班牙人生产劳动，交纳人头税和从事繁重的劳役。受害至深者莫过于矿工了。在秘鲁，当印第安人被征发去矿井时，他们就先卖去自己的全部财产，而他们的朋友则为他们举行一次真正的葬礼，因为每五个被征者中就有四人一去不返了。在波托西银矿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印第安人每日必须工作 18—22 个小时，死亡是他们唯一的休息，矿井口往往群尸杂横，啄食人肉的乌鸦布满了天空。

黑人处在金字塔底端。1500 年前后黑人被贩运到南美大陆后，他们便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奴隶。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短缺，从非洲运来的黑面孔也就越来越多，蒙得维的亚当时成了有名的奴隶贸易港。黑人地位低下，一无所有，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下面这个故事便足以说明他们受害之深。据说曾经有位种植园主发现他的一个奴隶不堪其苦而准备一死了之，为了避免劳动力的损失，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但毫无效果。这位种植园主无奈之下便装腔作势地拿出绳索，威胁着要与这个奴隶同归于尽，可怜的奴隶吓得被迫打消了自杀念头，因为他唯恐与奴隶主一道死去，来世还要遭受他的奴役。

此外，再加上处于底层的印欧、黑白等混血人种，就构成了殖民地时期南美的社会金字塔。

五、十字架的天下——教会魔影

为了纪念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1992年美国上演了一部由马里奥·费拉蒂编著、米巴庇·慕罗洛作曲的音乐剧——《相遇五百年》。该剧的第二幕颇发人深省：西班牙人登上大陆后与印第安人互赠礼品，他们送去了梳子、镜子等小物件，却得到金盘、项链等丰厚的回报。最后，教士送去了十字架，印第安人却不知所措，这时教士吻着十字架，对着它跪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向印第安人示范，教他们赞颂“圣母玛丽亚”。如梦的音乐声中，出现了西班牙伊莎贝拉王后的幻象，她告诉殖民者：“要征服全世界，拯救更多的灵魂皈依天主……”新的土地，新的永恒的灵魂，这就注定了在征服和未来三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天主教会要扮演一个非同凡响的角色。让我们还是先从教会分界线谈起。

1493年4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十分从容地一刀，便把地球上的非基督教世界劈成了两半：以亚速尔群岛以西

一百里格为界线，以西以南属于西班牙，以东以北属于葡萄牙。他还特别宣布了西班牙王的子子孙孙是那个地带“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一切版图、领地和城市的领主，拥有一切完全的、自由的权利、权威和司法权。”这就是著名的教会分界线，它表明了当时西、葡两家对殖民地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还在1493年2月，哥伦布发现“印度”的消息一传开，两个国家就立即展开了外交争斗，西班牙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向教皇提出了对印度的主权要求，而葡萄牙国王约翰则担心哥伦布的发现会妨碍从葡绕道好望角到东方的航线，从而建议划分各自的领域，教会分界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然而教皇的慷慨并未缓和两家的矛盾，又经过一年谈判之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德西里亚斯条约》，将分界线移至佛得角以西三百七十里格处。西班牙自己也未料到这一小小的移动，使分界线正好穿过巴西，贝伦至圣多斯以东的南美地区，就成了葡萄牙未来的领地。

一位印第安人曾说：“教皇拿不是自己的东西送礼，必定是喝醉酒了。”然而教皇则有自己的理论来充分说明是上帝给了他划分世界的权力。这种基督教征服权理论的逻辑是：既然上帝为了普世众生的平等而创造了世界，因此一切生命对于世界上的财富均可以自由享受；而且福音书说过：“去吧，去教导全世界各族人民。”因此对于传播福音，任何人不得阻碍；而既然那些信奉邪教的野蛮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就应当用烈火将他们烧成灰烬，他们所占之地都是没有合法所有主、宗教上的无主地带，而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则有权将这些地方分给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国君所有。教皇的这种理论既为他提供了划分世界的依据，同时也使殖民征服深深打上了宗教征服的烙印。

殖民征服开始后，征服者除了取得黄金外，传播福音也是一项重大的神圣使命。费尔南多·里奥斯在《西班牙在美洲的行动》一书中说过：“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代，西班牙以两种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向前推进，一种是军事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前者的目的在于攫取权力、占领土地和掠夺财富，后者主要目的在于赢得基督的信徒。”当时几乎在所有殖民开拓者的意识中，上帝的观念和发财的观念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在每次征服行动中，往往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把《要求书》交给印第安人，这个由西班牙国王钦定的通告追根溯源地从上帝创世界说起，它宣称：上帝创造了地球万物，

他所创造的一男一女经过五千年的繁衍便成了当今的人类。上帝把人类交给一个人去统治，此人即是圣彼得，他以后继任者就是罗马教皇，而教皇又把这块大陆赠送给了西班牙王和王后。因此，你们（印第安人）必须臣服西班牙王，自愿自觉、毫不保留地成为基督徒，承认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皮萨罗在 1532 年 11 月 16 日的那场大屠杀前，还要让神父在阿塔华尔帕面前大讲一通基督教的福音了。

除了殖民征服者扮演了福音传播者这一角色外，天主教神甫从一开始就走在士兵的后面，犹如月影随人一样地进了新大陆，他们往往利用基督教义来麻痹印第安人的反抗意志，诱使他们接受被征服的命运，以求进入来世的天堂。从 1520 年开始，天主教的各类传教会，如方济各派、多明我派、耶稣会等团体纷纷涌入南美大陆，据统计，仅十六世纪就有 5400 多名传教士远渡重洋来此。1545 年，利马大主教区的建立，标志着天主教在南美地位的正式确立。此后各地的宗教势力大大发展，比如在哥伦比亚就相继建立了圣马尔塔、卡塔赫那、波帕扬主教区，1562 年又建立波哥大主教区；十六世纪中叶的利马城，二万六千居民中竟有十分之一的是教士；在厄瓜多尔，十七世纪仅有 2.5 万人口的基多，就因建有十来座华丽的教堂，十所修道院，两所教会学校和一些小礼拜堂而获得了“美洲的寺院”的称呼；同时期的圣地亚哥也因教堂众多而被人们称作“印第安人的罗马”。这样到殖民统治末期，整个南美发展到十个天主教区、三十八个主教区以及许多的地方教区，成了名副其实的十字架的天下。

然而南美大陆上教会最高权力并不掌握在罗马教皇手中，西班牙国王意识到天主教是成功征服和统治印第安人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他在 1508 年努力争取到了直接管理殖民地教会的权力，而在 1551 年的一项训谕中，教皇把同样的权力交给了葡萄牙王。也正因为权柄握于国王手中，天主教便为残酷的殖民统治罩上了一圈灵光。在南美，教会便是上帝，它们的统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严格地控制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教堂总是矗立在中心广场上，而且是当地最好的建筑。教会的各级教士都是当地的名流显要，一切重大事件“他们都必须插手。印第安人一旦宣誓信仰基督教，他就以一种家长制关系隶属于传教神父，洗礼、受教育、结婚以至到死，神父都是他的主，在这其中接受洗礼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比出生还有意义，因为按照天主教的逻辑：不受洗礼就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天主教徒就是魔鬼，是异端，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传教区内，印第安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家庭生活、衣着、娱乐、休息等都全由教士所控制。天刚黎明，教堂的钟声便将所有信徒召集一起做祷告，中餐和休息后，傍晚的“奉告祈祷钟”又将人们唤到教堂，只有晚上才能轻松一时。另外，教区还实行“宗教婚姻制”。即殖民地人民结婚时，新娘必先送到神父家中做一个月的情妇和奴仆，以预先训练她作结婚的准备，由此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可见一斑。

其次是严格的思想控制。当时建立了严格的书籍检查制度，一切与天主教论点不相符合的书籍都被以“异端邪说”或对“印第安人有害”为由而拒之门外。据统计，十八世纪时竟有五千四百多位作者的书在遭禁之列。保存这些禁书的人要正法、财产没收。另外当时各级学校也多由教会所建，大学里的课程主要是神学。医院、孤儿院和贫民所等慈善事业往往也控制在教会

手中。为了更加严格地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异端思想的传播，宗教裁判所也就应运而生。1507年，在利马设立了第一个宗教裁判所，到后来，除巴西以外，这种机构林立于南美各地，他们对一切“异端”，犹太教和新教、巫术和重婚等都处以极重的处罚。而印第安人只要稍有不相信天主教的举动，如怀疑奇迹的出现或对教会的谎言不表赞同，轻则遭受监禁、没收财产，重则被活活烧死。当时凡受异端法庭审讯过的人，往往会被绑在马背上游街示众。在殖民统治三百年间，仅利马一地就有三十人被处以火刑，成千上万的人民被投进监狱。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使每个南美人都感到恐惧，以致在独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一回忆起它来，仍然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第三，教会还是殖民地重要的世俗统治者。它们拥有巨额财产，最好的土地。在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地，教会几乎拥有全部地产的一半。1626年，利马城内修士、修女仅占人

口的10%，但修道院所占的土地面积比所有公共建筑面积的总和还要多，这种状况让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都抱怨不已。到了殖民统治末期，教会已经占有了南美土地1/3以上，成了最大的地主。

教会还向人民征收什一税，经营各种商业、工厂和矿场，放高利贷、贩卖赎罪券、接受遗赠、没收异教徒的产业、征收婚丧嫁娶费用等人间俗事，几乎无所不包。教会的贪婪是无与伦比的，巴尔玛在《秘鲁的传说》一书中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我们知道，有一个矿井出产的白银，超过了金波托西（殖民时代最大的银矿）的矿井，这个矿井名叫‘炼狱’，自从教会发现它以后，就建筑了一所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大金库，以收容信徒们的施舍。他们用弥撒以及其它各种宗教仪式把钱丢进去，以赎回他们有罪的灵魂。”正是靠着这个“炼狱”，教士们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过上了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生活。此外教会的世俗统治还有极端残酷的一面。他们奴役和镇压印第安人和黑人，寺院中往往设有牢狱，老虎凳、镣铐、皮鞭等刑具一应俱全。教士们认为印第安人是“没有灵魂的动物，就像野兽一样不能领会基督教义”，他们宣称“教士们为了印第安人的幸福而应该鞭打他们。鞭打是如此必要就像面包对于他们的嘴巴一样。”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阿科斯塔在他编写的一本传教手册中表述得更为露骨：必须一手举着鞭子，一手紧握十字架，为印第安人套上基督教的轡头和缰绳，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奴隶。在当时，印第安人必须为这些上帝的圣徒们奉献上虔诚的劳动却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倍受迫害的印第安人曾这样形容天主教士的残暴：“神父是一只饿狼，他只看重金钱，而不要荣誉和经文。”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殖民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的神权国家。十六世纪末期，耶稣会逐渐控制了巴拉圭东南地区，他们自称是当地瓜拉尼族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并向西班牙王保证以和平手段教会印第安人过上定居生活，使他们成为王室的奴仆。耶稣会霸占了印第安人肥沃土地，并把他们强迫集中在一起，建立了为教会所控制的神权国家，在这个国家内，印第安人的生活起居都要服从严格的规定。黎明时分，他们被寺院的钟声唤醒，在僧侣们的监视下，一部分人去野外劳动，另一部分则去手工作坊，午间集合起来共进午餐，晚上按规定时间就寝。印第安人所有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都归入教会仓库，然后再由僧侣分配给他们口粮和一定的生活用品。在这里，人民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甚至结婚这等终身大事也必须得到神父的指示方可。寺院中同样设有牢狱，企图逃出这块“人间乐园”便会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统治着十多

万人的神权国家，存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如何评价殖民统治时期天主教会的作用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教士们并不在意自己因满身铜臭而进不了天堂，他们的作威作福是南美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另一方面，他们传来了基督教，教会印第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教他们学拉丁语等，在近代文明启蒙的许多方面，又起了推动作用。

六、文明的炼狱——南美的拉丁化

花开花落，古老灿烂的南美文明在走过了它的辉煌之后，被殖民征服者推入了世界历史的大潮之中。恩格斯曾经指出：“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然而，独立步伐的终止却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失落，失掉了旧世界的南美文明从此步入了新阶段——拉丁化时期。殖民统治三百年间，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铁器和马匹、小麦和咖啡，生与死的哲学体系，音乐绘画的美学观念，还传来基督教的福音，字母组成的拉丁文。这些文明的新血液无疑大大拓宽了南美的视野，并使之在文明的炼狱中逐渐拉丁化。然而这个时期的南美拉丁文化又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一位学者对此作了比喻：明亮的西方文明光线在射入美洲多棱镜后便分解为自己的基本原色，并与印第安文明的光束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型文化光谱。随着时光的推移，这光谱既不是印第安人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形成了印第安美洲的文化光谱。

（1）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教育几乎全为天主教会所垄断，当时各类学校均由教会或修道院主办，主要传授经院哲学和神学，大学中也多有教士任教。尽管如此，从十六到十九世纪，南美大陆的近代教育毕竟出现并取得了长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大学教育的发展上。

1551年，在利马的一个修道院内，圣马克大学正式建立了，这是南美大陆上出现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此后各地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其中较为有名的1613年成立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大学，1655年的波哥大大学，1721年的加拉斯加大学，1747年的圣地亚哥大学等。与此同时，为满足土生白人居民的需要，一批神学、法学、医学专科学校也出现。然而在当时建立大学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必须得到教皇的授权和国王的批准。1586年厄瓜多尔建立了圣富尔亨西奥大学，但这所大学整整等了十七年方才得到批准行课，足见其艰辛。大学里一般设有法学、神学、医学和艺术四个系，课程也多用拉丁文讲授。学位有学士、业士、硕士和博士四种，学生读完相关课程后经过考核合格，便可获得相应的学位。当时读大学本身的费用并不昂贵，但往往毕业时的开销却相当惊人，譬如要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必须先支出一笔钱来举办一场斗牛表演、一次宗教游行以及向一般民众提供一场娱乐活动。这种有趣的现象表明，高等教育对下层人民来说，无疑仅仅是一种奢望而已。

与大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众教育的落后。尽管西班牙的西印度院曾要求在殖民地各区域建立起印第安人的学校，但这项训令在绝大多数地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一位秘鲁总督说得清楚：“学学读书、写字和做祷告就行了，无论哪个美洲人他应该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当时即使建立起一些学校，也多因陋就简，专为印第安人少数上层子弟而设，广大农民和矿工根本无上学机会。1713年有4万居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4所学校，共700名学生；而圣地亚哥的3万人中，也仅只有学生500名，真可谓寥若晨星。有位名叫卡斯提里亚的印第安酋长曾经请求殖民政府许可在拉普宜布拉建立一所印第安人的学校，结果竟白费了三十年的功夫。他后来到马德里去控告殖民官吏时，却一无所得地客死在那里。

在殖民统治初期，教育为天主教会所控制，同天主教思想冲突的课程定

在受排斥之列，因此早期的大学更像神学院而已。1723年圣马克大学的医学课程中，还在进行血液是否循环的讨论。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教育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地位不再稳固，近代哲学、自然科学等从旧大陆传来的新学科占满了大学的课程表，解剖学说、牛顿学说、笛卡尔学说等倍受青睐。世俗的教授明显增多，而他们往往对新思想最先作出反应。这样，新思想的传播促进了南美独立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形成。

而在葡萄牙统治的巴西，教育状况是十分低下的。在那里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印刷所，图书馆少得可怜，就更谈不上报刊了。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几乎全都目不识丁，大多数白人也是知识的贫乏者。富家子弟要受高等教育时，只有远涉重洋去欧洲。巴西总督拉弗拉迪亚也曾不得不承认：“我的臣民缺乏教育，他们都放荡不羁。”这种状况直到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至里约热内卢后方有所改观，从那之后巴西才开始了文化教育的繁荣时期。

（2）文学艺术。

十六到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文学宝库中，既有早先征服时期血与泪的纪实文学，又有夸饰绮丽的巴洛克文学，还有晚期严峻的新古典主义文学。但除了征服时期的文学以外，由于西、葡的文化专制政策，殖民地文学几乎全是宗主国文学的翻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早期的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主角应当是那些最先来到士兵、传教士、学者和后来的土生混血后裔。这些征服者踏上南美，面对的是个全新的世界。他们怀着由中世纪陈腐观念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矛盾心理，一面掠金夺银，不遗余力地破坏印第安文化，另一面则又痛苦地观察与思索。尽管也许并不是吟诗作文的能手，但他们还是将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记诸笔端。这样就形成了纪事文学。纪事文学体裁广泛、内容丰富，有发现“新大陆”的书信呈文，又有关于印第安人思想和社会的考察报告，还有地区的征服史等，埃尔西利亚的英雄史诗《阿劳坎人》和德拉维加的《王室述评》可谓其中杰出的代表。

德·埃尔西利亚，1533年出生在马德里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曾作过菲力浦二世的侍从伴读。他精通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并熟读了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大师们的煌煌巨著，深受维吉尔的影响。21岁时，他参加了征服大军，先到利马，后来转战智利，参加了对阿劳坎人的征服战争。阿劳坎人的英勇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埃尔西利亚，于是他白天战斗，夜晚则提笔作诗，以诗人敏感的气质和不凡的眼力，记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战斗场面。二十九岁时他回到西班牙，整理笔记后出版了长篇史诗《阿劳坎人》（1569）。

《阿劳坎人》共分三个部分37章。第一部分落笔于智利的自然风光以及阿劳坎人的生活习俗、勇猛强悍的性格和富于反抗的精神。此中还讲述了老酋长科洛科洛关于选举总领头的建议以及与西班牙人发生的营地之战；第二部分以阿劳坎人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频繁战斗为主要内容。诗中记载了阿劳坎人接战不利、连遭挫折的情况，并刻画了一位不畏强暴、英勇就义的阿劳坎战俘的形象；第三部分则主要记述西班牙征服者的最后胜利经过，同时也以浓墨重彩渲染了考波利（领袖）因叛徒出卖而被俘直至牺牲的过程。

埃尔西利亚宣称这部英雄史诗是真实的记录，他在为西班牙人唱赞歌的同时，也热情地讴歌了不屈不挠的阿劳坎人。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许多

人并不比他们高明，像他们那样坚决保卫自己的家园，抵抗如此凶恶敌人的民族是不为多见的。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既没有大片领土，也没有坚城壁垒，更无强大的武器，他们仅凭勇气和决心，为捍卫自由而流血牺牲。”《阿劳坎人》是第一部歌颂美洲的作品，作者在诗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智利，这富饶、光荣和肥沃的国家，
它的上空是一片蔚蓝色的天。
许多遥远国度都因为它的崇高力量和
人民的光荣而尊崇它
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这样坚强和光
荣
他们的骄傲、力量和美丽是这样地光辉
那些卑劣、贪吝和残酷的外国人
从未征服过这个国家。

此外，埃尔西利亚还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如足智多谋的科洛科洛，勇敢机敏的劳塔罗，视死如归的考波利等。伏尔泰甚至将科洛科洛的形象与荷马笔下的纳斯托相提并论。

印加·德拉维加，1539年出生在库斯科，他是一位西班牙上校和印加公主的后裔，青少年时，他一直生活在印加贵族之中，深受印加文化的影响，后曾到西班牙留学，晚年因屡遭冷遇而退隐修道院从事文化研究。1609年倾注他毕生心血的《王室述评》正式出版。

《王室述评》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了印加人的起源和信仰、法律、政府组织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第二部分则是印加帝国被征服的历史。《王室述评》与其说是一部编年史，还不如说是一部抒情性回忆录，作者将对故国的怀念和眷恋，泻于笔端，字里行间充满情感。他将印加人的社会描绘成了一个丰衣足食、秩序井然的国度，比如他这样记载印加人的农业劳动：“人们欢快地来到太阳神和印加国王的土地上，身着节日盛装，头上戴着五光十色的金银和羽毛饰物。大家一面耕耘，一面唱着献给国王的颂歌，他们把劳动变成了欢快的节日，因为他们在为神明和自己的国王而效力。”这段发思古之幽情的文字尽管不乏理想成分，但却是他怀念故国的最好映证。德拉维加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继承和保存了印加文化遗产，同时，他又是将西班牙文化和印加文化相结合的典范。《王室述评》开创了美洲文学模式的先河。

经过十六世纪血与火的征服之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正式确立下来。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南美经济的发展，等级社会结构的形成，文学艺术也由早期的纪事文学和宗教文学转向了宫廷文学，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巴洛克文学。巴洛克风格十六世纪末兴起于西班牙，十七世纪中期进入了全盛时期。它的主要特点便是：矫揉造作、故作艰深、滥用夸张和典故，重形式而不重内容，以至于典雅其外而空洞无物。十七世纪初这种风格传入了南美，在吸收了印第安文化成就之后，南美的巴洛克文学则更体现了一种文化融合。这种风格的作品主要在诗歌和戏剧方面。

在诗歌方面，十七世纪的诗坛几乎是路易斯·贡戈拉的天下，这位文风绮丽的西班牙人几乎成了这个时期所有诗人模仿的楷模。受他影响最重要的诗人有哈辛托·埃维亚（瓜亚基尔）和胡安·梅德拉诺等人。另外卡维埃德

斯也很有名。他出生在西班牙，后来迁居秘鲁，曾写下了许多讽刺诗和抒情诗。他的代表作名为《帕纳索斯的牙齿，医生们的争战，医药的威力，无知的功绩。公诸于世者：胡安·卡维埃德斯，一个从医生误诊下奇迹般逃生的病人，谨向光荣的圣罗克的庇护神致谢，这位圣者是两者一路货色的医生和瘟疫的保护神。作者谨将本书献给死神——医生们的女皇，他们以人命向她威严的权柄献祭，以死人和病人作为健康的贡赋》。这首题目冗长的诗揭露和嘲讽了殖民地愚昧、迷信等社会恶习，因而一度广为流传。

到了十八世纪，诗坛上贡戈拉的影响犹存，厄瓜多尔的阿吉雷便是一个典型的追随者。尽管这位诗人曾创作了多种体裁的诗歌，然而几乎无一例外地兼具了形式华美而思想苍白的特点。这个时期，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导致了洛可可风格的兴起。这种风格是巴罗克的变种，起源于十八世纪初的法国宫廷艺术。在南美大陆上洛可可风格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诗人德·格瓦拉，他曾写过许多赞美总督及其夫人“德政”的诗篇，在他的笔下，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享乐、骄奢淫逸的贵族气派都是歌颂的对象。他的诗几乎是一种典型的文人的献媚。

戏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最先，南美大陆上的戏剧形式是宗教剧，当传教士们发现用它来传播福音远远超过一次布道的效果时，他们便大量地将西班牙宗教剧引进改编，译成土著方言，融入印第安人的传统并请他们扮演角色，因而得到广泛的欢迎。尽管他们的大力推行使这个剧种繁荣一时，然而由于本身内容的狭隘、照搬照抄难以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加上宗教裁判所多加非难，遂使宗教剧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便衰落了下去。整个十七世纪，土生白人是不敢创作正剧和喜剧的，因此只是进行大量的移植，南美实际上便成了西班牙戏剧上演的舞台。进入十八世纪后，随着西班牙本身戏剧的衰落，殖民地戏剧创作才得以真正开始。这个时期的戏剧爱好往往是按照社会等级来划分的。王公贵族在宫殿里看戏，平民在露天广场看戏，而印第安人则只能在教堂里看宗教剧。当时的正剧之前要加一段开场白，戏中角色模仿印第安人讲话，这是风俗戏的开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剧作家，如利马的赫罗尼莫·维拉，他曾写过一部名为《爱情这个调皮鬼》的独幕喜剧，剧中堕入爱河的西班牙小伙子、爱卖弄风情的戴面纱女郎、刚被卖到美洲的黑人姑娘等形象以幽默动人的对话勾画出了利马街巷生活的画面，获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学具有典型的二重性，一方面受神学的影响，宣传迷信、蒙昧思想；另一方面也受着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到了殖民统治末期，随着欧洲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多方传入，新古典主义逐渐占了重要地位。在诗歌方面，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后，巴洛克风格进入垂暮之年，洛可可风格也难经风霜，而此时阿兰戈、依兰达等新古典主义诗人却星光闪现、光照文坛。在戏剧舞台上，土生白人的风俗戏也开始登堂入室，并逐步向具有南美自身特色的艺术道路迈进。总之，殖民统治末期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宣扬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为南美的独立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

最后对西班牙殖民地文学所作的说明是，殖民时期小说几无发展，这主要是歧视的结果，连《堂吉诃德》在当时宁愿被称作“滑稽英雄散文诗”，也不被称为“小说”。

殖民时期的巴西文学同样也是群星灿烂，在这里我们仅仅撷采两朵奇葩

献给读者，这便是卡马的《乌拉圭》和杜朗的《卡拉穆鲁》。

巴西利奥·卡马（1741—1795），是巴西十八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写过《悲剧的朗诵》、《福地》等作品，但最为出色的是《乌拉圭》。这部史诗反映的是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的乌拉圭战争。当时在巴西殖民地中，有些村落被西班牙耶稣会所占，而乌拉圭南部的西属殖民地的萨克拉门托地区则为葡萄牙人所占。后来西、葡达成协议互换两地。但当葡萄牙人去接管耶稣会控制的村落时，这些西班牙教士却鼓动当地印第安人与前来的葡萄牙人交战，这场战争史称“乌拉圭战争”。史诗以战争画面的背景，对印第安风俗作了详细的描绘，并用土著神话人物代替了西方神话中的诸神，使诗歌具有了鲜明的本土主义色彩。在艺术技巧上，诗歌语言生动、优美感人的诗句比比皆是。最为动人的一节是对林多娅之死的描写，美丽的林多娅是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当她得知丈夫身死沙场时，便痛不欲生地来到森林里，不幸却被毒蛇咬伤致死。作者不无凄婉地写道：

爱神曾在这双眼睛里栖息
而今它却失去了生机
昔日的面孔依然保留着
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戚
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情
死亡在她的脸上竟是这等美丽！
感人至深的诗句历来为世人所称颂。

这个时期另一位重要作家是若泽·杜朗（1722—1784）。他的《卡拉穆奇》讲述了一个虚构人物迪奥戈在十六世纪发现巴伊亚的故事。迪奥戈等人在巴伊亚附近的海上沉船遇险，逃生后为印第安人所获。其它的幸存者全被印第安人吃掉了，而迪奥戈因有疾在身而幸免一死。一次他用从船上带来的火枪打下了一只飞鸟，这使印第安人大为震惊，于是他们奉他若神明，称他为卡拉穆鲁，即雷电之子。迪奥戈逐渐掌握了印第安人，酋长也将女儿帕拉瓜苏许配给了他。迪奥戈将帕拉瓜苏带到欧洲，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回到了巴伊亚时，印第安人想立帕拉瓜苏为帝国的继承人，但她拒绝了并将统治权交给了葡萄牙人。夫妇二人的行为受到葡王赞赏。尽管《卡拉穆鲁》才情难与《乌拉圭》匹敌，然而其中仍不乏感人的神来之笔。比如当迪奥戈携妻乘船前往欧洲时，帕拉瓜苏的情敌莫埃玛游泳追随他们直至溺死：

眼睛里失去了光亮，她浑身战抖惊恐万状
脸色惨白，全然一幅垂死前的模样
失去了生机的手指松开了船舵
在成味的泡沫之中，沉向了海底
但当海浪怒吼着升起
她再一次在海面上出现
满含悲痛喊叫了一声：“啊，无情的迪奥戈！”
随后就沉入水中，再也没有露面……

（3）建筑造型艺术。

建筑艺术的发展反映着殖民地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南美拉丁化的一个缩影。

在哥伦布到达以前，南美建筑的灿烂光辉主要表现在秘鲁文明中，在那

里，规模宏大、形态巍峨的建筑无不体现了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美学意识。蒂亚瓦纳科文明时代留下来的、由一块巨石雕成的浑然一体的太阳门，印加时代库斯科的太阳神庙等，都是其中光芒四射的杰出代表。到了征服初期，传教士为了皈依的印第安人和防卫而大修教堂。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这些教堂设计上遵循着简易的风格：朴素的外墙，锯齿状的雉堞，高而窄小的窗户，除入口处外均不作装饰。随着殖民统治的稳固和财富的积累，宗主国的各种建筑风格纷至沓来：衰落时期的哥特式，穆迪扎尔式、伊莎贝尔式、巴罗克式、银匠式等，各自盛行一时，十六世纪哥特式影响十分明显，尖顶、尖拱及五彩玻璃的尖形窗随处可见。此时将哥特式和穆迪扎尔式融为一体的伊莎贝尔风格也很流行。后来巴罗克风格传入，由于印第安人有使用浮雕花饰的丰富传统，加上南美盛产的软石料提供了方便，于是巴罗克风格逐渐深得人心而盛极近一个世纪。当时政府大兴土木，富豪家族的住宅富丽堂皇宛如宫室，教堂也装饰得精美华贵。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统治了西班牙，新古典主义也在南美大陆盛行起来，它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追求理性、规范和线条的完美，反对巴罗克式过分装饰。

然而建筑风格并非简单、机械地模仿，这个时期建筑多由梅斯蒂索艺术家设计，由印第安人施工完成的。印第安人怀着饱受创伤的心灵，将痛苦、仇恨和反抗心理倾注于他们的建筑作品中，这样就渗入了不少南美的本土特色。宗教建筑则更多地体现了这种融合，修道院的大门上出现了印第安人面孔的小天使，印加帝国的国花——石竹花也在雕刻中屡见不鲜。在哥伦比亚的圣多明各大教堂，祭坛上的上帝像已经被理想化为太阳神的模样。更为典型的当是在波托西城的圣洛伦索大教堂，教堂正面的装饰上，有演奏印第安帕纳笛的神女，有穿斗篷的天使，也有从印加神庙里移来的太阳、月亮图像。在大教堂的缘饰上，还重复着蒂亚瓦纳科迹中所发现的图案和对当地植物的现实主义描绘。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旅行家的描述。十九世纪末，俄国的伊奥宁面对阿雷基帕（秘鲁）古老建筑的浮雕，作了如下描绘：“阿雷基帕的印第安人的建筑师们……表现了湮没无闻的印加帝国的时代风格和艺术构思。他们从欧洲人那里学得了从旧大陆带来的某些匠意，但又赋予古代秘鲁遗迹所固有的那种特殊的纯朴性和原始的笨拙性……粗壮的蛇盘绕在粗笨的古树枝树上，树上长着像甜瓜似的叶子，在这些树下，是同样粗壮的野兽——美洲豹、虎，特别是脖子很小的骆马一用后足直立起身子。人张着双臂，拿着钩杖，很像秘鲁遗迹上的印加人……”

殖民时代留下了许多建筑艺术珍品。耸立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便是其中一例。这座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的教堂是在印加王海依那的一座庄园上完成的，它由几座建筑物组成一个整体，主体部分围绕着一个巨大的中世纪式的庭院，庭院两侧是重叠的走廊。这座修道院具有典型的巴罗克风格而又不失之浮华。它费资巨万，耗时长达四十三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在许多方面都成了当时南美的典范。据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得知它完工的消息时，竟然登上王宫的最高处，他想从那儿看到这座修道院的塔楼，足见其影响之大。

当时除了宗教建筑外，世俗、宗教建筑也异彩纷呈，比如利马总督府至今仍是政府所在地。同时期的巴西建筑则没有多少独创性。

（4）音乐、绘画及其它艺术。

与文学、建筑艺术一样，殖民时期的音乐也逐渐拉丁化。十六世纪的西

班牙音乐在欧洲大陆上位居前列，西班牙偏爱的吉它便成了南美大陆上最为流行的乐器。当时为了宗教仪式的需要，一些音乐学校很早便被建立起来，教授印第安人抄写和演唱宗教歌曲、制作和演奏乐器等。此外，十六至十八世纪上演的西班牙喜剧则常常配以美洲人谱写的音乐。1701年利马举行了南美大陆上首次歌剧演出。一系列音乐中心形成了，利马、波哥大、基多等地还常有印第安乐队举行公众音乐会。

巴西音乐最大的特点，则是在葡萄牙和印第安的成分中加入了黑人音乐的成分。

西属南美的绘画艺术在亦步亦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个世纪中，白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艺术家创作了近百万幅作品，他们的画装饰了南美成千上万座教堂。三个艺术中心：基多、库斯科、波托西逐渐形成。其中基多画派的绘画表现的唯理智主义，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米格尔·德·圣地亚哥（1626—1706），人们习惯把他称作“受折磨的天才”。据说一次他画蒙难的基督时，为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耶稣垂死前的痛苦表情，他竟用匕首刺伤了他的模特儿。

库斯科画派为后人留下的多是以宗教为题材的油画，他们擅长于画十字架上的耶稣，并注入一种印第安化的理解。主要代表人物如胡安·洛斯蒙特罗斯。

波托西画派则是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这个矿业中心的极盛而兴起的。这个画派的作品仅局限于教堂和宫廷之中，贵族气十足而脱离大众。

到了殖民晚期，新古典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

（5）自然科学。

殖民之初，个别学者深居于寺院和教堂之中搞研究，但他们的工作往往不切实际，到后来这种状况大有改观。首先是植物学的发展。广大的热带、亚热带作物区为植物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当时在利马、新格林纳达等地都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对南美的植物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十八世纪卡洛斯四世时代的二十年间，这些机构就发现了四千个以上的新品种。波哥大的穆蒂斯（1732—1808）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受总督和大主教的委托进行长期考察，写出了新格林纳达的植物志。他被后人称作“植物学之父”。

此外，为了便于在广袤无比、地形复杂的大陆上统治，就非绘制详细的地图，这样地理学就发展了起来；十六世纪末天文学研究也开始了，1588年菲利浦二世就曾指示在利马进行日、月食的观测工作；随着对金、银的开采和勘探，冶金学和化学也发展起来，十七世纪末的秘鲁科学家巴尔努博就发明了提炼白银的新方法。以上这些学科的发展又促进了数学、几何等学科的进步。

七、千呼万唤始出来——南美意识的确立

剑与十字架、枷锁和奴役。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文明的脚步是蹒跚而又迷茫的。然而正是在这血与火的痛苦历史中，终于诞生了南美意识，这就是：南美大陆是一个整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是它的真正主人。

南美意识直接发初于思想启蒙运动。十八世纪中期后，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们的煌煌大作，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入南美这块与外界接触日趋频繁的大陆，一时为殖民地人民广为传诵。在他们思想的影响下，各种新型学校和研究园地纷纷出现，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海学校、智利的圣路易斯学校等，成了培育自由主义思想新人的摇篮。与此同时，《秘鲁信使报》、《加拉加斯报》、《智利晨报》等以进步的旗帜的报刊筑成了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这样，南美大陆上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先从哲学领域开火。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地位岌岌可危，加拉加斯的瓦尔维尔德曾不无嘲讽地将亚里士多德称作是“偶然现象的侯爵、玄学的主帅”，他的物理学更是一条“谬误百出的臭水沟”。而当时秘鲁的教育家门多萨等人则极力主张改革教育，将亚里士多德赶出课堂。这种对旧哲学的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宗主国权威的否定。与此同时，思想家们还以新思想为武器对殖民地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请多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样做的直接意义，便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认识到了生长自己的这片土地。他们已经触摸到了南美独立的脉搏，并预感到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终将落在自己的肩上。18世纪末，在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鼓舞下，思想家们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学说向殖民统治展开了猛烈批判。正是在这否定与批判、探索与斗争中，南美意识逐渐萌发出来。委内瑞拉的教育家何塞·桑斯曾号召他的学生，要认清自己祖国内在和外在的利益，在这里，祖国是委内瑞拉而不是西班牙；1791年，秘鲁的胡安·古斯曼在他著名的《致美洲西班牙人的信》中，情深意长地将美洲称为“祖国”，在愤怒地抨击殖民统治罪恶的同时，他宣称：“既然西班牙殖民政府根本不尽全力保护我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和自由，根本不尽心为我们谋幸福，而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那么，自然、理性和正义已经确定要把我们从这种暴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加西亚·德里奥在《哥伦比亚的沉思》一书中指出：必须改变西班牙的传统习惯和观念，才能走上经济发展、政治独立的道路。革命先驱米兰达在《告哥伦比亚大陆人民书》中鲜明地提出：“必须推翻这一残暴的统治，真正的主人必须夺回被褫夺的权利，被外国势力强占了的政府权力必须回到本国人民手中。”他同时还指出：征服者的政府是完全非法和违背自然法则的，因此必须推翻它。1797年委内瑞拉的何塞·埃斯帕尼亚和曼努埃尔·瓦尔等人组建了革命组织，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推翻殖民统治，他们设计了代表土生白人、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四大种族的四色旗，还谱写了诙谐、乐观而又坚定无比的战斗歌曲《美洲之歌》：“我是个穷光蛋啊，也得来跳个舞、唱支歌。跳起来啊，唱起来！穷光蛋们啊，跳吧、唱吧！炮声响了！万岁、万岁、万万岁！”革命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南美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文学家们也以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宣告了南美的觉醒。著名诗人安德列斯·贝略在《致诗神》中写道：

神圣的诗歌

在寂寞孤独中生活，
你惯于森林中的幽静
将自己的吟咏切磋；
绿色的岩洞是你的寓所，
山间的回声同你应和；
是丢弃文明欧洲的时候了，
它不喜欢你粗犷的品格；
飞向哥伦布的世界吧，
将你广阔的天地开拓！

诗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美洲主义信仰。这样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南美意识的确立，一个视宗主国为异邦的新民族——南美民族形成，并在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中携起手来。

南美意识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大陆主义，这种以“美洲联合起来”为核心的思想是与玻利瓦尔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对自己的战士们说：“对我们来说，美洲是我们的祖国，西班牙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旗帜是独立和自由。”1815年他在著名的《牙买加来信》中鲜明地提出：“将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部分同整体相连。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既然美洲有着共同的经历、语言、风俗和宗教，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各地联合起来！”1818年他在致拉普拉塔地区独立运动领导人的信中说：“我们的座右铭是：南美的联合！”另一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圣马丁将军也是位大陆主义者。1822年在瓜亚基尔会晤时他曾对玻利瓦尔说：“我们保卫着同一祖国，献身于同一事业，对新世界的自由事业怀有同样的感情。”正是在大陆主义的指导下，西属南美各地人民联合起来，终于将殖民者赶了出去，赢得了独立。

八、石破天惊——独立运动

1810年4月19日，加拉加斯的爱国者发动起义赶跑殖民当局，成立了洪达（即最高执政委员会）。次年7月，他们发表了南美历史上的第一个独立宣言，冉冉升起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国旗。这样，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就拉开了序幕。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伟大的人物，南美独立运动是与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两位伟人密不可分的。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出生在委内瑞拉一个富有的土生白人地主家庭，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深受思想启蒙老师罗德里格斯的影响。少年时代的玻利瓦尔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性格。一次在田间散步的时候，与他同行的一位朋友不住地催道：

“快点，你永远也成不了一个骑士！”

“我不会成为骑士，”西蒙傲慢地回答，“因为你们给我的是一头驴！”

1804年12月，玻利瓦尔在欧洲游历时有幸目睹了拿破仑盛大的加冕典礼，从而萌发了对荣誉的巨大渴望。1805年8月，在意大利罗马近郊的萨克罗山上，玻利瓦尔许下了砸碎殖民枷锁的铮铮誓言：“我以我的人格和生命宣誓，在我没有打破西班牙用以束缚我祖国的枷锁之前，我的手将不倦地打击敌人，我的心将不会安宁。”从欧洲返回后，他立即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1811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成立，但在殖民者强大的反扑下，共和国很快就夭折了。然而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812年12月，玻利瓦尔到达新格林纳达已解除殖民束缚的卡塔赫那城，在那儿招兵买马，并迅速向内地的西班牙据点进攻。1813年2月13日，玻利瓦尔攻克库塔城后不久，便率一千多人从那里出发翻过安第斯山脉直指委内瑞拉。在当地爱国力量的配合下，革命军势如破竹，并于8月6日开进首都加拉加斯。1814年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建立，玻利瓦尔被授予解放者的称号。然而第二共和国的命运也不久长，7月10日，它被西班牙军队扼杀在摇篮之中，玻利瓦尔被迫流亡牙买加。

胜利的艺术是从失败中得来的。在流亡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牙买加来信》，这篇声讨殖民压迫的战斗檄文号召所有美洲人民在同西班牙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不久他到海地，得到海地总统和人民的支持。从1816年起，独立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玻利瓦尔宣布废除奴隶制，并许诺参加战争的人民都可以分得土地，这些措施得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广泛拥护，大批黑人和混血种人纷纷报名参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玻利瓦尔占领奥里诺科后，以此为中心不断向西班牙军作战，胜利接着胜利。1819年2月，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成立，玻利瓦尔就任总统。然而他的目标是将整个南美（西属）从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于是经过休整后，1819年5月，他率领二千多人向新格林纳达进军。这次远征是艰苦卓绝的，他们跋涉了数千公里，并在隆冬时节开始翻越安第斯山。饥饿和疲劳，天寒地冻与山势险峻，使部队大量减员。军中的良诺人本是只习惯于在平原上纵横驰骋的民族，在这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中，不少人因眩晕而坠入万丈深渊。在那条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的羊肠小道上，壮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征途。翻过安第斯山后，他们进入了哥伦比亚。8月7日，博亚卡的激战使西班牙人溃不成军，主力部队全被歼灭。8月10日波哥大被解放。10月，疆域包括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建立，这是玻利瓦尔大陆主义思想的实践。

南部大陆的解放是在圣马丁将军的领导下完成的。何塞·圣马丁（1778—1850），这位船主的儿子出生在阿根廷的亚佩尤。从十二岁开始便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了二十二年。他随军队驻扎在加第斯时，加入了当地的秘密革命团体“劳塔罗”。1811年5月，阿根廷爆发了“五月革命”，推翻了总督，建立了自己的政府。1814年1月，圣马丁被任命为阿根廷革命军的统帅。圣马丁将军是一位沉着、刚毅而又有深谋远虑的领袖，他认识到仅仅在一两个局部地区取得胜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摧毁西班牙在拉美最顽固的堡垒——秘鲁，才能将西班牙人最终赶出去。于是他制定了翻过安第斯攻打智利，然后再由海上进攻秘鲁的作战计划。他得到了黑人和英勇善战的阿劳坎人的支持。经过两年的准备，1817年1月18日，他率领5500名战士向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进发，与风雪搏斗了半个月后，他们进入了智利战场并一路重创殖民军。2月14日，圣马丁的军队开进了圣地亚哥城，当时全城教堂钟声四起，鲜花像雨点般地洒向英雄们。1818年2月，智利正式宣布独立，奥希金斯任最高执政官，圣马丁则积极组织军备以远征秘鲁。两年后，他的海军已颇具规模：8艘战舰，16艘运输船，1600名水手和4000多名士兵。1820年8月20日，海军扬帆出发之际，圣马丁将军向将士们宣布：“我们将开始解放秘鲁的伟大事业，这是我们革命中最伟大日子的黎明！”9月8日，海军在帕拉卡斯港登陆，圣马丁对利马实行围而不攻的战略，切断了该城与内地的联系。致使西班牙军队坐困愁城，一筹莫展。次年7月6日，穷途末路的秘鲁总督率4000人撤出利马，逃往山区。7月28日，圣马丁将军以他的一句名言宣告了秘鲁的独立：“秘鲁根据它的人民的普遍意志和上帝维护它事业的正义性，从此时此刻起自由独立了！”

秘鲁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西班牙殖民势力的彻底瓦解，逃往山区的军队依然十分强大。圣马丁感到兵单力薄，于是便与玻利瓦尔取得联系，想得到他的支援。1822年7月25日，这两位伟人终于在瓜亚基尔会面了，南美人民将永不会忘记他们相互拥抱的这一天。这次会谈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此会谈内容我们也就无从稽考，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这两人的确存在分歧，圣马丁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而玻利瓦尔则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没有协议，也没有争吵，会谈结束后，圣马丁悄然离去，回到利马辞去了秘鲁政府首脑的职务，不久后返回故乡阿根廷。圣马丁将军一生生活俭朴，品格高尚。据说有位保皇派的西班牙人看见他衣衫破旧，于是拿来一大块上等的呢料准备给他做几套新衣服。圣马丁知道后，竟下令用这块布为这个西班牙人做了八套燕尾服，责其每日穿上一件从主教大厦前招摇而过，并向圣马丁鞠躬。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回到阿根廷后，他倍受歧视和冷遇，后来他去了欧洲，孑然一身，一贫如洗，在无限凄凉中离去。然而贫困掩饰不住他品格的高尚，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希望我的心安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瓜亚基尔会晤后，独立大业便由玻利瓦尔来完成。1823年9月，他挥师进入秘鲁，次年7月在胡宁会战中，西班牙军一败涂地而退守库斯科。12月9日，苏克雷将军在与反扑的西班牙军决战一役：阿亚库巧战役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敌人除了遗尸二千具外，秘鲁总督、4名元帅、14名将军、368名校级军官和2000名士兵全都成了笼中之囚。这次战役标志着西班牙在拉美大陆上的统治彻底瓦解。此后，上秘鲁也得到解放，为纪念玻利瓦尔的功绩，上秘鲁改称玻利维亚。1824年1月23日，随着最后一个据点：卡亚

俄港口的陷落，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成了过眼云烟。

巴西的独立。

巴西电影《独立与死亡》中有这样令人难忘的一幕：当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准备从巴西启程返回里斯本时，他郑重地嘱咐儿子、留在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如果巴西非独立不可，就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读者也许会问：葡萄牙王怎么会到巴西呢？原来，1807年底，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逼近里斯本时，为了避免沦为阶下囚，葡摄政王若奥亲王率领王室迁往了南美。1807年3月，在英国军舰的护航下，葡王室、大贵族、官吏等千余人连同全部国库财产到了里约热内卢。从此，葡萄牙帝国的中心从伊比利亚西南一隅转移到了巴西。王室迁来巴西后，迫于殖民地人民民族情绪的日益高涨，若奥亲王被迫推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如办报、建图书馆等，加速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巴西从沉睡中逐渐醒来，大步走向自由。1816年玛丽亚女王去世，若奥即位，即若奥六世。1812年，葡萄牙国内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新成立的议会要求王室回迁里斯本，而此时的巴西独立运动高涨起来。面对殖民地和宗主国都可能丧失的危险，若奥被迫迁回葡萄牙，他留下了长子佩德罗，并告诉他如果形势极度恶化，就由他自己来宣布独立，这样便能在巴西继续维持布拉根柴家族的统治。

王室回迁后，里斯本议会拒绝承认巴西的平等地位，并力图使其重新处于殖民地地位。它几次下令撤销巴西摄政王机构，并要求佩德罗返葡以完成政治上的教育。巴西的政局急剧紧张，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空前尖锐。1821年底，一场挽留摄政王的运动在全国兴起，次年1月9日，上万人民纷纷涌向巴西王宫广场，要求摄政王留在巴西。佩德罗当众宣布：“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团结，我留下！”这就是巴西历史上有名的“我留日”。1月16日，独立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被尊为“巴西独立之父”的波利法西奥奉命组织了一个新的半独立的政府。2月17日，佩德罗命令在巴西的所有葡萄牙军队撤回。随着独立运动的发展，人们认为巴西再也不能附属于一个小小的、遥远的、既又保护不了它更不能征服它的国家了。于是授予了佩德罗“永久的守护者和保护者”的称号。这时恼羞成怒的葡议会决定派兵去扑灭独立的火焰。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时，佩德罗正旅行到了圣保罗附近的伊皮兰加，于是他的妻子、奥地利公主利奥波尔金娜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保卫巴西，同时她写信告诉丈夫：“苹果已经熟了，目前正是收获的时候，否则它就要腐烂了。”闻讯后的佩德罗果断地抽出宝剑，从制服上摘下葡萄牙徽章，并大声宣告：“葡萄牙议会想把巴西置于被奴役的地位，我们必须宣布独立。不独立，毋宁死！”这就是巴西历史著名的“伊皮兰加呼声”，此日成了巴西的独立日。1822年2月1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加冕仪式上，佩德罗做了巴西的皇帝，绿、金黄和蓝三色旗取代了葡国旗。到1825年，葡无奈之下只好承认了巴西的独立。

与西属南美刀光剑影的独立相比，巴西走的是一条和平之路，这是由多方因素所决定的。客观上，由于葡萄牙本身的势单力弱，致使巴西受到的外压力较小。同时在对这条道路的选择上，独立之父——波利法西奥功不可没。他是与玻利瓦尔同时代的人，然而与后者相比，他不是战士，而是科学家；不是军人，而是典型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要赢得自由，最好避开流血。波利法西奥代表了巴西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在整个独立运动中，他成了实际的领导人。

十九世纪初的独立运动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不是社会变革运动。此后，南美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尽管这路还曲折漫长。

九、翻手作云覆手雨 ——独特的政治文化考地诺主义

独立后的南美大陆上逐渐出现了一种以军事独裁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现象：考地诺主义。考地诺（caudillosmo）一词本是领袖之意，最先是用来称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作战的普拉塔地区的首领，后来这个名词被逐渐推广，戴在了所有拉美国家军事独裁者的头上。早期的考地诺独裁者多是独立运动中的将领，到了后来，除了一些地方集团的首领外，军人占绝大多数。比如在秘鲁，历史上80%的总统都是行伍出身。“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成了军界的座右铭。考地诺们上台一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甚至连形式上的选举也不需要。他们往往用武装叛乱或政变的方式取得政权。考地诺统治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独裁性。考地诺们上台后，共和徒载宪法，国家成了他们的一己私产。他们任人唯亲，可以随随便便地把政府中的职位赏给他的亲信和支持者，而人民则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稍有不满意的代价便是流放或处死。阿根廷的罗萨斯统治期间，竟有两万多人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虚伪性。与实际的独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地诺们大多虚伪成性，他们往往将自己美化成“复兴者”、“解放者”、“革命者”，甚至以“人民的救主”自居，从而掩饰自己狰狞的面目。他们举行各种歌功颂德的游行，还将自己的名字刻上纪念碑以图不朽。对人民，他们往往表现得十分“优雅”，语言动听而又优美，发表一系列进步纲领却从不付诸实施。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制宪能手，独立以来，各国颁布的宪法不下百部，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罢了，在实际中宪法形同废纸，徒有空文。

残酷性。考地诺们围绕权力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总统的宝座上一直垂悬着死亡。史学家克罗曾这样描述道：“……血腥战争成了每日生活的规律，持带长矛、大刀和短刀的凶猛牧民，活像一群猛虎，互相残杀，被俘者则像野兽一样被割断喉管，假如一个考地诺被俘，他的头会被砍掉，置于长竿上放在城内示众。”在这种权力斗争中，一切阴谋诡计和伎俩都会用上，胜利者总是用脚踏着失败者的头颅，反对者们则逃不掉流放或处死的命运。早期一些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也成了这种斗争的牺牲品：智利国父奥希金斯下台后被流放；曾指挥阿亚库巧战役的苏克雷将军也死在他政敌的屠刀之下；圣马丁孑然一身客死他乡；玻利瓦尔也只有在哀叹自己犹如“耕种海洋，劳而无功”中忧愤而死。

不稳定性。考地诺政权往往是不稳定的，政变频繁。在政治舞台上，常常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长者可达几年、几十年，短者的任期则只有几天或用小时来计算。玻利维亚1825—1951年间，政变多达179次，还曾在两天内出现了三个总统（其中两人被暗杀）；秘鲁独立后100年间也换过50多个总统。

好战性。考地诺们多是军人出身，这些人不修“文章礼制”，却迷信兵甲战阵。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经常发动对邻国的战争。十九世纪的南美大陆上战火不断、烽烟四起。较大的有1825—1828年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1839—1851年的第二次乌拉圭战争；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等。战争往往由考地诺们挑起，破坏性极大。此外，考地诺们为了寻求支持，常常栖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羽翼之下，大肆出卖民族利益。

下面就向读者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考地诺。先来看看残忍恐怖的罗萨斯。罗萨斯（1793—1877）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大独裁者，他的专横达到如此地步：禁止人民使用蓝色，因为蓝色是他政敌的代表色，人们必须穿上红背心，军人要穿上红制服，住房上要悬挂红旗。此外，所有商人、律师、医生甚至妓女的房间都必须挂上他的画像，十月被改称罗萨斯月，他本人的生日（5月30日）成了阿根廷的国庆节。罗萨斯的统治极端恐怖，他高呼：“谁不和我在一起，谁就是我的敌人！”为了镇压反对派，他还组织了暗杀组织：马扎卡。在罗萨斯的统治的23年间，3765人被绞死，1393人被枪杀，722人被暗杀，14920人战死沙场，另外还有1668人被驱逐出国，流落他乡。他成了阿根廷人民的撒旦。像许多考地诺一样，他的命运最终也掌握在别人手里，1852年，在一次政变中他被推翻。

第二位考地诺是巴拉圭好大喜功的弗朗西斯科·洛佩斯（1862—1870年在位）。他在十九岁时，便被做了独裁者的父亲任命为陆军统帅。1864年，巴西入侵乌拉圭，洛佩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便不自量力地向巴西宣战。不久阿根廷也向巴拉圭宣战。当时就实力来看，这无疑是一场以卵击石，只有绝望、没有希望的战争。然而穷兵黩武、刚愎自用的洛佩斯却“义无反顾”。他提出的口号是：“征服，或者死！”长达五年的战争是残酷的，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往往被就地正法。洛佩斯最后竟将七旬的老汉和八九岁的孩童也送上了战场。因为物资短缺，教堂的钟也被运往兵工厂铸造炮弹。战争结束时，巴拉圭的人口从130万锐减至22万，其中男性不足3万，而洛佩斯本人也战死沙场，留下的国家千疮百孔、一片废墟……最后要介绍的是荒淫的独裁梅尔加雷霍（1864—1877年在玻利维亚执政）。梅尔加雷霍出身于普通士兵，后来他杀死总统贝尔苏后攫取了玻利维亚的最高权力。他的统治也是极其恐怖的，每一个对政府稍有不满者都会被残杀。他对敌人的原则是：宁愿全部杀光，也不愿将他们监禁起来。他的生活极端荒淫，纵酒玩女人，赌博和贪污是他的特长。他甚至用啤酒喂自己的战马，命令人民像欢庆复活节一样庆祝他的生日。有人称他是“天生的罪犯”、“灾祸飓风”，巴尔德斯这样刻画他：“他既是一个具有强身壮体胆大粗鲁的士兵，又是一位非常残酷的暴君和酗酒者，他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暴力和恐怖基础上，他像驱使羊群一样对待他的人民，常用自己的双手去杀死他的竞争者和仇敌……最后，轮到他自己也被暴力驱逐出国。”有关这位独裁者的笑话也不少。据说他曾经表示他喜欢拿破仑却讨厌波拿巴；普法战争爆发时，对法国人的同情竟促使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前去援助，而全然不知两地远隔重洋。更有甚者，他曾将英国驻拉巴斯公使拴在一头驴子后面游街示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知道后，怒不可遏地扑向地图，大声叫喊：“玻利维亚不复存在！”

总之在拉美，政局变化的频繁也就意味着考地诺们命运的变化无常。也许会怀疑生命的价值到底是否存在，然而他们却不是受害者，受害的是那命运多舛的国家和无辜的人民。比尔瓦奥在《美洲在危机中》一文里对当时的社会作了如下描绘：“保守党人称自己是进步分子，自由党人坚决声明自己是皇家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又对自由起誓，民主党人则祈求独裁、专制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社会的救星……”在这样一种混乱状态下，民不聊生，国家谈何发展！

如何看待考地诺主义盛行这一现象呢？秘鲁学者欧亨尼奥·罗德里格斯认为：考地诺的出现是出于人们对男子汉和英雄的崇拜，“考地诺们往往又

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导人，其拥护者从他在某一共同的解放事业中崛起直至变成暴君或仁慈的独裁者都狂热地追随他。他的威望不在于他的思想的事业，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个性的力量，他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他的勇敢精神和演说技巧，如果他具有富有魅力的外貌和魁伟的身躯，那就更有助于树立他强大无比的形象。”实际上，考地诺主义的盛行是源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那就是大地产制的存在。这种在独立运动中并未受到冲击的封建土地制一直是南美社会发展的毒瘤。掌权的大地产主与国内各阶层的矛盾极端尖锐，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遏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需要铁腕统治，因此考地诺主义的实质便是大地产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大地产主内部经常火并，彼此倾轧，加上人民本身缺乏民主意识，就更促使考地诺主义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

第三章走出拉丁化文学创辉煌

一、柳暗花明——文学的独立之路

伴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南美艺术家开始不断地审视自我，进行着感情的或是理智的探索。最终，他们摆脱了旧大陆的束缚，走上了将南美民族特性、大陆性以及对自己表现的追求相结合起来的道路。在文学艺术领域，如前所述，殖民地时期南美文学只是宗主国文学的依附和模仿；18世纪、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盛行，文学家以它为武器为独立运动推波助澜；独立运动后，矛头直指西、葡宗主国封建文学遗产的浪漫主义兴起；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又毅然与浪漫主义决裂，最终举起了文学独立的旗帜。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贝略和《美洲的席尔瓦》。

安德列斯·贝略（1781—1865）年，委内瑞拉诗人，新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启蒙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曾做过玻利瓦尔的家庭教师，一生著述甚丰。他的《美洲的席尔瓦》是美洲要求文化独立的第一声呐喊，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高峰。

《美洲的席尔瓦》包括《致诗神》和《致热带地区农艺的颂歌》两首诗。

《致诗神》共834行，创作于殖民统治长夜将尽的黎明。作者以美洲富饶的土地、绮丽的风光、丰富多采的文化和民族解放斗争为自己的灵感之源，热情地讴歌了美洲的壮丽河山和风土人情。他呼唤诗神丢弃文明的欧洲，飘洋过海到“太阳神的爱妻”、“古老大洋的幼女”——美洲大地上，因为在这里，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理想的乐园，这首诗表达了反对西班牙的美洲主义信仰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独立战争波澜壮阔的画面。

《致热带地区农艺的颂歌》作于1826年，全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妙笔生花，热情地歌颂了美丽富饶的大陆和勤劳智慧的人民；第二部分则阐明了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强调人们不要老呆在城市，因为那里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那里的生活容易腐蚀青年人的灵魂。应当到农村去开发富饶的大地，只有在袅袅炊烟和茅舍柴扉中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国家主人。第三部分则指明了辛勤劳动、重建家园、捍卫和平是人民的历史使命。最后诗人抒发了美洲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情感，全诗在一片礼赞中结束。《美洲的席尔瓦》是用诗歌写成的文化独立的纲领。

埃切维里亚和《屠场》。

何塞·埃切维里亚（1805—1851）是阿根廷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开路先锋。少年时代他浪荡而又逍遥。1825年他去法国留学，在那里潜心阅读了莎士比亚、拜伦等人的作品，加上巴黎社交生活的熏陶和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很快就完成一名歌手向诗人的转变。1830年他回到祖国时，正值罗萨斯恐怖当政时期。埃切维里亚于是以其独裁为抨击对象，掀起了一场浪漫主义运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精神革命，它为各国人民开辟了一条表现自己，充分显示民族灵魂的道路。埃切维里亚创立了反映本国现实的民族文学。短篇小说《屠场》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屠场》讲述了这样一个充满血腥的故事：在四旬斋期间，由于“开国元勋”（即独裁者罗萨斯）下令禁止屠宰牲口，导致肉食短缺，加上骤降暴雨，洪水泛滥，结果民心不稳、怨声载道。面对这种情况，执政者不得不下令开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屠宰场中，运来了50头膘肥体壮的小牛。在人们的狂呼乱叫、喜笑怒骂声中，瞬间有49头牛被杀。突然最后一头小牛

受惊越栏而逃，不料被它挣脱的绳索套在了一个小孩头上，霎时孩子的头被血淋淋地削了下来。屠夫们好不容易才将小牛抓住，他们认为这头牛不服从命令，一定是个“集权主义者”，于是将它“就地正法”。这时正好一个集权派的青年骑着马过来，已经平静下来了的剑子手们顿时像一群兀鹫向他扑去。可怜的青年被撞下马背，拖入屠场，在刑台上受尽百般凌辱而死。小说共分三个部分，先介绍历史背景，然后刻画了屠宰场的情景，最后是写套牛和年轻人之死。三部分层层递进，结束时画龙点睛，指出独裁者的大本营恰恰就设在屠场里。小说中用了隐喻的手法，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让我们来看一段他对屠场的描写：

“从远处看，屠场里出现了一副光怪陆离、热闹异常的景象。49头牛躺在各自的皮上，周围200多人践踏着布满泥浆和血水的土地。每具牲畜的尸体前都闪动着一群人影……手持尖刀的屠夫，他们个个袒胸裸臂、披头散发，衬衣、裤子和脸上都溅满了血污。他们身后是一伙拥挤不堪的人群，你推我攘，吵吵嚷嚷……几条肥大的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东闻西嗅，为争食而互相追逐，发出凶狠的叫声……”

这哪里是屠场，分明是独裁统治下的人间地狱。这部小说因锋芒太露而直到1871年，即埃切维里亚作古二十年后方才得以出版。

卢贡内斯的诗。

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是阿根廷诗人，南美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18岁时开始发表诗歌，1897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金山》。卢贡内斯诗作很多，如《花园的黄昏》、《伤感的月历》、《百年颂》、《里奥塞科的罗曼采》等。其中《里奥塞科的罗曼采》以作者家乡为中心，从历史、神话、传说等各方面反映了阿根廷民族风貌，为他赢得了“民族主义诗人”的称号。卢贡内斯是位语言大师，一生多产而又风格多样。他的诗歌充分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在下面这首十四行诗中，诗人完全沉溺于新奇与和谐之中。

黄昏用轻轻的画笔
点缀我周围的宁静，
宝石的嫩绿色调
又抹上了一缕深红。
一轮圆月钻出了树丛；
茂密的树叶使寂寞更浓，
一个蜘蛛用它的丝线
迷人地编织苍穹。
穹窿中蝙蝠纷飞
宛如中国的屏风；
石基上你苍白的膝盖
显出优雅的倦容，
一条混浊的河流在我们脚下
无声地流向幽冥。

二、弄潮儿向涛头立——文学的爆炸

(1) “爆炸文学”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的文学领域里，优秀作家风起云涌，小说大师辈出。他们才华横溢，大胆创新，创造出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作品，从而使南美洲文坛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局面。这些作品所描绘的风土人情和人物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民族意识和人民的气质，无不具有浓厚的南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巧上大胆革新，使拉丁美洲和欧美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读者无不感到耳目一新。人们争相阅读，并且第一次意识到南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大为震惊的西方评论家们，对于南美洲文学的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是预料不及的。他们在惊叹之余，纷纷著文评论。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毫无疑问，南美洲文学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西班牙优秀作家米盖尔·德里维斯认为：“南美洲文学已经居于世界文坛的首位。”美国的文学教授乔治·麦克默里指出：“南美洲杰出的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何塞·多诺索等都已进入世界作家的行列。”1982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在宣布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指出：“南美洲文学很早就表明，它具有其它地区文坛上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

西方评论家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出的南美洲小说为文学的“爆炸”，意即南美洲文学出现了惊人的爆炸性突破。

本世纪六十年代南美洲文学的力量确如火药爆炸一般爆发出来，一系列杰作纷纷涌现，比如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发表《彩票》（1960年）、《踢石游戏》（1963年），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发表《造船厂》（1961年）、《那么可怕的地狱》（1962年）、《像她那么悲哀》（1963年）、《收尸人》（1964年），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发表《英雄与坟墓》（1961年），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发表《人之子》（1960年），阿根廷作家奈斯多尔·桑切斯发表《我俩》（1966年）、《忧郁的西伯利亚》（1967年）、《爱情、奥稀尼一家与死亡》（1969年），委内瑞拉作家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发表《一张地图片》（1962年）和《戴假面具的季节》（1964年），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发表《城市与狗》（1962年）、《绿房子》（1965年）和《“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1969年），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发表《这个星期天》（1966年）和《漫无边际的地方》（1967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和《百年孤独》（1967年），智利作家曼努埃尔·罗哈斯发表《窃贼之子》和《投在墙上的影子》（1963年），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发表《初斯的历史》（1962年）……，作品之多，举不胜举。每本书出版，都畅销一时，一版再版，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1967年初版后的两年里，销售量达二百万册，至今又再版百余次之多，甚至有时达到每周重印一次的纪录，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主要文字没有《百年孤独》的译本，印数至今高达几千万册。六十年代的读者“像饮酒一样陶醉在源源不绝的精神财富的享受中”。

但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南美新小说即“爆炸文学”，并非仅仅名噪一时，昙花一现。它的爆炸回声一直响彻七十年代，其繁荣盛况不亚于六十年代。

上述作家几乎每人都有新的重要作品问世。比如，何塞·多诺索的《夜晚的放荡之鸟》（1970年）和《乡间别墅》（1978年），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巴尔加斯·略萨的《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年）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年），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197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1975年），胡安·奥内蒂的《死神与女孩》（1973年）、《拥抱的时代》（1974年）和《请听清风诉说》（1979年）等等，每一部作品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出版后被评论家称为“再一次证明西班牙语令人惊讶的表现力的文学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被推崇为“又一部新的经典著作”，“无论从它的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南美文学界和作家本人创作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1975年前后，一批文学“新人”登上文坛，他们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被文学界称之为“爆炸后的新一代”。例如阿根廷作家马努埃尔·普伊格发表《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1973年）、《蜘蛛女人之吻》（1976年）、《天使的阴阜》（1979年），奈斯多尔·桑切斯发表《语言喜剧演员》（1973年），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发表《我梦见白雪在燃烧》（1975年），厄瓜多尔作家伊万·埃圭斯发表《科纳雷斯女郎》（1976年）等等。

“爆炸”一词是借用了英文“boom”，意即“迅速发展”、“繁荣兴旺”。南美文学的空前繁荣，南美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用“爆炸”这一极其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实在是恰到好处。一支文学新军在新大陆的土地上爆炸似地崛起，并一举登上世界文坛，可见南美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能量之大，作品的质量之高。西班牙作家加西亚·奥特拉诺在谈到南美洲“爆炸文学”时无不敬佩地说：“我觉得南美洲‘爆炸文学’最主要的还是我称之为‘反征服’这一点。我们（西班牙人）在几个世纪之前曾经征服了他们。如今，他们却征服了我们，而且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是通过语言这一既不伤人却又具有强大威力的工具征服我们的。”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爆炸文学”是一个历史时代或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人把古巴人民革命作为“爆炸文学”的引爆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古巴革命使作家们开始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现实社会非变革不可。他们决心彻底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影响，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争取文化独立。在欧美现代派的影响和先辈作家的启迪下，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不愿意再重蹈模仿的复辙，在继承南美洲古老的文学传统的同时，要通过创造风格新颖、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来反映本大陆所独有的社会特点和民族特色。巴尔加斯·略萨说：“文学意味着不妥协，意味着反抗。作家之所以为作家，就是因为他要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他的话表达了大多数同辈作家的心声。从五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一大批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新小说家脱颖而出，南美文坛上出现了群星璀璨、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六七十年代，他们创造了许多讴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抗议军事独裁，揭露社会黑暗与腐败，抨击时政流弊的优秀作品。同世界文学中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作品一样，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国家甚至整个大陆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因此有着较强的人民性，有着作者所表达的忧国忧天忧人的感情。至此，南美洲新小说从产生、发展、巩固，已到了自然成熟的阶段，产生了爆炸的突破。

另一方面，在古巴革命之前，绝大多数南美洲读者的书桌上都是进口的

文学作品，他们历来瞧不起本地产品。革命之后，各国作家相继写出了艺术高超并具有南美洲独特风格的作品，于是读者们推翻了历来的成见，开始对它们刮目相看，人人都想先睹为快。在各国书店的文学橱窗里，本地产品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罕见现象。另外，随着南美各国文化教育事业和经济的发展，读者迅速增加。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推动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日益增多的出版部门如杂志、报纸、文化机构和出版社，一方面要满足本地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敏感地发现了欧美各国对本地作家的密切关注，因此他们鼓起勇气为本大陆作家的作品大开绿灯。随着销售量的巨幅增加，出版商们得以发财致富；同时，也为南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受“爆炸文学”的影响，在南美洲各国的年轻人中，涌现出大量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人才。他们年轻好学，四处游历，深入社会，博览群书，在诗歌、散文、小说各方面的创作中显得异常活跃，写出了不少好作品。今天，南美“爆炸文学”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但可以断定，南美文学在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繁荣发达，为丰富世界文学作出贡献。

（2）魔幻现实主义

在南美洲小说的革新过程中，在如何表现社会现实，如何继承传统的表现手法，如何借鉴欧美文学的表现技巧，如何创作具有南美民族风格的新型作品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于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倾向或流派应运而生，使得南美洲成为现今世界上文学倾向或文学流派最为庞杂的地区之一。但在“爆炸文学”那纷繁众多的文学流派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魔幻现实主义，它在当代世界文坛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称，原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在评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后期表现派绘画时使用的一个术语，后经西班牙《西方》杂志转载，才被人们应用于文学领域。

在南美洲第一个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委内瑞拉著名作家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他在1949年出版的《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中指出：“在故事情节中一直占支配地位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把人看作现实材料中的奥秘。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富有诗意的猜测，或是富有诗意的否定。由于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姑且叫它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给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并使它具有浓郁的魔幻色彩，但又不使现实主义失去其本来的面目。瑰丽、多姿、奇特的大自然，印第安人、黑人、印欧混血种人、欧洲移民等形成的多民族混杂，畸形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和人迹罕至的森林与深山，高度现代化的多国联合经济企业和刀耕火种的农业……构成一个神奇的现实，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实，一个南美大陆独有的现实，一个在欧洲人眼中颇具异国情调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以此具有魔幻色彩的现实为基础，构思新颖奇特的故事。这类故事有时混杂着作者的幻想和虚构，有时同印第安民族或黑人中间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有时夹杂着奇异的自然现象和宗教迷信，因而故事情节常常笼罩着某种神秘气氛和魔幻色彩。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通过一个小城和一个家庭的变化，反映了南美大陆的斗争、痛苦和灾难，表达了人民不满战乱，反对外来势力，渴望独立和安定的愿望。为此，作者虚构了小城马孔多和布恩地亚一家数代人，杜撰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情节和事件，写得稀奇古怪，难以置信。比如有一个人物在外受了伤，鲜血流成河，顺着街角和街道，转弯抹角，爬坡过坎，流到家里

通知了亲人。诸如此类的夸张描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手法，通过这些手法表现南美洲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现象，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不是魔幻而是现实，是通过魔幻境界的折射，间接地反映严酷的现实生活。

阿根廷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安徒生·因贝特，在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他》中这样论述魔幻现实主义：“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本来是可以认识的、合理的。但是为了使读者产生怪诞的感觉，作者便故意写得不可认识，不合情理，不肯给以合理的解释，像魔术师一样变幻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现实就在作者的想象中消失了。……在现实消失（即魔幻）与现实表现（即现实主义）的过程中，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效果有如观赏一出新奇的戏剧一样令人赞叹，也像在一个清早的阳光下观察世界：其景象即使不是神奇的，也是光怪陆离的。在这类小说中，事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会使人产生虚幻的感觉。作者要创造一种既超自然而又不脱离自然的气氛，其手法则是把现实改变成像神经病患者所产生的那种幻境。”

由此可见，魔幻现实主义的目的、特点和方法与欧美现代派中任何流派都有很大的区别。如魔幻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就有明显的区别。表现主义要求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揭示人物的内在灵魂，注重幻想或心理上的描写。而魔幻现实主义不注重对人物行为的心理分析，但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着力追求更加逼真的艺术效果，并通过奇特多变的情节，来表现存在于人类一切事物、生活和行动之中的那种神秘。

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也有很大的不同。超现实主义否认客观现实，追求“超现实”，注重开发人的心灵的秘密，挖掘人的内心世界。而魔幻现实主义则不仅不否认现实，而且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揭露现实，竭力把现实琢磨透，然后寻找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神秘东西。魔幻现实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不是虚幻的和超现实的，不能让人们为了逃避日常的现实生活而藏身其中。它所描绘的事物，它所创造的世界，必定带有神秘离奇的色彩，成为一个并不失真的“现代神话”世界。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尽管常常走样变形，但只是“哈哈镜”里的现实，决不会损害现实的本来面目。

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古巴著名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提出的神奇现实主义。在《卡彭铁尔的神奇现实论》中，委内瑞拉评论家马尔克斯·罗德里格斯说得好：“总而言之，神奇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一个基本因素，即神奇因素。在超现实主义看来，神奇是超乎寻常的、反现实生活的超现实。相反，魔幻现实主义来自现实生活，但并非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素材经过艺术家一番雕刻之后变成的魔幻现实。神奇现实主义则与上述两种流派迥然不同。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神奇，然后原封不动地予以再现，不需要任何加工，因为这现实本身便是神奇的、现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且是伸手可得的。”

至于这些作家为什么采用这种手法进行写作，作家自己的话是最好的回答。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我相信现实生活的魔幻，南美洲的现实生活是魔幻式的。毫无疑问，这里有来自非洲的影响，来自阿拉伯的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块大陆上，这里每日每时的生活中，现实都是神话。南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便是日常的生活也光怪陆离。这是一块放浪形骸又极富有想象的土地，由于孤独而耽于幻

想和种种错觉的土地。”无庸赘述，正是南美洲的这种魔幻的世界，魔幻的现实，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和极富想象的土地决定了魔幻现实主义在南美大陆上生根、开花、结果。当然，也像马尔克斯所指出的：“作家应该用世界上的全部成就充实自己，效法前贤。”在表现手法上，不少南美作家曾以福克纳、乔依斯、卡夫卡等欧美现代作家为楷模，但是他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取其精华，丰富自己，在继承南美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它。所以说，魔幻现实主义只是南美的传统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结果，并非属于现代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法国超现实主义那样，它不是个有组织、有宣言、有刊物的团体。它虽然是一种文学流派，但没有统一的创作原则，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特色，如有的采用神话的写法，有的善于渲染气氛等。而且，在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中，至今还没有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3）结构现实主义

“爆炸文学”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是结构现实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传统的小说结构形式进行改革，运用一种崭新的结构方法安排情节、叙述故事。在这样的结构安排过程中，时间和空间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打乱次序被安排在各个场景中。初读起来颇感吃力，但越往下读，就会逐渐发现每章每段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读者会被几个悬念同时抓住，好奇心促使人们非一口气看完不可，直到最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因而感到回味无穷。例如略萨的代表作之一《绿房子》，全书的故事由五个主要情节组成，按照习惯，作者本可以将五个情节依次叙述。但是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文学作品也应当用富有诗意的艺术品来反映它，不然就缺乏魅力，单调乏味。所以他便采用了一种新式的结构，把五个情节以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分割成若干断面，把这些断面彼此交错地穿插在一起，分头叙述。并且在叙述中运用跳跃、颠倒、独立、交叉、并行、混合等多种形式，故事中套故事，对话中夹着对话。作者把这种写作技巧称为“中国套盒式”的写法。凡此种种多角度的断面的穿插，都是在瞬息之间完成的，如同电影镜头的急剧转换，既无区分章节的符号，也没有标点符号。对白与独白混在一起，过去与现在混在一起，此地与彼地混在一起，对话与叙述混在一起，幻想与现实混在一起，所以读者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一行行、一字字地去“读”，而是要像看电影，或是看万花筒那样几个断面同时去“看”。

这样的结构和叙述形式确实显得新奇别致，多姿多采。在作者的安排下，现实生活有如万花筒一般五彩缤纷。但是，它的革新只是在结构形式上。在观察生活，描写现实，表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方面，仍然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

除了上述两种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外，“爆炸文学”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注意的文学流派。例如以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幻想派，以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以秘鲁作家胡里奥·里维罗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以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为代表的“反小说”等等。南美洲是一块充满艺术魅力的大陆，有着有利于文学繁荣的肥沃土地，各种各样流派的作家在这块土地上如鱼得水地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以其雄浑有力的作品竞相媲美，试比高低，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反映南美的历史和现实，使南美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

(1) 加西亚·马尔克斯

作为“爆炸文学”及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是当代西方文坛升起的一颗巨星。他不仅是哥伦比亚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在拉丁美洲、欧洲、美国以及前苏联、东欧等许多国家都被公认为当代杰出的作家。1982年，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对他的评语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技巧娴熟、章法严谨的艺术大师”。

1928年3月6日，哥伦比亚濒临大西洋的小镇阿拉卡塔卡的一个医生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头生子，名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镇上的邻居们决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震惊世界的文学大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医生。母亲生下他以后不久，就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家。父母很少看望他，关心他，所以他对父母亲的印象十分模糊。父亲忙于工作，母亲接连地生孩子，让他后来有了十五个弟妹妹。

马尔克斯一直在外祖父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外祖父有一座幽静而宽敞的住宅，那里有个特别的房间，据说那是个充满恐惧的奇异世界。外祖母告诉他，那里每个角落都有幽灵，下午六点以后，人就难以通行；夜深人静时，常常可以听到神秘的谈话。

外祖父家里的陈设、家具都带有魔术师道具的风格，令人感到处处都充满了神秘的魔幻色彩。就连小马尔克斯的房间也是如此。外祖父、外祖母在他的床脚边设了一座闪光烁烁的大祭台，祭台上供着许多用石膏做的圣像，它们那一双双和善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亮。在这种奇异的充满神秘的气氛中，外祖母犹如一个痛苦的幽灵，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房间，坐在马尔克斯床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令人恐怖的故事。外祖母相信迷信，但她在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她的故事似乎总也讲不完，昨天是印第安神话，今天是各种可怕而有趣的传奇故事，明天也许是她与死去的亲人的幽灵交谈的神秘情况。外祖母讲起来绘声绘色，仿佛是她刚刚亲眼所见，使马尔克斯听得着了迷。这些毛骨悚然的故事和恐怖的感觉深深地印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

外祖父是个善良、耿直而倔强的老头儿，曾在内战中打过仗。那时他是个退役的上校，在小镇上颇受人们的尊重。外祖父常常带着小马尔克斯一起长时间地散步，或者去看马戏团的精彩表演。他还经常向马尔克斯回忆他那逝去的岁月。幼小的马尔克斯把外祖父当作自己最亲密的同伴、朋友和知己。

在外祖母的影响下，马尔克斯自幼酷爱文学，7岁即能阅读《一千零一夜》。外祖母讲给他听的那些神话传奇趣闻故事，以及外祖父那高大的形象和倔强、善良的性格，给马尔克斯的童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宝贵回忆，并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8岁时，外祖父不幸去世，这给小马尔克斯在精神上一次不小的打击。

12岁时，马尔克斯被送到首都波哥大的一所教会学校念书。18岁那年他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保守党与自由党争夺权力，致使全国大乱，马尔克斯不得不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目击者报》记者，曾先后到过意大利、法国、英国、波兰、

捷克、匈牙利。1959年，受古巴拉丁通讯社之聘，任该社驻波哥大记者。1960年，先后在古巴和美国为该社工作。1961年至1967年居住在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自1975年起，他举行所谓的“文学罢工”，以抗议智利军事政变。直到1981年才重新发表作品。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担任法国——西班牙语国家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1983年3月，马尔克斯作为当时仅仅就任四个月的新总统的客人回到祖国首都波哥大，并在那里定居。

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1947年，其时年仅19岁，处女作发表在《目击者报》上，在此后的五年中他先后在该报上发表了14篇短篇小说。此时，他尚未形成自己个人的风格，这些早期作品大多刻意模仿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和乔依斯等的写作手法，主要描写人对死亡的忧虑。由于结构松散，语言造作，只能说是文学创作上的尝试，但毕竟为马尔克斯最终踏上文学创作的成功之路作了铺垫。

195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短篇小说《伊莎贝尔在马康多的观雨独白》、《周末的一天》（获波哥大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颁发的文学奖）和中篇小说《枯枝落叶》。这三篇作品的特点是构思新颖，想象奇特，情节跌宕，笔法多变，但往往蒙着浓重的恍惚迷离的色彩，而且偏重刻画人物的变态心理。1961年，他发表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退伍军人晚年贫困潦倒的悲惨境遇。智利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哈尔斯认为，上校这个人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既抓住了主人公的个性，更抓住了他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也是作者当时心情的写照。据说他原打算把上校写成一个喜剧式的人物，但是，就在他动手写这部作品时，哥伦比亚政府封闭了《目击者报》。这时，他在巴黎，由于收不到报社的汇款，生活立即捉襟见肘。马尔克斯失业了。他欠了旅馆整整一年的房租，计十二万三千旧法郎。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他生计窘迫困厄，几乎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他在写作时，再也没有笑的心思，即使偶尔有笑容，也是像上校那样强装笑颜，以此来抵御饥寒交迫的威胁。读者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尽管作者在许多场合使用了幽默诙谐的笔法，但心情是十分忧郁而沉重的。正是上校这种面带笑容迎接死亡的个性，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作者历来认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他生平的得意之作，在艺术成就上超过《百年孤独》。

1967年至197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好人布拉卡曼，奇迹的贩卖者》（1968年）、《巨翅老人》（1970年）、《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1972年）和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年）。《家长的没落》刻画了一个独裁者、某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的一生。它旨在以荒诞、夸张的手法揭示并鞭挞现实生活中的专制统治，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1975年以后，由于“文学罢工”，马尔克斯搁笔五年。直到1981年4月，马尔克斯方才发表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是一篇纪实体小说，叙述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青年被无辜杀害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对人们的毒害。

1985年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题为《霍乱时期的爱情》，叙述19世纪加勒比海边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该书第一版即印刷120万册，分别由哥伦比亚、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三家出版社联合出版，

成为出版界轰动一时的新闻。

关于文学创作，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1982年）中谈得很多，很详细。他承认，卡夫卡、海明威、格雷厄姆·格林等作家对他产生影响。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他的外祖母。他说：“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着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另外，他只要写东西，就常常跟朋友谈论，用这种方法，就能发现哪儿写得成功，哪儿写得还有缺陷，这是在黑暗中认清前进方向的一个诀窍。马尔克斯认为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创作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他这样说：“我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这跟梦境一样。”

马尔克斯反对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主张作家应该深入生活。有一次，马尔克斯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怎么也写不好作品中某个城市的闷热气候。那个城市在加勒比地区，那儿的天气应该热得可怕。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举家前往加勒比。他在那里几乎呆了整整一年，什么事也没干。这本书后来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完成了。

马尔克斯的写作态度是很严肃的。他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光是写用不了很长时间，但是从酝酿到成熟要很多年。他在动笔写《百年孤独》以前，花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来构思这部小说。《家长的没落》也是如此。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酝酿了三十年。他曾说过：“写一篇十二页的短篇小说，我有时要用五百张稿纸。1962年我在墨西哥写《家长的没落》，写了近三百页稿纸便停了笔，底稿里只有主人公的名字给保留下来了。1968年我在巴塞罗那重新开始写，辛辛苦苦干了六个月，又停了笔，因为主人公——一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写得不太清楚。”

在谈到创作经验时，马尔克斯认为，一般作家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观念，就能写出一本书；而他总是得先有个形象。如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这是作者自觉最得意的佳作，那是他在一个荒凉的镇上看到一个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着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奔走的情景之后写成的。中篇小说《枯枝落叶》是由于看到一个老头带着他的孙子去参加别人的葬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他看到一个沉默不语、心急如焚的人在闹市码头等候渡船之后开始写的。《百年孤独》的开头是基于目睹一个老头儿带着一个小男孩去见识冰块的形象。

马尔克斯不仅是个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文学大师，也是一个正直、嫉恶如仇的战士，并对人类和社会具有很强的责任感。据说，他把自己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用于在哥伦比亚创办一份报纸。1979年，保加利亚政府为了表彰马尔克斯“为和平、民主以及社会进步而从事的积极活动”，向他颁发了“季米特洛夫奖金”。马尔克斯十分关心自己祖国和拉丁美洲的前途和命运，竭力主张在拉丁美洲进行社会变革，并渴望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应当说，马尔克斯的思想是进步的，积极向上的。面对黑暗势力的统治，马尔克斯曾公开宣称：“我渴望整个拉丁美洲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可是现在人们幻想在建设中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为他于196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百年孤独》的问世，使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顶

峰。

（2）《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是“爆炸文学”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一发表，就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爆炸性的巨大轰动，国际上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给予它高度的评价。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称《百年孤独》是“继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有的干脆将它誉为“当代的《堂吉珂德》”。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它对西班牙语的贡献比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还要大，它不仅使我们的语言复活，也使我们的神话复活了。”美国评论家约翰·巴思说它是“本世纪下半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部小说，而且是任何一个世纪这类杰出作品中的杰作”。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巴尔加斯·略萨说：“《百年孤独》在拉丁美洲引起了一场文学地震。评论界及读者一致公认它是一部经典著作。”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也称赞马尔克斯写的这部小说“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的作品代表了真正的拉丁美洲，使人们不仅从历史而且从各个方面能够了解拉丁美洲”。瑞典文学院宣布马尔克斯获奖的理由是：“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自五十年代末，他的小说就把我们领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写，都以新闻报道般的准确性再现出来。”

《百年孤独》通过布恩地亚一家数代人的离奇曲折的遭遇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经历，描绘了加勒比海沿岸小城镇马孔多从一片完全崭新的天地建造村庄开始，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历经“香蕉热”、自由党与保守党的长期内战、香蕉工人大罢工等重大事件，最后毁灭在4年11个月零2天的大雨之中。在许多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中糅合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宗教习俗和风土人情，反映了哥伦比亚农村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的百年沧桑，表达了作者渴望和平、痛恨社会动乱、憎恶战争、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独立和团结的思想感情。

《百年孤独》的基本手法是现实主义，作者采用了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叙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作者虚构的小城马孔多，是以自己家乡小镇阿拉卡塔卡为原型的。从马孔多的兴建、发展、繁荣乃至消亡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历史演变和严酷的社会现实。

原来只有二十一户人家的马孔多，是一个幸福的村庄，曾经与世隔绝地生活了许多年。但因为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到来和乌拉苏发现与外界的通道后引来了第一批移民，从而改变了乌托邦式的平静生活。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这样一段历史：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繁衍生息着许多土著民族。但西班牙殖民者高举着剑与火以及十字架闯进了那里以后，随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大批移民的到来，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从社会结构、种族、信仰到习俗风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后来，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经过殊死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殖民者的桎梏，但各国的政权落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在哥伦比亚，统治阶级内部分为两派：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哥伦比亚历史上，这两派为争权夺利而展开过长期的激烈斗争。《百年孤独》中，描写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斗争长达一百八十多页。在马孔多，保守党控制的选举完全是一场骗局，镇长在选票

上弄虚作假，他的女婿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目睹后认为自由派为了选票也应该打仗。而自由派分子在镇上煽风点火，随时准备暗杀保守派分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一生发动了三十二次起义，都被保守派的政府军镇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孙子接管了马孔多的权力之后，竟身穿元帅的制服，在镇上为所欲为，发布蛮横无理的公告，把冒犯他的人随意处死，最后成为马孔多有史以来最凶残的统治者。这些都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真实写照。

美国人在马孔多开辟香蕉种植园，使人想起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的渗透和掠夺。香蕉工人大罢工和被屠杀，都可以在哥伦比亚历史中找到依据，不过屠杀的人数被夸大了而已。在众多的历史事件方面，小说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因此，马尔克斯在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一书中说，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拉丁美洲的历史。

《百年孤独》在另一个方面具有非现实主义的特征。它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法，把现实幻想、写实与夸张、真实与荒诞、象征与寓意、严肃与嘲讽、人与鬼魂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糅合进印第安民族及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从而产生了一种似真非真、似梦非梦、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独特风格。

在《百年孤独》中，极端夸张的描写屡见不鲜。作者的并不是表现具体的细节，而是为了丰富读者的想象力。通过对人或事的概括、形象化的认识，来达到艺术渲染的神奇效果。如外界文明刚刚进入世外桃源的马孔多时，只见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提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往下掉，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扎出来而嘎嘎作响。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大儿子在外面世界闯荡了多年之后回到马孔多，当他走到家里时大地震动，震得房子都快挪动了窝。他在饭桌上打起饱嗝来简直像野兽在咆哮。后来他遭到暗杀后，一股鲜血从门底下流出来，穿过客厅，流到街上，又继续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流去；流下台阶，爬上河边的街道，笔直地流进那条土耳其人住的街道；然后向右拐过一个街角，又向左拐过另一个街角，一直流向布恩地亚家的住宅，从关闭着的门下流过去；为了不弄脏地毯，它贴着墙边穿过客厅，又穿过另一个房间，拐了一个大弯躲开饭桌，沿着摆满秋海棠的走廊前进；悄悄地从正在给孩子上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流过，钻进谷仓，然后流进厨房，出现在正在打开36个鸡蛋准备做面包的乌尔苏拉面前。在写到香蕉公司的罪恶时，那些美国佬竟“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他们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庄稼成熟的周期”，从而加速进行经济掠夺。大屠杀以后，立即下起一场暴雨，这雨持续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似乎为了冲刷工人的血，洗掉人们对这次大屠杀的记忆。

在《百年孤独》中，不少情节极其荒诞，从而产生魔幻境界浓重的神奇色彩。但隐藏在这种超自然气氛后面的思想实质，仍然没有脱离拉丁美洲的生活土壤。如马孔多建成后，布恩地亚一家都患上了失眠症，他们五十多个小时不睡觉也不惊慌；后来这场疫病传遍了小镇，失眠症引起了健忘症，连桌子、门、牛、羊等日常生活中的名称都忘了。其思想实质是指人们开始意识到历史的存在，接受不可改变的时间观念。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为了募集修建教堂的资金，喝了一杯巧克力后使自己离地升腾十二厘米，以便证明上帝有无限神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死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小黄花，闷死了睡在露天的动物。

《百年孤独》还大量运用印第安传说、阿拉伯神话以及《圣经》典故，从而增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力，如写阿拉基尔的鬼魂日夜纠缠布恩地亚一家便取材于印第安传说。阿拉基尔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杀死后，他的幽灵常常出现在仇人家里。一天夜里，乌尔苏拉发现阿拉基尔浑身发紫，神情哀伤，正在设法用芦苇堵住喉头的伤口。过了两夜，乌尔苏拉又看见他在浴室里洗着脖子上的血迹。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看见他哭丧着脸站在院子里，就大声叫喊让他滚开，并拿着标枪威胁他，但他没有走开。从此以后，他们睡不安宁。后来，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失去理智、被绑在树上之前，由于对生者的强烈的眷恋和对阴间的另一种死亡的恐惧感，阿拉基尔最终对他的最大的冤家也产生了感情，于是俩人像朋友一样整夜长谈，又如有关飞毯和俏姑娘乘床单升天的描写是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的引伸；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带领人们创建马孔多的情节使人想起《圣经·创世纪》和《希望之乡》；长达四年之久的滂沱大雨则是借用《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

在《百年孤独》中，悲观、孤独、郁闷和忧伤的气氛笼罩始终。布恩地亚的子孙们，尽管相貌、肤色、脾性和身高等各不相同，但从他们的眼神里，一眼便可辨认出这一家族所特有的孤独神情。就连他们的名字也没什么花样，一代又一代取名为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战争结束后，闭门独居，周而复始地做着小金鱼，做好后又化掉，然后又重新再做；雷蓓卡死了丈夫之后，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一幢朽烂的房子里，以致许多年后大家都以为她早就死了；以孤独为殊荣的阿玛兰塔，把生命消磨在刺绣裹尸布上，白天绣，晚上拆，用这种方式来保持她的孤独；俏姑娘雷梅苔丝每天在浴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打发时间……作者就是用这种象征的手法来描写由于孤独而造成的愚昧、落后和因循守旧、不思改革的僵化现象。作者的观点是：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就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造成布恩地亚家族和马孔多一百年孤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者希望人们认真思考，并找出一条打破这种孤独境况的出路，在被飓风刮走的马孔多废墟上着手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部经典作品。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魔幻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反映现实才是创作的真正目的。有些评论家认为，以魔幻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和魅力及其在国际文坛上引起的反响来看，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南美各种文学流派中最适合表现拉丁美洲现实、拉丁美洲人的气质与精神的一派。

四、巴尔加斯·略萨和《城市与狗》

(1) 巴尔加斯·略萨

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36—）已成为西方声誉最高的小说家之一。不论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还是在欧洲和美国，他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欧美各国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记者也纷纷为他的作品写介绍、报导和评论。随着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望也日益提高。1976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上，年仅四十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荣幸地被选为主席（任期三年）。这个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把拉美作家选为主席，可见略萨对欧美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

巴尔加斯·略萨于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风景如画的秘鲁小城市阿基雷帕。他出生后不久，父母不睦，分居两地，母亲带他离开秘鲁，来到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住在做外交官的外祖父家里。幼年时，他很像小姑娘，娇生惯养，十分任性，总要把自己的意志像法律似地强加给别人。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在他刚满十岁时，这段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突然中断了。母亲带着他回到秘鲁，不久父母便重归于好。但略萨对父亲毫无感情，从小以为父亲早已死了。每当他和父亲单独相处时，显得十分别扭，好像是两个陌路相逢的外人。父亲为了改变他那又任性又软弱的性格，要培养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于1950年把他送进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学习。他在那里受了两年活罪。这个学校里的弱肉强食、滥施暴力等种种黑暗，在他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就是根据这个学校里的生活创作的。

1952年略萨从军事学校毕业后，考入利马的圣·马尔科斯大学。由于他的父母在美国工作，所以他就和在利马的外祖父同住。这时，略萨舅母的妹妹胡利娅·乌尔基迪·利娅内斯跟丈夫离婚后从玻利维亚来到秘鲁首都。略萨经常陪同胡利娅姨妈看电影或散步。在不断的接触中，略萨竟爱上了姨妈。后来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同姨妈结了婚。当时略萨只有十八岁，而胡利娅已经是三十二岁的女人了。

1958年略萨毕业于圣·马尔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同年，他创作了一篇题为《挑战》的短篇小说，参加一家法国杂志组织的征文比赛，因获奖而得以免费去法国旅行。这次旅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同年，他获得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奖学金，此后又取得该校的博士学位。1959年他去巴黎求学，但因未取得奖学金，只得半工半读。他教过西班牙语，搞过翻译，当过编辑，最后在法新社西班牙文部和法国电视台各谋得一职，生活才较为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他结识了当代著名文学家如阿莱霍·卡彭铁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路易斯·博尔赫斯等。略萨十分敬重他们，但据说他对博尔赫斯最崇拜。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法国文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同时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工作。

从1960年起，略萨决心要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创作一部反映他曾就读过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生活的长篇小说。他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完成。起初定名为《骗子手们》，后改名《英雄的住所》。小说虽然完成，但在秘鲁是不可能出版的，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有人建议他把稿子寄往西班牙。这时，恰逢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简明文库”文学奖的征文比赛。于是他怀着

侥幸的心理，把稿子寄到巴塞罗那。西班牙的评奖委员会一致通过，把这项文学奖金授予略萨这个年仅 26 岁的秘鲁人。一个评选委员评论说：“这是三十年来最好的西班牙语小说。”1963 年 10 月，《英雄的住所》以《城市与狗》的名字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巴尔加斯·略萨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略萨成了知名作家之后，妻子胡利娅姨妈主动提出同他离婚。他们一起生活了八年。后来略萨爱上了他自己的表妹、胡利娅的外甥女帕特里西娅，并同她结婚。

继《城市与狗》之后，略萨接连不断地写出了不少力作：1965 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1968 年发表中篇小说《幼兽们》，1969 年发表第三部长篇小说《“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1973 年发表第四部长篇小说《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7 年发表第五部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1 年发表第六部长篇小说《世界末日的战争》。

略萨的几部长篇小说先后获得一些文学奖。除 1962 年获西班牙“简明文库”文学奖外，1963 年和 1967 年两次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67 年获秘鲁全国小说奖，1968 年获委内瑞拉设立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1978 年获西班牙新闻奖。

纵观略萨的作品，我们看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贯串了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即人是腐朽社会的牺牲品，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略萨的这种创作思想和他的作品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者在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描绘现实世界的同时，以锐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抨击世道的不平，而对于那些受凌辱、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则寄予无限的同情。略萨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社会犹如一条凶恶的毒蛇，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分别代表着军权、政权和教权，它不断地从腐烂的体内喷吐着毒焰，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千千万万无辜的善良人。略萨之所以这样做，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他产生的影响。

略萨的创作艺术独具一格，大体上可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追求真实性，力图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各个层面全部糅合在一起，囊括于一个共同体之中。二是极力缩短作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具体做法是改变传统小说的结构，采用现代派意识流等手法，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旧观念，打破传统的叙述顺序，邀请读者“参与”创作，就是说要求读者理清脉络，充分发挥想象力，同作者和人物在书中交流情感。三是生动活泼的对话形式。大体上有这样几种：交叉性对话，单向性对话，叙述性对话，电影蒙太奇式的对话等。四是细腻自然的心理描写。他在大量采用新技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摒弃或忽视传统技巧。凡是能使作品更加生动、更能吸引读者的手段，他一概兼收并蓄。

（2）《城市与狗》

《城市与狗》描写了秘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的学生生活。在学校采取的暴力教育下，几乎人人都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善良的本性，变成了一群残忍的野兽，人类的罪恶在他们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这就是反动军事教育的结果。这所被军队引以自豪的军事学校戕害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

《城市与狗》的故事大致如下：

夏季的最后一天，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来到在利马的莱昂西奥·普拉多

军事学校，成为该校新来的三年级士官生。刚来不久，他们就分别遭受了四年级士官生对他们进行的残忍的“洗礼”：他们个个被殴打、唾骂、涂抹，甚至被尿浇过。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全班成立了一个叫“团体”的组织，专门对付四年级。他们推举一个外号叫“美洲豹”的做头目，因为“美洲豹”在被“洗礼”中表现出色，一二十个四年级生都对付不了他。两天后，他们开始报仇。

他们在晚上出动，把四年级的一个哨兵剥光衣服捆起来。哨兵在黎明被发现时，已被冻得奄奄一息。新生们最大胆的行动是对厨房的袭击：把成包的粪便扔进四年级的汤锅里，致使许多名学生由于腹泻而被送进医务室。对这些匿名的报复行动，四年级生极为恼火，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那残忍的“洗礼”。

有一天夜晚，“团体”正在开会，被甘博亚中尉发现。中尉强令他们解散“团体”，从此“团体”再没活动过。但美洲豹不甘心，又组织了四个人的小团体。

过了一年，他们已是四年级的士官生。对于新来的三年级士官生，他们同样要进行一番“洗礼”。但他们认为，三、四年级之间的事只不过是儿戏，真正的对手还是五年级。谁能忘掉去年自己进校时的“洗礼”呢！

有一次在影剧院看电影，四年级和五年级发生罕见的冲突，在黑暗中双方大打出手。军官们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于是他们发火了，对准学生乱打乱踢起来。但当事件涉及到需要共同对付军官时，四、五年级的士官生们都装得一本正经地说：“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好朋友。刚才的事，我不知道。”这件事传到上校校长那儿，校长简直气坏了。

又过了一年，他们都升入五年级。这一年结束后，他们就要毕业。以美洲豹为首的四人小团体决定去偷化学考试题。山里人卡瓦中签，只得执行这个任务。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

上校校长得知化学试题被偷，气急败坏，在饭厅里冲着军官们嚷了一通。军官们一个个都像发了狂的野兽。上校命令：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这天夜间值勤的人一律不准离校外出。

受人欺负，被美洲豹称为“奴隶”的阿拉纳是那天夜间值勤之一。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女友特莱沙，但不能出校去同她见面，因此心中万分苦恼。三个礼拜过去了，他思念女友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决定去告发偷试题者，以换取周末外出的机会。卡瓦独自承担了责任，结果被校方开除学籍。

小团体为此大受震动，美洲豹发誓要为卡瓦报仇。不久，在一次实弹演习中，“奴隶”突然头部中弹身亡。上校校长闻知此事心理十分惊慌，害怕这事传到国防部长耳朵里，于他的前程极为不利。于是他在全体军官会议上掩盖事实真相，强调要统一对外解释的口径：“士官生由于事故而死亡，而这是由于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对此不能有任何疑问。”

班里跟“奴隶”唯一要好的人叫阿尔贝托。他为人狡诈，乘“奴隶”不能外出的机会，把他的女友夺了过来。虽然如此，“奴隶”的被害，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决心要为“奴隶”伸冤报仇。

阿尔贝托把“奴隶”被杀的前因后果以及班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如吸烟、酗酒、赌博、打架、盗窃、贩卖考卷、淫乱等一古脑地报告给被称为“模范军官”的甘博亚中尉。第二天，中尉又让阿尔贝托把班里的情况报告给加里多上尉。但冷酷而阴险的上尉怕闹出乱子，不准阿尔贝托申张此事。而办事

一向认真的中尉对五年级一班进行大搜查，查出许多违禁品，人人都受到中尉的处罚。

中尉把此事报告给上校校长。但上校校长意欲掩盖真相，在召见阿尔贝托时，抓住阿尔贝托的缺点和弱点，迫使他答应保守秘密并收回他的控告。

阿尔贝托此时对美洲豹恨之入骨，并毫不犹豫地告诉美洲豹，是他告发了宿舍里的一切。由此，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斗。但当他们回到宿舍时，班长认定美洲豹是告密分子，并谴责他的叛变行为，全班同学纷纷扑向美洲豹。美洲豹在班上被彻底孤立。

甘博亚中尉因为这事得罪了上司，他不但失去提升的机会，而且被调离军事学校，发配到亚马孙地区边远地方服役。当他离开军校时，美洲豹向他承认自己杀死了“奴隶”。但甘博亚认为：“让士官生阿拉纳起死回生，比劝说当局承认错误容易些。”所以他劝告美洲豹：“不必作无谓的牺牲，以后尽量吸取教训。”随后，他提着行李，头也不回地离开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

《城市与狗》的主题，从书名本身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它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狗咬狗”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关键就是暴力，弱肉强食，只有强者，或者能适应生存者才能生存，充分体现达尔文主义的人生观。作者描绘出一幅灵肉腐烂的凄惨画面。他的笔锋针针见血，绝不手下留情。这座学校不仅以其环境和地形而且以真实姓名出现在小说中。作者对学校的描绘是相当逼真的（有人则认为是诽谤性的），因而引起官方的震怒。当《城市与狗》在秘鲁出版普及本时，官方恣意造谣中伤，并且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集会，把该书第一版几千册当场焚烧；两名将军登台演说，痛斥作者大逆不道，大骂作者“侮辱了神圣的民族精神”，指控作者是“秘鲁的叛徒”，是“共产党分子”。他们的这种丑恶表演恰恰说明《城市与狗》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刺中了他们的痛处。他们越是叫嚷《城市与狗》纯系捏造，不值一谈，人民群众越是争相购买阅读。与反动当局的愿望相反，《城市与狗》在拉丁美洲各国广为传播。

在《城市与狗》中，作者怀着对反动军人统治深恶痛绝的斗争勇气，刻画了一个老奸巨滑的上校校长的形象。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总是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模样，而事实上他阴险狡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要稍有反抗，他便露出狰狞面目，残酷地加以镇压。这个上校校长，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军事独裁统治的反动军人的代表形象；而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则是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缩影。

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所遵循的军事制度，以其独裁式的纪律营造出一种紧张气氛。由于学校是座熔炉，它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爆炸性地混杂在一起，从而加剧了这一紧张气氛，立刻就开始冲突起来，新陈代谢的变化也开始了。第一次冲突之后，所有的人都缩成了最小公分母，全都处于细菌式的环境里，成为一种粘性的球体，时而做出纯粹的布朗运动。我们从他们的外形勉强可以认出主要角色的身影。阿尔贝托，富家子弟之一，瘦削可爱，有同情心，但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浸透其骨髓。美洲豹是工人之子，小集团的首领，喜欢打架，惯于恃强凌弱，他是黑社会里野蛮法律的代表人物。站在学生对立面、同时又助长学生犯罪的是该校的领导，如：加里多上尉，冷酷而阴险，是这个制度的典型角色；瓦里纳中尉，一个懒惰的小官僚；甘博亚中尉，人虽正直，但也不自觉地成为这套齿轮装置的俘虏。这个悲剧

的焦点是士官生阿拉纳，由于他生性胆怯，大家都叫他“奴隶”。

在《城市与狗》中，除了描写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校学生的日常生活外，还有大量的篇幅，采用倒叙、对话和心理活动穿插起来的手法，详细介绍了阿尔贝托、“奴隶”、美洲豹等主要人物的少年生活、入学经过、家庭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情况，从而把军事学校的生活与利马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略萨的这部作品中，现实生活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了最小的程度。巴尔加斯·略萨坚持要使读者完全沉浸在作品中。他说：“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小说才是最高级的文学品种，因为它可以把读者引进作品的灵魂中去。作者的责任就是使读者乐而忘返。我所钦佩和一再重读的小说家们从来不是要我们站在远处去欣赏他们，而是吸引我们，使我们着迷，把我们请进他那个新天地，到最后才使我们发现那些作者们。现实生活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它一进入小说便有了章法。小说的结构越是严谨，它所揭示的天地也就更容易理解。

巴尔加斯·略萨为了缩短乃至取消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竭尽全力地拼搏。他运用的技巧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这些技巧是吸引人的手段。交叉倒叙、内心独白、镜头变换等，都几乎是强制性地要读者吸足书中人物所散发的脓臭。这些吸引读者的手法并非件件管用。常常有一两招是过于卖弄。比如，他有一个总要引起读者好奇的坏习惯，他故意藏起一些基本素材，结果反而弄得读者头脑混乱。《城市与狗》中有一系列的辅助情节，把我们带进某个人物（结果是“美洲豹”）的思绪里，可是直到全书的结尾我们还不知道该人的身分。为了使结尾的交待格外动人，作者力图简练，但结果反而使读者看不明白，从而失去兴趣。不过这些手法是有目的的。《城市与狗》是一部静脉血管式的小说。该书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吸收能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能力。

五、巴勃罗·聂鲁达和《漫歌集》

(1) 巴勃罗·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伟大的民族诗人,是继卢文·达里奥之后拉丁美洲诗坛上一颗灿烂的明珠,被世界各国公认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他于1971年10月因其鼎力之作《漫歌集》(又译作《诗歌总集》)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享誉国际文坛。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那里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他的祖辈就以种葡萄和酿酒为生。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两年后,幼小的聂鲁达随父移居到智利南部的特木科城,并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特木科城周围的森林一望无边,随风起伏的绿色构筑着充满生机的广阔空间,林中小鸟的鸣啾和各显异态的生物给小聂鲁达带来无限的神秘感和童趣,也赋予他无穷的遐想。家乡连年不断的雨水下个不停,一根根雨丝从天而降,落地后聚成一片水的世界。聂鲁达常常趴着凝视窗外,那浮在水面上的房屋,在他的感觉里,就像一艘艘飘浮的航船,在严冬的大海中永远漂流,却不知漂向何方。森林和雨水组成他少年时代的全部生活背景,在这种寂寥的环境中,胆怯而寡言的聂鲁达渴望交流和表达。而生成于雨季中的表达欲望,诗歌无疑是较好的形式之一。他终于拿起纸和笔,尽管他的父亲和家人都不相信他能写诗,他还是把对母亲的怀念和感恩写成了诗,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心中揣着对故土的无比亲情,从泥泞和沉寂中悄然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

在聂鲁达的少年时期,他还几乎没有学会书写。有一次他感到万分激动,便胡乱写了几行半押韵的词句,但是他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的话不一样。他把这些词句誊抄在一张纸上,那是一首献给母亲的诗,感激他那天使般的母亲:他的童年全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他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他们正在饭厅里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交谈就犹如一条大河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小聂鲁达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第一次灵感的来临而颤抖。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一边漫不经心地还给他,一边说:“这是哪儿抄来的?”说完继续低声同母亲谈他们的重要往事去了。小聂鲁达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就是这样第一次受到漫不经心地表达出来的文学评论。

聂鲁达在特木科读中学的时候便开始写作。1917年7月他在科木科的《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见报的作品。但他的父亲极力反对他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有个诗人儿子,而且他把聂鲁达数学分数低的原因都归咎于他的诗句。从此以后,他不断使用不同的笔名在首都圣地亚哥和家乡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习作。有一次,聂鲁达看到了捷克伟大的作家扬·聂鲁达的一篇短篇小说,它给聂鲁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不让他父亲知道他发表的那些诗,聂鲁达需要找一个他父亲完全找不到线索的笔名,他记起了那位伟大的捷克作家。从1920年起,他正式使用巴勃罗·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

1921年3月,聂鲁达离开家乡到圣地亚哥教育学院学习法语。不久,他

的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文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192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第二年他的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问世，引起智利文学界的瞩目。紧接着他又发表诗集《奇男子的引力》（1925年）、《戒指》（1926年）和小说《居民及其希望》（1926年）。

从1927年起，聂鲁达长期担任外交官，曾先后担任驻仰光（1927年）、科伦坡（1928年）、雅加达（1930年）、新加坡（193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年）、巴塞罗那（1934年）、马德里（1935—1936年）和墨西哥城（1940—1942年）的领事。在马德里，他主办了《绿马》诗刊。

聂鲁达一生为正义呐喊，他爱憎分明，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处世原则。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义无反顾地站在西班牙人民的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正是这个原因，智利政府要他离职。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怒与痛苦回到自己的祖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创作并发表了不朽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年）。

1939年，聂鲁达被任命为驻巴黎专门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他竭力拯救集中营里的共和国战士，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来到拉丁美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诗人的诗风。他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在此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英勇的苏联人民正在与希特勒德国浴血奋战。诗人到处演说，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同时写下《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等优秀诗篇。

1943年11月，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他在黑岛买下一处别墅，在那里开始着手创作他最重要的诗作《漫歌集》。

1945年在聂鲁达的一生中是难忘的一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并于同年7月加入智利共产党。1946年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聂鲁达本人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继续从事创作。他几乎每天都要更换住处，到处都有一扇门为庇护他而打开。他走过田野、港口、城市、野营，也到过农民、工程师、律师、医生、水手和矿工们的家。在那必须东躲西藏的危险的一年里，聂鲁达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

1949年，聂鲁达翻过安第斯山脉从智利逃到阿根廷，并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这使智利政府大吃一惊，官方申辩说聂鲁达仍在智利被搜捕。1950年他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1951年，聂鲁达怀着对新生中国的热爱之情，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和爱伦堡一起来到中国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金（当时叫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其后他在1957年再次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和文学界同仁艾青、萧三、丁玲和茅盾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消对聂鲁达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集会和游行欢迎他的归来。回国后，他专心从事创作，完成《元素的颂歌》、《新的元素的颂歌》和《颂歌等三集》。1957年他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许多诗作。如：《爱情十四行诗100首》、《黑岛纪事》、《沙滩上的屋子》、《船工号子》、《无用的地理学》、《孤独的玫瑰》等等。

1970年，聂鲁达接受了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参加智利总统竞选的角逐。这是促成人民联盟各党派合作的战略。当人民联盟推举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共同候选人之后，聂鲁达立即退出竞选，并支持阿连德直至取

得竞选的最后胜利。

1971年4月，聂鲁达被阿连德任命为智利驻法国大使，同年10月21日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六位西班牙语作家和第三位拉丁美洲作家。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同年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在智利圣地亚哥与世长辞。不久，国际舆论界十分惊讶地获悉，聂鲁达在瓦尔帕莱索的住宅和在圣地亚哥的正用于为他守灵的住宅，已被智利法西斯分子抢掠一空并捣毁。

聂鲁达逝世以后，人们又出版了他的诗集《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神》、《挑眼集》以及回忆录《回首话沧桑》、散文集《我命该出世》等。198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还出版了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

我们可以把聂鲁达一生的创作生涯分为四个时期：（1）

1917年—1927年，代表作是《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2）1928年—1934年，代表作是《大地上的居所》；（3）1935年—1961年，这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主要作品是《第三个居所》、《漫歌集》、《遐想集》等；（4）1962年—1973年，主要作品是《黑岛纪事》、《船工号子》、《孤独的玫瑰》等。

聂鲁达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与他写人民的题材分不开的。尤其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相互结合的产物。

聂鲁达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世界不少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一致公认聂鲁达对拉丁美洲诗坛有三大贡献：（1）与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一道，使拉丁美洲诗坛摆脱了现代主义后期的没落境地，开创了拉丁美洲诗坛欣欣向荣的新阶段；（2）开创了拉丁美洲政治诗歌的一代新风，并且以他的政治诗歌闻名于全世界；（3）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二十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2）《漫歌集》

《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伟大史诗。在这部宏伟的诗集中，这位代表着大自然的声音、来自智利南方林区的青年，在经受城市生活的磨练和政治斗争的洗礼之后，现在成了人类的代言人。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这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就其规模和深度来说，在拉丁美洲诗坛上是前无古人的。

《漫歌集》共分15章，共有248篇诗作。从美洲对人的召唤——第一章《大地上的灯》象征着人的潜意识——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即最后一章《我是》。其中包括对“征服者”的描述，对“解放者”的

颂扬，对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独裁者的谴责，对鞋匠、水手、渔夫、矿工、农民和民间诗人等劳苦大众的赞美，以及诗人的生平、愿望和理想。尤其是第二章《马楚·比楚之巔》和第九章《伐木者醒来吧》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马楚·比楚”在印第安土语中是“古老”的“金字塔山丘”的意思，它是美洲原住民族印加人在秘鲁的古城的废墟。聂鲁达于1943年9月辞去墨西哥总领事之后，途径巴拿马、哥伦比亚和秘鲁回国。在秘鲁境内，他专程来到古印加山区旅行。他在回忆录《回首话沧桑》中这样写道：“我在秘鲁停留下来，来到马楚·比楚废墟。当时还没有公路，我们骑马来到这里，从高处眺望被安第斯山脉群峰包围着的古代石头建筑物。一团团白雾从维尔卡马河上袅袅升起，我觉得自己何等渺小，感到自己也曾在這裡挖过壕沟，凿过石头。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那难以到达的山巔上，在那光荣和分散的废墟间，我发现了必须继续写诗的信条。我的诗《马楚·比楚之巔》就诞生在那里。”

在西方，《马楚·比楚之巔》这首近500行的长诗，被认为是聂鲁达诗作的最高峰。在这首诗中，作者不仅回顾了历史的足迹，讴歌了美洲的风光，赞美了人民的品德，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从一个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发展成为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的过程，全诗分为12节，描写坠入深渊的“我”又登上马楚·比楚之巔。这是一次“寻根”的旅行，表明了诗人对这座古城的无名建筑者们的崇敬之情。诗中写道：

于是我攀登大地的阶梯，
在茫茫无边的林海中间，
来到你——马楚·比楚面前。
垒石的高城，你深藏奥秘，
你是前人最后的一座城。
他们虽然已经长眠，
但他们的寝衣
并没把大地的面目遮掩。
那里，闪电和人的摇篮忽隐忽现，
犹如两道耀眼的平行线。

.....
这是昔日的住所，这就是那个地方：
饱满的玉米挺立着
然后又落下，像红色的冰雹一样。

.....
兄弟啊，起来同我一同诞生。

.....
我来通过你们死了的嘴发言。
通过大地，请把所有
破碎沉默的嘴唇连成一片，
从地下向我讲吧，在这整个漫长的夜晚，
就像我和你们一起抛下了锚，
向我诉说一切吧，一链接一链，
一环接一环，一步跟一步，

.....
《漫歌集》的第九章《伐木者醒来吧》也是一首内容广泛、感情真挚、气势磅礴的长诗。诗中写道：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在我所爱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那里逮捕矿工，
军人向法官发布命令。
但是我热爱我小小的寒冷的国家，
哪怕是它的一条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要死在那里，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要生在那里，

.....
《漫歌集》所展示的历史画卷是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在这部诗集中，宏观和微观世界都遵循着同一个进化和发展规律：暴政和阶级压迫毁灭了人和大地，阻碍着真正的繁荣。

在聂鲁达创作《漫歌集》时，他与先锋派诗人已经分道扬镳，他考虑了普通读者。当他创作《漫歌集》时，不时到政治集会上去朗读集子里的某些诗篇。他的诗使工人们无比感动，甚至有人呜咽着哭了起来。在墨西哥，他与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论战时曾说：“在这充满威胁的日子里，凡是不为自由服务的创作都是背叛。”的确，《漫歌集》是一部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作品。

六、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绝望》

(1)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智利最杰出的女诗人、教育家和记者,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她那富于强烈情感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她一生主要发表了四部诗集:《绝望》、《柔情》、《塔拉》和《葡萄压榨机》。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原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6日(一说为7日)出生于智利北部埃尔基山谷的小镇维库尼亚(诗人曾称这里为“芬芳的土地”)。1901年以前,她在小镇周围肥沃的土地上,在田野的山丘上度过了童年。那里的山泉溪水滋润了诗人的心田,那里的鸟语花香给了诗人灵感,那“芬芳的土地”培养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出生在一个农村小学教师的家庭里。她父亲虽然是小学教师,能写几笔应酬诗,但在她三岁时他就离家出走了。她没有从父亲那里、也没有从任何学校接受点燃智慧之光的火种,这火种主要来自她刚强的性格。她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主要来自耳闻目睹、刻苦钻研和博览群书。唯一的同父异母姐姐埃梅丽娜也是小学教师,比她年长13岁,倒是她童年时期真正的良师益友。被她称为“书中之书”的《圣经》可能是她最重要的启蒙课本。但丁、泰戈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普希金、契诃夫、罗曼·罗兰、马蒂、乌纳穆诺、卢文·达里奥等文学巨匠都是她的老师,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意大利诗人卡夫列拉·邓南遮的姓名合在一起成了她的笔名。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从小就表现出诗歌方面的天才,9岁时就能即兴赋诗,使听众惊得目瞪口呆。1905年时,家庭的经济负担落在她的肩上,她开始在山村小学做助理教师。后来又在拉坎特拉附近的另一所学校做同样的工作,一直到1907年。那时她是个身材修长、苗条、白净的姑娘,头发浅黄、眉清目秀,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的手与农民的手毫无相似之处,有人将她比作百合花。她辛辛苦苦地工作,得到的却是校长和村民们的奚落和嘲讽。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使卢西拉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并在她的心灵中播下神秘主义的种子。

1909年,当她只有20岁的时候,便在省内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1910年,她在速成训练班中取得特别证书,于是从助理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后来又从小学转到中学,并先后在蓬塔·阿雷纳斯、特木科和圣地亚哥等城市担任过中学校长的职务。在特木科,她对智利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产生过重大影响。

1914年,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参加了在智利首都举行的“花奖赛诗会”,以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荣获最高奖:一朵纳杜拉尔鲜花、桂冠和金质奖章。然而获奖者没有上台去领奖,因为胆怯,她只是躲在观众席间观看典礼的进行。但她从此沿着荣誉和玫瑰花铺成的道路青云直上。1922年她应墨西哥政府的邀请并受智利政府的委托,前往美丽的“仙人掌之国”去帮助实施教育改革。同年,应在纽约的朋友之美意她把自己的作品汇编成册,在纽约的西班牙研究院出版了她的《绝望》集,并一举成名。两年后,她完成了在墨西哥的使命,前往美国和欧洲旅行,在马德里发表了《柔情》集,其

中大部分诗作是《绝望》集中抽出来的，也有少量是未发表过的。

1925年2月，当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回到祖国时，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整个社会的盛大欢迎，两年前，智利大学曾授予她一个相当于硕士学位，即西班牙语专业“国家级教师”。之所以没授予她博士学位，是因为当时有关系科没有这种学衔。现在，当她回国时，政府也不甘落后，让她以最高退休金退休，以表示对她的作品的敬意。政府任命她为智利驻“各国智力合作联盟研究院”的代表，1926年初，她再次以官方大使身分出国。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除了旅游之外，她曾多次以外交官的身分到过许多欧美国家。如同卢文·达里奥等许多西班牙语美洲诗人一样，她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其它伟大的女诗人更具有民族性。应该注意到，这与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语有关。她的卡斯蒂里亚语不是智利的，不是卡斯蒂里亚的，也不是美洲的。那是各种各样的泉水在河床上所冲积的沉淀物，那些泉源包括人物、书籍、韵味、理论。那是“她本人的卡斯蒂里亚语”。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不少作品带有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色彩，这在她早期作品中就已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往往是朦胧、晦涩，使人难以理解，就像在宝石上蒙上一层灰尘，使它失去本来应有的光辉。（2）《绝望》集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那本以《绝望》命名的诗集。她的其余诗作、报刊文章、教材课本都在其次。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爱情诗是痛苦和不幸的爱情产物。这些作品大都收在《绝望》集里。为了理解她的爱情诗，我们不能不谈一下她的爱情悲剧，这对于她的诗歌创作和生活道路都是至关重要的。1906年，她到拉坎特拉小学去教书，认识了一个名叫罗梅里奥·乌雷塔的铁路职员，彼此产生了炽烈的爱情。后来第三者插足，小伙子疏远了山村的小学教师，这深深地刺伤了她那颗幼年时就早已受到冷遇的少年的心。卢西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09年底，乌雷塔为了顾全体面而开枪自杀。除了爱情纠葛，死者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得而知，但当他在卢西拉的邻村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时，衣袋里装着女诗人的明信片，这却是事实。这使她痛苦、怨恨、怀念和内疚，长达十年之久。这种复杂的心情正是《绝望》集灵感之源。

在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这部作品中，人们很难将诗人的想象和她的切身经历加以区别，因为无论是想象或者是经历都是诗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是诗人心灵真正和唯一的肌体。她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像一座白雪皑皑的火山。一旦它打破了沉默，沸腾的岩浆便会毫无顾忌地喷发出来，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大自然中的火山不同的是，当她内心的火山爆发时，不是使人望而生畏，而是催人泪下，并给人一种艺术的魅力和享受。

初恋使年轻的姑娘又惊又喜，她似乎闯进一个美妙的世界，那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

自从你和我许下终身，
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当我们靠着一棵带刺的树木，
相对无言，彼此倾心。
爱情啊，就像树上的刺儿一样，
将我们穿在一起，用它的芬芳！

爱情并不总像春天里的晴空一样明朗，并不总像玫瑰花一样迷人。自卑而又痴情的乡村女教师，在惊喜之余又忐忑不安：

从前我是乞丐，今天成了女王，
只怕你将我抛弃，终日心里发慌。

因此我面色苍白，时时在问你：

“还和我在一起吗？可别将我抛在一旁！”

在一对情人中间，第三者插足。小伙子见异思迁，疏远了年轻的姑娘：

他和别的姑娘在一起，

我看见了他们的身影。

风儿依然甜蜜，

路上一片平静。

可这双可怜的眼睛，

却看见了他们的身影。

年轻的卢西拉和恋人决裂，然而她心中的爱情之花并没有凋谢，它变成了渴望，变成了烈火，变成了痛苦、怨恨和诅咒，而怨恨和诅咒正是爱的回声：

大地会冒出毒蛇，

如果你出卖我的灵魂。

我要打碎痛苦的膝盖，

反正不再有子孙。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行走，

上帝会叫你失去阳光；

也会叫你没有水饮，

如果水中不映着我的影子；

.....

如果你走了并死在远方，

要在地下等我十年，

把手捧得像瓢儿一样，

好让我的泪水流在里边。

1909年11月的一天，罗梅里奥·乌雷塔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她悲哀、绝望、怨恨、愧悔，有时甚至到了语无伦次、想入非非的地步。这时她的激情像山洪一样汹涌澎湃，汇成了那三首使她成名的《死的十四行诗》：

人们将你放在冰冷的壁龛里，

我将你迁回纯朴明亮的大地。

他们不知道我也要在那里安息，

和你共枕同眠梦在一起。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

像母亲照顾酣睡的婴儿那样甜蜜。

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

好将你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在蓝色朦胧的月光里，

我将用灰土和玫瑰花的细雨

遮盖住你轻盈的遗体。

情人已经离开人世，然而她的情感却没有枯竭。从此开始了她那漫长的

“绝望”的单相思。她认为自己的诅咒是情人自杀的根源，于是便怀着无限的深情为他向上帝祈求：

主啊，你知道我在怎样地向你祈求，
为了陌生人，我的热情都像烈火一样，
可如今是为了心上人，
他是我清凉的甘露，可口的香糖。
他是我骨骼中的钙质，生活中的目的，
衣裙上的丝带，耳旁的细语。

.....

原谅他吧，你终究会将它原谅！
你的话语在清风中散发百合花的芳香。
水面上会闪耀绚丽的异彩，
荒漠将开出鲜花，卵石将放出光芒。

时光的流逝，远离家乡的旅行和繁忙的工作使她的心绪渐渐平静，然而心头那一缕缕情思却依然藕断丝连：

当你微笑时是什么模样？
当你爱我时是什么形象？
你的眼睛还有灵魂，
它们放射出什么样的光芒？
我搜索枯肠将你寻找，
撕肝裂胆却没有找到，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可怜，
连记忆中的你也已经失掉！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爱情诗大都是青年时代的作品，是她爱情悲剧的高度概括和表现。它是诗人无法抑制的激情的爆发，是她难以平静的心声的转化。它的表达几乎是用不着想象的：“这是诗，而不是匠人的艺术”。这正是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爱情诗的最大特色。

第四章 民俗文化散记 文明之谜探奇

南美是一块风情万般的大陆。在这里，传统节日流光溢彩：光怪陆离的巴西狂欢节、庄严肃穆的库斯科太阳节、灯光辉煌的圭亚那灯节、汇集各国风情的智利移民节……舞蹈苑中百花齐放：桑巴的奔放、探戈的优雅，还有那温情脉脉、妙趣横的奎卡舞……令人心醉神迷；如果有雅兴，可去秘鲁街头吃上几串牛心串，可去阿根廷品阿萨多，也可去哥伦比亚品尝无比独特的烤蚂蚁，定会令你大饱口福。此外，还有摔牛和赛马、足球和选美……无不牵动人心……

南美的民俗文化又是一个万花筒，印第安文化、欧洲文化、亚洲东方文化和黑人文化的大融合，便造就了它的绚丽多彩。

一、桑巴的国度 巴西民俗文化

(1) 狂欢节 牺牲节 基隆博节

狂欢节 说到巴西，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它那奔放不羁的狂欢节来，这个魅力无穷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四月斋戒节”前一周的星期六开始举行，持续三天一夜。这期间，整个巴西都沉浸在一片狂热和欢乐之中。让我们到素有“狂欢之都”的里约热内卢去领略那里的节日气氛吧！

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隆重、热闹，在巴西可算是首屈一指。节日来临时，全城张灯结彩，装饰一新，宛如一艘漂浮在海洋上豪华的大客轮。狂欢节仪式由一位戴鬼脸面具的“国王”主持，上午九时许，他从里约热内卢市长手中接过市府钥匙后高声宣布：“狂欢节开始了！”顿时，锣鼓声四起，阵阵袭人；桑巴舞曲，此起彼伏，整个城市成了一片欢呼声和鼓乐声的海洋。仪式的主要内容是桑巴舞学校的列队游行，走在队伍最前列是一位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美女——狂欢节皇后，她站在富丽华贵的彩车上，身着白色长裙，袒胸露臂，手持鲜花，笑容可掬，频频地向观众飞吻致意，而街道两旁的群众则不断报以掌声和狂呼。跟在皇后后面的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公主”们，在音乐声中，她们翩翩起舞，绰约如仙子。走在“公主”们后面的是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姗姗而行，有的头戴面具，扮作牛头马面的妖魔鬼怪；有的则化妆成各路神仙；有的充当善男信女，也有的扮成古今的名流显要，光怪陆离，应有尽有，充分体现了巴西人无穷的想象力。在游行队伍中，最受观众青睐的无疑是那些国色天香的少女们，她们头戴桂冠，插上彩色的羽毛，额头系上银片丝带，足腕套着铃铛银圈，个个妖冶娉婷，风姿不凡。在桑巴舞曲声中，她们展动腰肢、扭动腹臀，引起人们阵阵喝采。男人们则踩着高跷，越跳越狂。这样，多达万人的游行队伍成了一曲流动的歌舞。入夜彩灯高挂，狂欢节也就达到了高潮，人们如痴如狂，载歌载舞，里约热内卢火树银花，形同白昼。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游行队伍恰似一条色彩斑斓的洪流；而欢呼声、鼓乐声、号角声、汽车喇叭声汇成了一首震天撼地狂欢曲。除了集体游行外，群众性的狂欢则又不拘于地点和形式，里约热内卢的所有街道、海滩、港口、广场上都挤满了化过妆的人群，他们带着乐器结帮搭伙，自行组织成狂欢群，上至七旬老翁，下至几岁孩童，人人都边走边唱，边唱边舞，歌不停，舞不断。狂欢节期间，人们都似乎进入了天堂，哪管世间半点愁！

狂欢节并非巴西的特产，那么它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它本是一个天主教节日，一般称作“嘉华年会”（拉丁文中是“斋戒”之意），“狂欢节”为意译。狂欢节与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一些节日，如农神节、牧神节、酒神节等在仪式上有相似之处，在这些节日里，由于人们暴饮暴食、狂吹作乐，一度曾被取缔；中世纪时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又流行起了泼水节。后来在这些古老节日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狂欢节。巴西的狂欢节便是由葡萄牙人传入的，经过1641年、1855年和1906年的几个发展高峰，它终于风靡了全巴西，至今不衰，巴西也因此获得了“狂欢节之乡”的美称。当然在今天，这个节日的宗教色彩日益淡薄了。

巴西狂欢节的鲜明特点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融合，同时具有欧洲、非洲和印第安色彩。其中黑奴和印第安人对它的贡献很大，他们饱受剥削和压迫，往往便在忘我的狂欢中来宣泄痛苦，逃避现实而求得到解脱，这样就

使巴西狂欢节狂和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今天，狂欢节除了带来无比的欢乐，也为人们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节日期间，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还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会将自己遭逢际遇的无比艰辛和对现实的深深不满发泄出来，以求得到内心的平衡。

当然，节日的过度狂欢也带来了不少弊端。狂欢节过后，大街小巷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而在酗酒闹事、抢劫斗殴和车祸中丧生的人数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不少境况并不宽裕的家庭，在几日的吃喝玩乐中耗尽积蓄，只留下累累债务和无尽的空虚，对他们来说，真可谓狂欢过后，又添一段新愁。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南美不少国家已取消了狂欢节，或者将其淡化；巴西政府也曾试图限制和缩小这一传统节日的规模，然而收效甚微，因为狂欢节已与巴西民众的心理紧紧联系在一起；此外，节日期间外国观光者络绎不绝，不尽财源滚滚来，上千万美元的外汇收入成了巴西狂欢节愈来愈狂热的经济根源。

牺牲节 牺牲节又叫穿耳节，是沙万特人的传统节日。沙万特人是巴西最大的印第安部落，他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在这个部落中，盛行着一种类似斯巴达式的苦行僧教育：青年男子在12—18岁期间，必须远离氏族部落，到一处特定的营地开始过集体生活。在随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们要接受特殊教育和训练：熟悉传统的风俗习惯；了解祖先抗敌卫族的英雄事迹；向经验丰富的前辈学习生产技能；操练各种作战本领。在营地中，青年们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亲近任何女色（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姐妹），也不得随意离开，只有当父亲前来召唤或集体返乡时才能例外。五年的训练结束时，牺牲节也就来到了。

牺牲节实际上是对青年们训练的一个合格检验。确定好节日的日期后，全部部落的人都在酋长的领导下开始大量的准备工作，如采集野果、追捕猎物以供丰盛宴席之用；收集艳丽的羽毛以用来装饰节日的楼阁。准备停当以后，青年们也就从营地返回村社，他们面临的第一场考验便是站在深水河泊中，双手按节拍不停地击打水花，这样一连十天十夜，除吃饭外，不得擅离片刻。第二场教育是穿耳。青年们上岸后，便坐在村舍前的席子上，老战士则拿起用雪豹腿骨特制的针为他们逐一穿孔，随后再将一根二寸多长的耳棍插进去。第三场是耐力的考验。青年们穿过耳一天后，便从他们父亲手中接过大圆木棍到村中广场集合，在这里每人要抱着一段用雄鹿爪装饰好的树干唱歌跳舞，一连十八个小时。最后一场是艰难的远足。跳舞结束后，青年们每人要扛上一段棕榈树干步行20公里，路上不得互相攀谈，更不能流露出任何疲劳和痛苦的表情。经过以上四场考验，青年们最后集中到广场上唱一整天祖先留下来的、永远也唱不完的歌，酋长则授予他们“新战士”的称号，并祝福他们的成年。这样节日也就随之结束，新战士们必须回到原来的营地，等到7月瓜果飘香的时节方能回到部落村社。此后，他们便可以结婚，另立门户而独自谋生；也可以迁居他乡，另辟天下，但节日期间插上的耳棍和父辈授予的大圆木棒始终是他们一生引以为荣的纪念物。

牺牲节磨练了人们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的品质，这便是沙万特部落长盛不衰的原因。

基隆博节 基隆博节是与巴西一段反抗种族压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十七世纪，大批的非洲黑奴被贩卖到巴西，他们在奴隶主的种植园里遭受着

非人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不堪忍受奴役和死亡威胁的黑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纷纷逃往无人烟的丛林中去，在那里建立起了居所，称作基隆博。然而殖民者是不愿接受任何损失的，他们组织猎奴队在森林中大肆搜捕逃奴，凡被捉到的基隆博黑人脸上都要烙上一个“F”字（即Fugido，逃亡者之意），若再逃亡则要被割掉耳朵。为了生存，黑人们必须组织起来，在领袖干加宗巴的领导下，他们终于建立了一个面积400平方公里、人口2万多的“帕尔马雷斯王国”。“帕尔马雷斯”在葡萄牙语里是棕榈林的意思。在这里，黑人们按照非洲的传统风俗建立起村寨和城堡，过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始部落生活。他们还与邻近的印第安部落结成联盟，并与印第安人通婚。这样，“棕榈林王国”成了逃奴们的世外桃源。葡萄牙殖民当局多次派兵前来镇压，却屡战屡败。黑人的斗争坚持了几十年，但铁矛弓箭终究敌不过长枪炮弹，帕尔马雷斯王国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国王松比和他的战士们宁死不屈，跳下万丈悬崖，以死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英雄们的气概为巴西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纪念这一段伟大的历史，每年金秋之际人们都兴建基隆博来展开纪念活动，后来这种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巴西中部和东北部的传统节日。

基隆博节日期间，人们在村社和城市中心广场上用棕榈树枝和芭蕉叶搭成一座堡垒，堡垒外面挂满了无数小旗和串串水果，里面则设有用树枝编成的两个宝座。国王身穿白衣、肩披蓝色斗篷，坐在其中一个宝座上，他周围簇拥着载歌载舞的人群。突然，战斗号角声起，顿时歌停舞罢，人们立刻四散奔跑，用巧妙手段偷来许多家畜带到堡垒里来。随后便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买卖牲口活动，人们讨价还价，热闹非凡。接下来“国王”在一群黑人的簇拥下开始寻找“公主”，她是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小姑娘，人们用歌声把她迎到空着的宝座上，此时歌舞又起。中午十二时左右，人群中突然出现了头戴羽毛风帽、身负弓箭的敌人，战斗顿时开始。在“国王”的领导下，黑人们团结一致，奋勇抗敌，只听见杀声四起、刀枪棍棒在空中飞舞。经过一阵“生死搏斗”，英勇的黑人终于击溃了敌人和他们的援兵。胜利后的人们无比喜悦，他们捧出醇酒甘果，杀猪屠羊，在欢乐的歌舞声中开怀畅饮，整个节日亦告结束。

（2）桑巴舞足球圆木接力赛

桑巴舞 在巴西，人们认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桑巴舞不跳却不行，由此可见巴西人对这一舞蹈是何等的钟情。

桑巴舞起源于非洲，在殖民时代的运奴船上，奴隶贩子为了使黑人体格健壮以便能卖个好价钱，就强迫他们在甲板上以敲打酒桶和铁锅为伴奏，跳非洲的原始舞。这便是桑巴的最早形式。到了巴西后，黑人舞蹈博采众家之长，经过漫长岁月的雕琢，终于发展成为今天的桑巴舞。现代桑巴是一种集体性的交谊舞蹈，参加者少则几十，多达几万。队形有时排成双行，有时则围成一圈，圈子中央有人单独演奏。桑巴多以打击乐伴奏，旋律欢快紧张，节奏感很强。舞者脚踩乐点一重一轻，自然屈膝弹动，上身摇曳生姿，构成全身松弛、节奏强烈的意境。男舞以两脚快速移动、旋转为主，女舞则以上身的抖动和腰、腹、臀部的扭动为主。即兴发挥也为桑巴增色不少，有时舞伴故意绊倒对方，被绊者却又轻松自如地站起来，继续尽兴。

桑巴舞已经渗透到了巴西人的血液之中。目前，巴西国内有不少桑巴舞学校，仅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学生就多达万人。1984年，政府专门兴建

了一处规模宏大、永久性的桑巴比赛场所，更说明了它的影响之大。

桑巴舞与狂欢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每年狂欢节的主要内容便是桑巴舞俱乐部的比赛和表演。这种比赛由旅游部门组织，分成四个不同的等级来争夺冠军。为了能够一鸣惊人、摘取桂冠，俱乐部一般提前半年就开始了精心的准备。这样，狂欢节推动了桑巴舞的发展，而桑巴舞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净化和文化艺术的创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足球 巴西素有“足球王国”的美称，在这里，足球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而且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巴西足球体现了典型的南美风格：脚法细腻、配合默契、能攻善守、赏心悦目，队员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过人盘带，果断准确的射门意识无不令人拍案叫绝。人们将巴西足球称为“足坛桑巴”，它那高超的球技征服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球迷的心。巴西国家队是一支战绩辉煌、功勋卓越的球队。1994年7月，在美国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上，巴西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击败意大利队后第四次登上了冠军的宝座，巴西人扬眉吐气，举国狂欢，而巴西队则成了世界上第一支四次捧杯的队伍。巴西队历来人才济济、球星辈出，贝利、加林查、苏格拉底、法尔考等各领风骚一时，在国际大赛上闪闪发光，其中贝利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球星，他参加过与八十八个国家的正式比赛，共踢进了一千二百多个球，并为巴西三次夺得世界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绿茵场的记忆之中。当然，巴西队也并不总是吉星高照的，它也倍尝了曲折和心酸。如1950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杯赛决赛中，红极一时的巴西队与巴拉圭队对阵。无数巴西球迷认为自己球队夺冠是十拿九稳的，于是就准备了大量的烟花爆竹，只等捷报传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巴西队竟折戟沙场！顿时球场上响起了一片哭声，举国上下黯然神伤，事先预备的欢庆物品成车成车地倒入海中……

在巴西，足球绝不只是少数人的运动，而成了一种大众爱好。从十九世纪末足球由欧洲传入至今，巴西国内俱乐部星罗棋布。在体育联合会登记注册的就有一二万，会员多达一百万人。在城镇的街头，在广阔的海滩，在林中空地，到处都能看见青少年汗流浹背踢足球的场面。假日里就更热闹了，孩子们将街道变成了球场，致使车辆也不得为他们让路。此外，巴西球迷的狂热也是举世无双的，哪里有比赛哪里就有他们，即使遇上滂沱大雨也奈何不了他们的热情。赛场的看台上，旌旗招展，喊声冲天，球队双方的啦啦队非常庞大，往往多达万人。每当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得分时，全场鼓乐齐鸣、彩纸满天、掌声不断，而对方的啦啦队则以乱吹口哨和怪声喊叫来发泄不满。另外，球迷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

巴西足球运动为电影提供了独特的题材。据统计，从1909年巴西电影界首开拍摄足球片先河以来至今，有关足球运动的故事片和大型纪录片多达六十部，为全球之冠，其中《冠军》、《决定胜利的球》和《胜利的代价》等影片走出了巴西国门，深受世界人民喜爱。

圆木接力赛 在巴西中部的热带大草原深处，有一个形似车轮状的村落，这里住着克拉霍族印第安人。每逢节日或是捕猎归来，克拉霍人总要举行自己的传统娱乐活动——圆木接力赛。

圆木接力赛是与狩猎生活分不开的。克拉霍人经常携带妻子儿女长途跋涉、成群结队地去远方打猎，他们打猎的方式也很独特，常常是在丛林间追逐鹿、野猪等，直至被迫的猎物筋疲力竭，只好束手待毙为止。最后，人们

将猎物的肉用烟熏火烤后平分，每人均得一份。分配完毕后，按照古老的习俗，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开始返家。走到离村落还有一英里的地方，队伍停了下来，圆木接力赛随之开始。这时，青年人从棕榈树上砍下两段圆木，并排放在地上，猎人们则成两队分别靠近一段圆木。只听一声令下，每队中闪出一人来打起木头，向村落飞奔而去，所有的青年和男孩则一窝蜂似的跑在他们后面加油助威。当扛木者感到疲劳时，立刻有人接过圆木继续前进，所有参加接力赛的人都以赶超他人的次数越多为荣耀。很快村子到了，但选手们还不能停下来，他们必须要环绕着沙质林荫道逆时针奔跑，这时全村的中年妇女和孩子们都站在门口观赏，春情萌动的姑娘们则从窗口偷偷观望，也许，她们在这些英姿英发的参赛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选手们不断地奔跑，直到获胜的一队最后把圆木掷在一位未婚青年女子家门口为止。这位女子便成了该队的庇护人，而汗流浹背的参赛者则到村旁的小溪中洗去一路的辛劳。圆木接力赛随之即告结束。

接力赛用的圆木重量不等，一般在 10—90 公斤之间，少年参赛者年龄为 12—15 岁，成年人则不能超过 35 岁。妇女们有时也参加比赛，不过她们扛的木头是空心的，重量不超过 10 公斤。圆木接力赛实际上就成了克拉霍人的全民健身活动。这一传统赛事是如何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太阳普德和月亮普德莱尔原本是关系很好的两个男子，每天清晨，他们各自外出打猎捕鱼，傍晚在大草原上会合。会合后他们便把猎物放在篮内，然后砍下两根圆木扛起来赛跑回家。路上两人互相鼓励却谁也不肯落后，直到把木头扛回家中，比赛结束后，他们再返到原地取回篮子。克拉霍人认为普德和普德莱尔是地球上最初的人类，是他们的祖先，于是就继承了圆木接力赛这一传统并延续至今。

圆木接力赛给克拉霍人勇气和力量，也给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3）烤肉 硬咖啡 瓜那拉 马黛茶

烤肉 去过巴西的朋友一定忘不了那里的一道名菜——烤肉。巴西烤肉种类繁多，有烤牛肉、烤鸡心、烤鸡腿、烤牛腿、烤里脊、烤排骨等，不一而足。具体烤法大致如下：先将肉穿在大小粗细各异的烤杆上，然后再将烤杆放在烧有炭火的壁炉平台上，接着便是一边烤，一边在肉上撒放一些食盐，直至肉熟为止。这样烤出来的肉，外焦里嫩，香而不腻，熟而不老，而且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类和火候也就有了不同的风味，有的像火腿一样坚实，也有的松软柔韧，但它们无不香气四溢，令人心醉。

若要吃最有名的烤肉，就不防到南里约格朗德州去。南里约格朗德是巴西重要的畜牧业区，这里的烤肉历史悠久，烤肉师傅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全巴西比较讲究的烤肉店都与这里有联系，随处可见的“南里约风味”标牌更能说明其知名度。此外，南里约人制作的精美腰刀，是最理想的剔肉工具，人们往往用它来作馈赠贵宾的佳品。

好了，介绍了这么多，该请读者朋友去品尝一下烤肉的风味了。走进餐厅，笑容满面的服务员一手拿着铁杆，穿着烤好的肉，另一手则拿着闪亮的利刀，款款地来到你身旁，你按自己的意愿选好部位后，他便为你切成厚薄不等的肉片，然后撒上配好的佐料。这时你便可以大饱口福了，而且这烤肉余味不绝，定会令你三月不忘！

当然，现在巴西烤肉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一种大众菜。许多巴西人

家中都有烤炉，他们最爱吃的一种肉叫做“比卡纳”，这种质地细嫩的烤肉含脂肪很少，用刀一切，往往还渗着血丝，可口至极。

硬咖啡 巴西是举世闻名的“咖啡王国”，土壤肥沃、气候湿润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人民的辛勤劳作，使巴西咖啡产量和出口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如果认为巴西是咖啡的故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原来咖啡起源于非洲，相传公元900年间，埃塞俄比亚卡法地区的一位老牧羊人在山坡上放羊时，突然发现羊群乱蹦乱跳、异常兴奋。老人走近仔细一看，原来羊吃了一种不知名的果实，奇怪之余，他也吃下几颗，结果自己也手舞足蹈起来。这果实便是咖啡。十七世纪时，咖啡传入欧洲大陆种植，后来法国殖民者又把它带到南美圭亚那落户生根。

咖啡又是怎样从圭亚那传入巴西的呢？这还是一个传奇故事。1727年5月一个由弗朗西斯科·巴雷塔率领的巴西外交使团以中立者的身分，来到法属圭亚那调解法国、荷兰属地的边境争端。法属圭亚那总督为了防止咖啡种子外流，事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使怀有此意的巴雷塔始终无法染指。偶然之中他了解到总督夫人生性好虚荣，于是便对她极尽阿谀奉承。很快，总督夫人就视巴雷塔为挚友，邀请他到总督府上并以咖啡相待。巴雷塔对咖啡赞不绝口，总督夫人满口答应了他提出的参观咖啡园的要求。在参观过程中，巴雷塔用重金购买了千余颗咖啡种子和五株树苗，并于当天就运回了巴西。正是这些种子和幼苗的繁衍，在巴西创造了一个“咖啡王国”的神话。

巴西还是全球最大的咖啡消费国。人们喜欢喝又浓又杂的“硬咖啡”，城市的街头巷尾，咖啡摊比比皆是；银行、旅行社、航空公司等机关免费供应，寻常百姓家喝咖啡也成习惯。此外，咖啡不仅是一种普通饮料，还是待客时宾主相敬的礼仪标志。有客来访时，主人总是献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以示欢迎，而客人则必须喝它以示尊重。如果登堂入室，主人连一杯咖啡都不赐予的话，还不如及早告辞，因为你是受欢迎的。看来，这种方式比我们中国的端茶送客要直接得多。

瓜拉那 瓜拉那树是巴西亚马孙地区一种特有的热带灌木，高1—2米，叶子椭圆，花呈黄色。它的果实叫做瓜拉那果，富含咖啡因、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具有极高的营养和医疗价值，人们把它称为“青春果”。将这种果实烘干后磨成粉，再配以一定比例的果汁和糖，就制成了独特的瓜拉那饮料。瓜拉那饮料能够解渴生津，健神补脑，并有抗容颜衰老之功效，深受人们欢迎。

关于瓜拉那的来历，还有一个令人哀婉的传说故事呢。很久以前，亚马孙地区的毛乌埃印第安人中有一位受雅西美神保护的绝代佳人：塞拉萨兰加，她深受部落男女老幼的爱戴。后来她爱上了一名敌对部落的勇士并与其出逃，不幸却被抓回，毛乌埃人决定将勇士处死。塞拉萨兰加冒死救出了她的情人，二人再次逃走并在一棵大树下双双殉情自尽。人们无比悲哀，祈求雅西美神让她的灵魂永存。雅西美神为这忠贞的爱情和人们的虔诚所感动，施用魔法在姑娘的眼睛里长出一可树，结出的果实犹如塞拉萨兰加那两颗炯炯有神的大眼珠，这就是瓜拉那果。近十几年来，巴西的人工种植大大增加了它的产量，政府严禁瓜拉那种子出口，并在每年十一月举办“瓜拉那节”以推动生产。如今，巴西是世界上唯一的瓜拉那生产和出口国，日本、欧美等国争相购买这种新型饮料，或许有一天，它会成为可口可乐的强劲竞争对手。

马黛茶 马黛茶是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高乔人的一种常备饮料，饮来

清香无比，能够清热解暑、消除疲劳。与瓜拉那一样，关于马黛茶的来历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传说天上有一位女神——月亮和彩云，她们在天宫寂寞孤清难耐，于是来到人间，在一处丛林中突遇凶猛的美洲虎，千钧一发之际，一支飞箭将老虎射死，原来是一位印第安老猎人搭救了她们。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二位女神便在老人的小屋周围种上无数开满白色小花的树，她们托梦给老人，教他如何采集和饮用。老人在其指点下，精心栽培和收获，并天天饮用，终于长生不老。

二、太阳的子孙——秘鲁风俗巡礼

(1) 太阳节 印加里节 特鲁希略节民俗节

与所有的文明古国一样，在印加文明的故乡——秘鲁，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的民间传统节日，如：

- 一月 在利马举行安康夏节
- 二月 在普诺举行圣烛节
- 三月在伊卡举行庙会节
- 四月和五月在全国举行基督圣体节
- 六月在库斯科举行太阳节
- 八月 举行阿雷其帕狂欢节
- 九月在特鲁希略举办春节
- 十月在利马举办斗牛和印加里节
- 十一月在普诺举行民俗节

一年中几乎所有的月份都有节日，我们就将其中最精彩，最有民族特色的太阳节、印加里节、特鲁希略节和民俗节向读者作一介绍。

太阳节 太阳节俗称因蒂·拉伊米节，是秘鲁最盛大的节日，它来源于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在秘鲁民间有不少关于太阳神的传说，相传在上古时代，印第安人以采集、狩猎为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艰辛无比。他们的勤劳深深打动了太阳神，于是他赐予人们金犁以开垦沉睡的大地；赐予种子以培育出金色的玉米。从此，印第安人把太阳神视作众神之首，认为人间赖以生存的万物都是他的恩赐，因而深深地崇拜他。正如一句秘鲁谚语所说：“别的民族崇拜各种不同的上帝，我们却敬奉永恒的太阳”。印加时代留下了许多太阳庙、太阳门、望日台和拴日桩，到了今天，人们对太阳的情感依然如初，他们赞誉自己的祖国为“太阳之国”，伟大诗人曼努埃尔·赖加达在《我的秘鲁》一诗中吟颂道：

我是个秘鲁人，
多么自豪多么幸福，
我生在美丽的太阳之国，
是多么幸福……

太阳节本是印第安人的节日，经数百年而不衰。1944年，秘鲁政府将它确立为全体人民的法定节日。

太阳节每年6月24日在库斯科举行，这一天正好是南半球的冬至之日。节日庆典场面宏大，祭坛由木板搭成，设在城北的萨克萨瓦曼古堡。清晨，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时，整个库斯科城便沸腾起来。人们身着节日盛装，带着献给太阳神的奶酪和果品，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涌向萨克萨瓦曼古堡，还有不少人沿着漫长的驰道从四面八方赶来。满山遍野人如潮水，万头攒动。中午一时许，在一片号角和欢呼声中，太阳祭典仪式正式开始了。由享有盛名的演员乔装的“印加王”和“王后”最先出现在山顶上，象征着太阳出现在空中。然后他们乘坐华盖金轿从高处拾级而下，前有带剑荷刀的武士开道，后有捧着各种圣器的“太阳贞女”相随。来到古堡前的广场，“国王”和“王后”先绕场一周以检阅他们的子民，然后登上宝座。此时太阳神主祭司和官方代表先后致词，以示祝贺，鼎沸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致词完毕后，乐队奏起圣歌，主祭司则点起祭坛圣火，分四处熊熊燃烧，这时“印加王”

登上祭坛，用克丘亚语向太阳神祈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万事如意。最后他端起一碗玉米酒，敬过神后以太阳之子的身分自饮，周围的群众则欢呼雀跃，祭典活动进入高潮。

下一个仪式是宰牲祭典。几名“宫廷信差”跑到山脚下的一个围栏里，选出一匹全身黑色的骆马来，推翻在地，缚住四蹄后抬到祭坛上，“印加王”则手持利刃，一刀砍下去并随手掏出其心肝。然后信差们又把“死去”的骆马抬到篝火边，不到片刻，那马突然跳起来跑开去。原来，这骆马是扮装的，牺牲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

祭典仪式之后是各种歌舞队表演，艺人们绕着广场载歌载舞。表演完毕后，“印加王”和“王后”坐在金轿上绕场一周，标志着整个仪式结束。此后的几日里主要是繁华的集市贸易和小型联欢。

印加里节 这是为纪念秘鲁民族英雄印加里而设的节日。印加里是库斯科一位英俊潇洒、能歌善舞的青年，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后，为了唤起同胞们的抗争，他吹响螺号游走四方。他那浑厚深沉的螺号声，诉说了印加人的亡国之痛、激起了人民的救国热情，而殖民者对此却十分恐惧，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印加里。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人们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这种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传统节日。

今天的印加里节在每年的10月举行，节日期间，印第安音乐在全国各地演奏，民间舞蹈也屡屡登台，印加里节实际上成了秘鲁民间艺术交流的盛会。

特鲁希略节 特鲁希略节，又称春节，每年九月的最后一天在妩媚旖旎的海滨城市特鲁希略举行。特鲁希略是奇穆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音乐人才辈出，这里的人民音乐鉴赏造诣很高，特鲁希略因此获得了“南美音乐城”的美称。节日期间，有化妆舞会，有民间舞蹈表演，也有各种手工艺品的展览。但最激动人心的无疑是节日的高潮——南美洲歌节晚会，来自南美各国的歌唱家荟萃一堂，同时登台即兴演出。他们优美的歌声令听众如醉如痴。晚会要评出歌王和歌后，演出结束后，他们乘上装饰华丽的彩车，在众多演员的簇拥下沿市区主要街道游行一周，以答谢观众们的情和热客。

民俗节 民俗节每年11月4日在普诺举行，这个颇有古风的传统节日是为印加王国的缔造者——曼科·卡帕克设立的。据神话传说，曼科·卡帕克诞生在的的喀喀湖畔。他先兴建了普诺城，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征服了整个库斯科谷地，创建了印加王国。为了纪念他，秘鲁政府创立了民俗节。节日期间，普诺城被装扮得古色古香，人们穿着古式服装，按照印加古国的风俗互相问候。节日的主题是缅怀和颂扬曼科·卡帕克，家长们要给孩子们讲述他的英雄故事，大街上、影院、剧场和娱乐中心也要演出文艺节目，用不同的艺术方式来颂扬他。

(2) 赛马和斗牛

在秘鲁，赛马一直是普通人民和新闻媒介关注的中心。这项历史悠久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赛马选手们头戴白色草帽，身披白色篷乔，十分别致。篷乔与斗篷和披肩相类似，通常是在一块方形的粗布中间开一个口，穿时将头套过去即可。选手们的坐骑多是用重金购来的，产自秘鲁伊卡、兰巴耶克和阿雷基帕地区的名贵骏马。每当参赛者骑着马出现在场上时，观众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欢呼，其盛况难于言表。传统的赛马项目是飞马夺鸡，赛场中央立着一道门，门楣

上倒悬着一只山鸡。选手们驰骋数圈后，便纵马向门冲去，谁能夺得山鸡谁便是最佳骑手。另外，别开生面的马舞也引人入胜。在驯养员有节奏的口令声中，马儿时而摇头摆尾，时而踏花碎步，还有横步、回旋、双蹄等高难动作，令人叫绝。

与赛马一样，斗牛也是秘鲁人的重要文化活动。首都利马是全国的斗牛中心，每年10—12月，全国的斗牛好手云集于此，各显奇技，一争高低。

尽管秘鲁的斗牛是从西班牙传入的，但它却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斗牛是人与牛斗，而秘鲁除了人与牛斗外，还有鹰、牛相斗。斗牛开始了，斗牛士先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然后他挥舞红布，以各种机敏灵巧的惊险动作，不断地引逗蛮牛。蛮牛怒不可遏，横冲直闯。当人牛相斗正酣时，人们便放出一只训练有素的安第斯山巨鹰，斗牛士悄然退场。这种巨鹰体长1米多，两翅展开可达6米，它伸出利爪，盘旋俯冲，直抓牛背。蛮牛横遭凌空袭击，负痛而逃，巨鹰则紧追不舍。当鹰牛搏成一团时，观众也随之亢奋到极点。最后蛮牛气绝倒地，斗牛活动也就结束了。

(3) 色味切 牛心串 土地赐食 聚会

秘鲁的饮食文化同样也是丰富多采的，它深受着印第安传统的影响。

在我国，马铃薯一般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然而它在秘鲁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却十分“显赫”，名列各类主食之首，上至国宾宴席，下至居家常菜，马铃薯总是离不了的。人们用它制成糕点、风味小吃和各种菜肴，品类多达数百，常见的有：炸土豆片、炸土豆条、烤土豆、咸味土豆泥、土豆色拉、土豆汤等，真构成了一个“土豆菜家族”。

秘鲁的海产资源十分丰富，鱼便成制作菜肴的又一主要原料。常见的鱼菜肴有：安蒂库乔、椒杯鱼块和皮克奥。安蒂库乔是一道风味名菜，它是把用辣味调料浸泡过的鱼块或鱼心串于铁签上，放在旺火上烤炙而成；椒杯鱼块是将鲜鱼骨填放在黄椒内，然后在铁锅上炒制而成；皮克奥则是以鲜海味为主的成套辣味菜。

总之，秘鲁的菜肴丰富多采，大致可以分成两大菜系：一是以利马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菜肴；二是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山区菜肴。沿海菜以辣为特色，主料为鱼、海味、鸡和马铃薯，做法多为凉拌和烧烤；而山区菜则以甜见长，主料为牛肉、马铃薯，做法多为炖、烩和煎等。

此外，秘鲁人还有豪饮的习惯。契契酒和皮斯科酒是其传统酒。契契酒是用玉米酿成的烈性酒，历来为山区人民所钟爱，沿海人则喜欢味美醇香的皮斯科酒。酒成了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与世界各地一样，秘鲁人中也不可少了那放歌纵酒的瘾君子。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色味切 闻名遐迩的色味切是印第安人留下来的传统佳肴，可称作是秘鲁各种名菜之首。戈尔维那鱼是制作这道菜的主要原料，其做法大致如下：将鱼骨取出后，把鱼肉切成指头大小的生鱼片，放到柠檬汁里浸泡1—2个小时，再拌进蒜泥，将鱼块盛入盘中，然后撒上雪白的洋葱细丝和鲜嫩的香菜，拌上一些青红辣椒和黑墨斗鱼丝，这样便大功合成。色味切做法虽然简单，但配料却十分考究，注重色香味俱全，因此也为初学者增加了不少困难。

色味切做好了，插起一块生鱼片送入口中，一股酸、辣、麻的滋味传遍全身，不可言喻。不仅可口，色味切还富含维生素，有预防和治疗伤风、感冒之功效，这也是人们十分喜爱它的原因之一。

牛心串 在秘鲁的街头巷尾、公园、影剧院门前，常常可以看到卖牛心串的小摊，火炉里面烈焰熊熊，火炉的铁架上则摆着一串串鲜牛心，印第安女主人扭动着粗壮的身躯熟练地翻动着它们，油滴掉进炉中，燃起碧绿的火苗，噼噼叭叭响个不停。微风吹过，香气四溢，实在是诱人不舍。这情景与我国的夜宵景观颇有許多相似，小贩们的辛劳为城市增添了几分美味和温馨。

土地赐食 “土地赐食”是印第安人克丘亚语的意译，它是秘鲁的一种传统食品。土地赐食来源于印第安人对土地的崇拜。他们把土地看作是神，认为它提供了食品人类才得以生存，于是印第安人就保持了一种野餐聚会的生活习俗以表敬意，这一习俗到今天已被众多的秘鲁人接受，土地赐食就是在这种野餐聚会中所享用的名食。

印第安人以往是用一种名叫“帕恰曼卡”的工具来制作土地赐食，帕恰曼卡在克丘亚语中是“大地上的锅”之意，有句谚语说明了这种工具应用之广泛：“凡有欢乐的印第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帕恰曼卡”。然而如今的土地赐食作法则有所不同：人们先将牛羊肉、猪肉、兔肉和鸡肉放到盐水里浸泡一天，然后拌上辣椒丁和玉米粉，并用玉米叶包好；野餐时便在地上挖一个坑，坑内燃起柴火，再在柴上铺上干净的鹅卵石；当鹅卵石被烧得通红时，便把用玉米叶包好的肉置于其上，再铺上芭蕉叶或干净的布；最后用泥土掩埋起来。这时一个个小土包冒着袅袅青烟，人们在吉它和小提琴的伴奏中翩翩起舞、纵情歌唱。两三个小时以后，埋在土中的食物被烫熟，土地赐食便做成功了。人们将它取出来，拌上各种佐料，分而食之，其味美妙无比。

聚饮会 聚饮会是秘鲁印第安坎帕人的传统习俗。坎帕人主要分布在秘鲁境内的亚马孙高原热带雨林地区，他们分散居住，与世隔绝。坎帕人的主要社会活动便是在庆祝播种、收获和狩猎归来时举行的聚饮会。聚饮会是在茅屋前举行的，坎帕人的茅屋散缀于青草绿林之中，与大自然构成和谐的整体。会前，男人们准备乐器、酒具和烟草，并忙于用“阿青特”（一种自制化妆品）来打扮自己；女人们则忙着准备酒食，但她们不能在聚饮会上露面。聚饮所用的酒被称作“马莎托”，它是由那些年龄较大且受人尊重的妇女酿制而成，具体做法是：将木薯煮熟、捣碎后放入挖空了的树筒中，再装上冷水发酵。这样制成的马莎托酒精含量约为2%—5%，深受男人们喜爱。聚饮会往往有40—50人参加，开始时全体男人依次围绕每个来宾走一圈，然后就用葫芦或竹筒盛起酒来开怀畅饮，还可品尝可可和烟草。歌舞不断、良宵美酒，人们欢乐无限。当然，每次聚饮会必定要消耗大量木薯，有的人家因此而用光了主粮，但这仍改变不了坎帕人豪饮的习俗。

三、探戈的故乡——阿根廷民俗文化一瞥

(1) 谢肉节 土地妈妈节 牛犊节

谢肉节 谢肉节是阿根廷北部山区的传统佳节，在每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开始举行，持续七天。节日期间，整个北部地区的乡村和城镇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谢肉节来源于一个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有一位国王名叫布亚伊，他威严无比却不幸被坏人暗害。由于死得冤屈，他的灵魂常出来作怪，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为了安抚他的灵魂，印第安人每年3月把他从坟墓中解放出来，以人间最好的酒食来款待他，痛痛快快地玩过7天后人们再将他埋葬。据说这样布亚伊魔王便会安分守己，不再作践人们。这就是谢肉节的由来，这个本是印第安人的传统节日，如今成了整个北部地区人民的普遍节日。

谢肉节的第一个仪式便是开掘仪式，即让在坟墓中受苦一年的布亚伊魔王重见天日。每个城市和村庄都有一处固定的地方举行开掘仪式。乡村的情形大致如此：清晨，全村的男女老幼聚在一起，他们在教父、教母的率领下向布亚伊魔王表示自己的虔诚，并献上食物、烟、葡萄酒等祭品；接着便是颇带神秘色彩的向魔王请愿，村民们选出十位代表来（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依次诉说自己的祝愿并提出一系列请求。请愿过后，人们象征性地从坟中掘起布亚伊魔王，这时鼓乐声起，礼炮齐鸣，谢肉节正式到来了。

此后，载歌载舞的人们在教父、教母的率领下开始列队游行，各村的队伍都从四面八方向本地区最大的中心广场走去。大约傍晚时分，队伍到达城内，早已被装饰一新的市镇彩带飘舞、张灯结彩，人们便在市中心唱起谢肉节之歌，歌词大意是：“谢肉节，谢肉节来临，星期六，我们和布亚伊王在一起；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将多么欢畅；到星期三，我们将把魔王埋葬！”这样从星期六到下周二，人们一直在歌舞中度过，街道两旁临时搭起了许多休息室，每天夜晚这里则举行通宵达旦的化妆舞会，节目都颇具印第安传统色彩。到了星期三，人们埋葬了布亚伊魔王，节日也就随之进入尾声，这时的庆祝活动有所变化，多为悼念和城乡居民互访。村民们自然地分成一个个小组，沿着大街小巷挨家逐户做客，主人则视此为莫大的荣幸，他们备出丰盛的食品招待客人，这样宾主相聚共度佳节，其乐融融。到了星期五，进城的人们陆续回到村子里去，谢肉节才算结束。

土地妈妈节 土地妈妈节是阿根廷图库曼山区克丘亚人的节日。在克丘亚人心中，土地妈妈是万能的上帝，是大自然美丽风景的化身，也是人们走向幸福之路的救星，每年一度的节日便是为了纪念土地妈妈而设的。不过到今天，土地妈妈节除了保留传统的印第安特色外，还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

土地妈妈节在每年的9月28日举行。清晨，从山林深处传来清脆欢快的歌声，山民们身着节日盛装，潮水般地走下山来，而山下克丘亚村寨里则洋溢一片喜气，人们备好了美食鲜果，等待着与山上的同胞共度节日美好时光。聚在一起后，女人们把花瓣贴在脸上和身上，男人们则装扮成各种怪物和神灵，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欢乐。当“土地妈妈”出现在人群中时，广场上一片肃静，无数虔诚的目光都凝望着她。“土地妈妈”是由一位老年妇女扮演的，她手中紧握着水、太阳、月亮和土地的象征物为人们祝福。祝福罢，她高声喊道：“孩子们，尽情地欢乐吧！”广场上顿时又沸腾

起来，人们异口同声地唱道：“土地妈妈，土地妈妈，帮帮我，给我幸福，给我快乐，保佑我，保佑我。”这样，节日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到了傍晚时，活动变为另一种形式：庄重、严肃而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未婚女子必须做长时间的祈祷，甚至通宵不眠；其余人则围在教士身旁聆听福音。

第二天下午，本地区的主教来到村庄，他手提纸做的灯笼，缓缓而行，而人们则紧随其后，低声吟唱起忧郁悲伤的歌曲。紧接着便是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圣体的仪式，这也是土地妈妈节中最庄严肃穆的时刻。一名身穿白衣、德高望重的村长爬上竖有钉着耶稣死难身躯十字架的山丘上，从那里将耶稣的身体挽救下来，再放入自由女神的怀抱之中。接下来便是全体村民列队的宗教游行，最后，节日在一片祈祷声中结束。

牛犊节及其它 牛犊节是阿根廷一个年轻的节日，它创立于1970年，以后每年4月初举行。节日期间，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亚库巧地区则又是牛犊节的庆祝中心，每年全国各地的农业团体都要派出代表团专程前来这里参加活动。节日里除了歌舞以外，还要举办传统的赛马，为身手不凡的骑手们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到晚上，两个可容纳7000人的娱乐大厅同时进行全国最优秀的民间艺术表演，这个美丽的夜晚也因此被称为“民族艺术精华之夜”。最后，为期两天的牛犊节以全国选美比赛的结束而告终。

阿根廷现代色彩浓厚的节日除了牛犊节外，还有葡萄节和苹果节。葡萄节始于1937年，由盛产葡萄的门多萨省举办，时间为2月23日至3月9日；苹果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时间为8月2日。在这两个节日里，人们都要举办丰富多采的文艺演出和绘画、雕刻等艺术展览。然而高潮无疑还是这期间在全国举办的选美比赛。经过各省的预选，美女们云集在节日的主办地，由人们评出其中最美者，她们便是当年的葡萄皇后或苹果皇后。

(2) 探戈鸭球

探戈 探戈是一种广为世人所喜爱的舞蹈，在故乡阿根廷，它享有“民族艺坛之花”的美称。

“探戈”是西班牙文TANGO的译音，它的基本舞步有三步、四步、五步和混合步等，难度较大；舞姿美观大方而又富于变化，往往令人眼花缭乱，具有较强的舞台效果。音乐是探戈的灵魂，小提琴的婉转、手风琴的忧伤、吉它的奔放、笛子的悠扬，无不为了探戈增添了幻想和浪漫的色彩。探戈舞曲节奏清新、优美动人，多为中速，旋律与伴奏常成交错节奏，此外那突出的切分音更是独具特色。

探戈风靡全球，然而今日的辉煌来自于百年的艰辛，它的发展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我们可以在西部非洲民间找到一种慢二拍的男女双人舞——探戈诺舞，这便是探戈的祖先。这种舞蹈由黑人传入阿根廷，为日后探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中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号船坞岸边的博卡亚，有一条名叫卡米尼的大街，街上的居民多为海民和搬运工人，小偷和妓女也常出没其间。这些人多为西欧移民的后裔和非洲黑人。夜幕降临时，人们常常在小酒店里聚会，聚会上有优美动人的意大利小夜曲；有流畅明快的古巴哈瓦那舞曲；有非洲奔放粗犷的原始舞曲；也有欧陆严肃高雅的古典音乐。这些外来音乐与在当地流行一时的黑人康敦贝舞曲相互融合，便形成了时而婉转悠扬，时而低沉忧郁的米隆加舞曲，这种表达

下层人民思想感情的舞曲就是探戈舞曲的雏形，探戈也就随之逐步形成。然而早期探戈是不甚讲究的：没有切分音，没有歌词（即使有人偶尔填出一些，也多是低级色情之作），演奏起来也十分随便，再加上它来源于下层社会，因此上层社会认为它是靡靡之音而大加反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劳动人民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倾入探戈舞中，使其得到了升华。切分音的出现和以经典诗作为题材，使探戈逐渐摆脱了轻佻的风格，很快，它那独特的舞步和变幻多姿的风采征服了无数人的心。它也不再为上流社会所鄙弃了，反而成了社交场所最为时髦的交际舞。

十九世纪末，阿根廷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人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四处迁徙，探戈也随之传至各地。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探戈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舞蹈和音乐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出现了一批职业性的探戈乐队，此外探戈作曲家们也星光灿烂，其中最受人们推崇的是卡洛斯·卡德利尔，他才华横溢，写了许多优美的探戈乐曲，并成功地将探戈舞曲发展成为歌曲，他是名副其实的“探戈之王”。

探戈在这个时期也被传播到欧洲，深受上层社会的赞赏和欢迎，它甚至一度成了巴黎人民的热门话题。

然而几乎在探戈达到顶峰的同时，它却受到了爵士乐的巨大冲击。1930年美国的爵士乐传入后，探戈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面对这种情况，阿根廷政府颁布法令，反对忽视探戈；1974年，政府第二次颁布法令，规定电台、电视台在音乐节目中必须用1/3的时间播放探戈舞曲；1989年10月，总统梅内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亲自参加了一场探戈义演，将这场保护国粹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今天，在阿根廷的舞厅和剧场门前，你仍可以看到这样的海报：“维护国家主权，演奏专场音乐——探戈”。

鸭球 鸭球是阿根廷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传统性体育活动。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阿根廷境内骁勇善战的高乔人就有了鸭球比赛。高乔人的鸭球真可谓名副其实：用一块生皮把一只活鸭裹起来，只留下鸭头在外面，然后用针把生皮缝成球形，并在外面留几个把手。比赛是在两个队之间进行的，各队挑出一名精悍强壮的选手，骑马走到赛场中央的分界线上，每人抓住一只鸭球的把手。只待一声令下，两人展开猛烈争夺，得手的一方紧握鸭球，策马向目的地急奔，而对方的选手则穷追不舍，以各种方式阻止他们前进并尽力夺回球。这样反反复复经过多次较量，直到一方到达目的地方罢。高乔人的这种鸭球比赛突出防御，靠力量和速度取胜，既粗旷又单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高乔人的这种娱乐方式逐渐为阿根廷人广泛接受。1952年，政府正式将鸭球确定为一项民族体育活动，三十年来，它成了阿根廷最热门的运动之一。

然而今天的鸭球比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球不再装有活鸭，而是用统一规格的皮子做成的，装有6个把手，形状与足球相似。此外比赛的风格也转向了灵活、机敏和以技巧、智慧取胜。现代鸭球比赛在某种程度上是赛马技巧的比进球。

（3）烤牛肉

阿根廷是一个牛比人多的国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把它变成了一块天然牧场。在这里，平均每人有两头牛，每年人均牛肉消费量多达70—90公斤，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阿根廷人吃牛肉的方法主要是烤，他们把烤牛肉称作阿萨多。这种烤牛肉的制作方法十分简单：把牛肉切至一寸多厚，然后

撒上盐在炭火上来回翻烤就行了，但真正把握好火候却是件不易的事。在阿根廷，阿萨多几乎成了一道国菜，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钟情于它。每逢星期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区处处青烟袅袅，肉香四溢；而在郊外，喜爱野炊的人们把大自然变成了他们的烤肉场。树林里，草地上，几人围坐，架起铁篦，炭火僻僻啪啪，清香阵阵，人们边烤边吃，怡然自得。

近几年来为了增加出口，政府规定每周五为“禁肉日”，这一天餐桌与牛肉无缘。但此举颇招非议，看来，阿根廷人是不可一日无牛肉的。

四、铜之王国——智利民俗文化小记

(1) 移民节

智利的民族传统节日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还是一年一度的移民节。智利移民节始于1983年，此后每年的10月24日至26日以安埠区首府——安托法加斯塔为中心举行，参加这一节日的移民来自于德国、玻利维亚、南斯拉夫、希腊、中国、阿根廷、美国、意大利、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

移民节期间，安埠区政府把安托法加斯塔美丽而宽阔的海滨大道辟为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各国移民在划定的区域内按本民族特色加以布置，竖起各种象征和吉祥物。比如，在中国移民区你可以看到琉璃飞檐的红色牌楼，上面悬挂着大红宫灯，一派喜气；德国移民架起了风车，田园风味十足；阿拉伯人布置出了古堡、驼铃，一片沙漠风情；而希腊人则重现了古文明废墟的风采……人们身着节日盛装，游逛在各个移民区内，风味小吃、民间工艺都使他们流连忘返。中国的展品特别受人垂青，栩栩如生的玉雕，活灵活现的泥塑，精美的陶瓷、剪纸，五花八门的京剧脸谱，名扬古今的丝绸，典雅斯文的文房四宝……应有尽有，人们赞不绝口之余，纷纷抢购。

移民节的开幕式一般在夜晚举行，舞台以巨大的帆船作背景，台上则站着各国移民的代表，这象征着“同舟共济、扬帆破浪”。台前兀立着美丽的少女，她们身穿国旗艳装，面对着智利大地，飘逸中颇显俊俏。接下来各国移民代表依次走下“帆船”，把从母国带来的种子撒在智利的国土上，象征着要在这一位获“美丽小姐”殊荣，她随之也就成为移民节中令万众瞩目的人物。据说，这项无比荣耀的桂冠，也曾戴在一位华裔姑娘的头上。

(2) 奎卡舞围牛

奎卡舞 欢快、幽默的奎卡舞是智利的国舞，它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是由当时风靡全智利的萨马奎卡民间舞蹈演变而来的。

奎卡舞是一种两人对跳的舞蹈，动作简单却非常优美，不受某种固定歌词和曲调所约束。据说，这种舞是模仿雄鸡振翅向雌鸡“求爱”的动作而设计出来的。奎卡舞深受智利人民喜爱，并传到了秘鲁、阿根廷等国家。然而近年来，由于迪斯科风行一时，奎卡舞倍遭青年人的冷落。1979年，智利政府颁布法令，将它确定为国舞，并要求所有学生、行政官员和驻外大使都必须会跳。这为奎卡舞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年9月18日在国庆节时，奎卡舞便成了国庆典礼的主要内容。到时，近百对披红挂绿的男女或骑高头大马，或乘彩篷马车，缓缓地来到总统和文武百官就坐的主席台前，成双结对地跳起奎卡舞来。竖琴和吉它的伴奏清脆动听，“美丽啊，智利”的歌声悠扬悦耳，人们手持花巾，翩翩起舞。男舞伴们头戴传统的宽檐黑礼帽，肩披阿劳坎人的斗篷，舒臂展巾，含情脉脉，忽而旋转跳跃，忽而追逐戏嬉，妙趣横生；身穿彩色长裙、头戴遮阳纱帽的女舞伴们则笑意盈盈，故作躲闪。此外在男女对舞时，双方都要说些客套话或作插科打诨，更增加了舞会的情趣。曲终奏雅，演员们向总统奉上用弯牛角盛装的美酒，此时军乐高奏，国庆仪式正式开始。

围牛 围牛是一项别开生面的传统比赛，它历史悠久，产生于十六世纪的智利牧区。最初，围牛是人们制服野牛的一种方式。后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就成了今天全民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智利的围牛活动有诸多讲究，首先是要求坐骑精壮，因为它是决定胜负

的关键。好的坐骑必须形体高大，奔驰如飞，反应敏捷而又顺从指令；其次是要求围牛士技艺精湛。此外，围牛士的外观也很考究，他们必须长相俊美、气度轩昂，比赛时还要穿上传统的牧民服装。

围牛场地形似半月，四周筑起围墙和看台，球场的侧面有一块 10 米长的挡板。比赛按一定的程序进行：鼓乐声中，围牛士骑马列队出场，然后分成两人一组；接下来是疯狂不羁的蛮牛出场，它横冲直闯，怒气冲冲。围牛士一人在前赶，另一人则在后面挡，将牛向挡板处围去。最后，斗牛士在坐骑的飞奔之中将牛猛然制服在挡板上，这一动作要求迅速有力、干净利落。比赛以得分高低确定冠军。赛后，观众们要进入围牛场，与选手们共跳奎卡舞，围牛活动便在一片欢乐中结束。

（3）基阿诺

基阿诺是智利的特产，它俗称为“印加小麦”，为南安第斯山附近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粮。基阿诺的种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今天，它同奎卡舞、青金石一起，被誉为“智利三宝”。

基阿诺是一种高 1 米左右的草木植物，开红花，穗上结三角形带尖刺硬壳的褐色籽粒。据研究表明，这些籽粒里面的蛋白质含量甚至超过了小麦和水稻。基阿诺生长在高寒山区，耐寒耐旱，生命力极强，古代印第安人把它作为主要食粮。人们将籽粒经过处理后，可以磨成粉做饼吃，叶子也可做菜，这种食物如今已为大多数智利人所接受。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学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基阿诺，对它的研究也许会为人类解决粮食问题开辟新径。

五、满园春色关不住

除了以上我们介绍的国家以外，南美其它国家的风俗文化也是丰富多采的。下面我们就选择一二向读者作一介绍。

(1) 厄瓜多尔的黑妈妈节

黑妈妈节，又称“圣母施恩节”，它是“赤道之国”厄瓜多尔的一个传统节日，在每年的9月举行，以拉塔昆加城为节庆的中心。节日持续三天并充满了戏剧性。

在厄瓜多尔，印欧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几乎占总人口的80%，黑人则极为少见，因此，人们在现实中是难以找到纪念黑妈妈的理由的。那么，这一节日从何而来呢？据传说，黑妈妈原来是圣母玛利亚的乳母，她勤劳、善良，是印欧混血种人崇拜圣母的引导者，因此便得到了基督徒们的尊敬和怀念。

节日的清晨，无论城市、乡村，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人们汇成一流向广场走去，队伍中由一名妇女扮演成受人尊敬的黑妈妈形象，她头戴蝴蝶结和玫瑰花，脸上涂满油彩，和蔼而又慈祥。当黑妈妈到达广场时，全场欢声如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拥向她，向她表达衷心的问候和感谢。紧接着两位英俊威武的骑士把黑妈妈抬上一匹装饰得华丽别致的大马上，她便侧身坐于马背，高举着一个黑皮肤的布娃娃，唱起了民间的摇篮曲。唱罢，黑妈妈从布娃娃的长裙下取出一支巨大的注射器来，向她邻近的人们脸上假作喷射，而那些被“射中”的人一面用手帕假装擦拭，一面高喊：“多美的牛奶啊！”紧接着，黑妈妈率领人们，在音乐伴奏下向本地区最大的城市走去。队伍中最主要的角色是有孩子的妇女，她们身穿白色裙服、头戴面具，一路歌舞不断；男人们则高唱民歌，特别要唱：“不要用刀杀我，因为你有锋利的刀刃；用叹息声来杀死我吧，我将宽容你的罪行”；未婚的女青年不戴面具，她们穿红着绿，单独列为一队。姑娘们不断地与小伙子们调情，小伙儿们则唱起民歌相对，歌的大意无非是“抱怨”节日里的姑娘缺少端庄的举止。于是姑娘们便双手捂脸以示害羞，小伙子们则趁机向自己喜爱的姑娘怀中投红石榴。这样的打情骂俏，往往会成就不少鸳鸯。与此同时，黑妈妈则在欢乐的人群中挑选自己的孩子，当然，只有那些表演精采、装饰华丽的青年人才能被她看中，被选中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并能获得一分纪念物。

到了第三天，所有参加庆祝的人们云集在城市中心，活动随之进入高潮。黑妈妈登上巨大的舞台，她向所有的人祝福，并放声高唱黑妈妈之歌，歌词由黑妈妈的扮演者即兴所作，这样就避免了落入俗套。此后节日亦告结束。

(2) 圭亚那灯节

圭亚那是世界上有名的“多水之乡”，在这个国家里，民族构成与南美其它地区极为不同：印度人竟占了全国人口的51%以上。这种状况就为圭亚那文化深深地烙上了印度文化的印痕，灯节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圭亚那灯节最初是印度移民的节日。相传在很久以前，印度北部地区有几个僧侣被邪魔驱逐出境而亡命海外。他们到了圭亚那居住下来，虽处异地，但他们仍心系家乡，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土。他们恪守教规，在当地人群中传播印度教，受到普遍的崇敬和爱戴。后来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纪念，每年的11月15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以期流亡者平安归来。这样就发展成为今天的灯节。

灯节以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为中心举行，主要活动是彩车的列队游行。彩

车队由装饰华丽的轿车、卡车和马车组成，它们均饰有彩灯和花篮，并配以各种动物模型和艺术表演，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游行的车队宛如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龙，缓缓地驶向郊外的印度教堂。入夜，乔治敦灯火通明，与星辰相辉映，真可谓极乐世界，天上人间！

（3）委内瑞拉的魔鬼舞和摔牛

委内瑞拉国内的民间舞蹈丰富多采，较有名气的有图拉斯舞、卡里特舞、塔穆南格舞等。图拉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一种竹筒做的伴奏乐器而得名，它深为法尔孔洲南部和拉腊州北部的人民所喜爱；卡里特舞主要表现渔夫捕捉卡里特鱼时意趣横生的场面；塔穆南格舞则得名于一种非洲乐器，舞姿颇似中国的舞剑。然而委内瑞拉最负盛名的还是魔鬼舞。这种舞蹈的表演者都要戴上假面具，面具有的用于葫芦制成，有的则用纸糊成。惩恶扬善是魔鬼舞的主题，但在不同地区，它的表演形式也有所不同。比如阿拉瓜州的祖奥镇和卡塔镇流行一种多人魔鬼舞，每逢节日，人们都要穿上奇异的服装，戴上精心制作的假面具，成群结队地来到亲朋好友的门前跳起欢快活泼的舞蹈，正当他们舞得正酣时，主人则拿出丰盛的酒菜相款待。而库马纳的魔鬼舞又是另一种风格，“魔鬼”们青面獠牙，丑陋不堪，往往令人望而生畏。

摔牛是委内瑞拉另一项重要的传统娱乐活动，它俗称为托罗斯·科里亚托斯，是草原牧民们的创造。摔牛活动通常是在一条长二至三百米的跑道上进行，四周围上栅栏，观众们在栏外观赏。比赛时，场内放着三五头膘肥体壮的公牛，摔牛士则骑着马向它们靠近并与之周旋。一旦看准时机，摔牛士便抓住牛尾，狠命地揪拉拖拽，凭借自己最强劲的臂力和马的冲击力，最终将筋疲力竭的公牛摔在地上。这是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难度较大，要抓住牛尾十分困难，此外有的公牛力大性躁、横冲直闯，往往还会将摔牛士给弄下马来，使人心惊不已。比赛结束后，摔牛士骑马绕场一周，向观众致谢，而此时一位美丽的姑娘则会将一串玫瑰花戴到他的胸前。首都加拉加斯更是别具一格：活动结束后，人们便当场杀死三只乳猪，在广场上烧烤为壮士们庆功。

（4）哥伦比亚的烤蚂蚁和软咖啡

烤蚂蚁是哥伦比亚一种独特的菜肴，深受人民喜爱。烤蚂蚁并不是烤那种普通的小蚂蚁，而是一种“大臀部蚂蚁”，它体形较大，如同花生米一般，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据说，大臀部蚂蚁本是哥伦比亚内地桑坦德省一带的特产，早在西班牙殖民者登上南美前，它就成为当地印第安人的盘中美食了。如今的烤蚂蚁吃法多样，常见的一种是在平底锅和陶制锅上烤，烤好之后加上佐料便可食用，又香又脆，余味无穷。另一种吃法则是将蚂蚁同煮熟的木薯揉合在一起，制成一种蚂蚁饼，这种方法香甜兼备。在一些印第安人的聚居区，还有一种生吃蚂蚁的习惯，因为人们认为生吃能达到治疗疾病、滋身壮体的作用。

随着人们食物结构和追求的不断变化，大臀部蚂蚁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承认，各大城市里的食品商店、餐馆都有出售，不仅如此，它还成了外国人极为青睐之物。

哥伦比亚的咖啡产量仅次于巴西，名列世界第二位；质量则是首屈一指的，它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在哥伦比亚，咖啡被人们称作“绿色的金子”，与巴西的硬咖啡不同，它柔和纯正，不苦不冲，是典型的软咖啡，这应当归功于精心的管理和加工：人们多把咖啡种在山坡上，并套种芭蕉以遮光；收

获时，要分期采摘，只摘成熟的果实；加工时工艺也较特别，这样就产生出了闻名遐迩的软咖啡。

六、世界第八大奇迹 ——纳斯卡巨画之谜

提起利马，自然为世人所知——她是秘鲁共和国的首都。然而，您可知道距离利马 300 公里处有一块神秘的地方吗？

这块神秘之地就坐落在秘鲁南部纳斯卡附近一块海岸高地上。这块高地的名字叫作纳斯卡帕鲁帕。纳斯卡帕鲁帕高地是块不毛之地的沙漠地带，它布满了棕色、赭色的碎石，看上去像是一条大河冲积残留下的扇形河滩。所以有人曾断言，远古时代，这里肯定是一条河道。然而，这却是与事实不符的猜测。纳斯卡帕鲁帕高地是一幅超乎寻常的“巨画”，其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左右。

纳斯卡地画，在地面是看不出的。也许正因为古人制作了自己看不见的画，所以现代人才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如此奇观是怎样为人所发现的呢？

实际上，该地画的发现纯属偶然。1939 年，美国教授保罗·科索科斯在研究纳斯卡古人灌溉系统时，飞机进行科学勘测，忽然，奇观出现了，一幅巨型地画映入了保罗·科索科斯的眼帘。他一下子惊呆了。

纳斯卡地画有其丰富的内容，但大部分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有的呈三角形，有的是呈平行四边形状，还有的是梯形和螺旋形。各种几何图形错落有致，甚是好。更为动人的是，有些图形呈较为具体的动物状，它们有的类似鸚鵡、海鷗等鸟类，有的类似鲸鱼、章鱼等鱼类，还有的像猿、猴、狗类，也有的近乎蜥蜴、蜘蛛类……

纳斯卡地画是在黑褐色地表石头上而作的，艺人们向下刻凿 10 公分，这样，黄白色的沙土就会形成浅浅的沟槽，恰似单线勾勒的白描画，甚是好。由于在地面图形上有一层小石块，其作用是阻障过强的温差与风蚀，所以，该地画虽历经风风雨雨，却仍未被风沙侵蚀掉，并完好地保存至今。

那么如此美妙的地画，其制作时间起于何时呢？于是，科学家们对一幅画面上直线的一端残留的木桩进行了碳—14 测定。结果，其制作时间竟被追溯到公元前后至公元 600 年间。鉴于此，有些学者把地画上的图形同纳斯卡文化陶器上的图形相比照，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地画是出自创造纳斯卡文化的艺人之手。然而要寻求这些具体的艺人之名，恐怕难以为之。

纳斯卡地画图形的线条也别具风味。其线条有深、有浅，有长、有短，有直、有弯。线条按平行或交叉进行排列组合，构成各种图案。地画中有一幅长达 90 米的鸟类图。它还有一只类似手形的图形，其长度为 50 米。令人费解的是，其中一只手长了五个手指，另一只手只长了四个指头。

透过这些线条，学者们发现，各个三角形勾画得惊人相似，其角度也是惊人的准确。角度误差不到一度。如此大的构图，即使使用现代的测绘仪器，要想达到如此小的误差，也并非易事。因此，这又冒出了一个难解的人类历史之谜。

古人花费如此超常的精力，制作如此庞大的地画，到底是为什么？地画的用途又是什么呢？这真是环中有环，谜中有谜。这其中的奥秘吸引着诸多的学者去论证，去猜测……

地画是印加帝国的交通路线图，有人如是说。

地画是纳斯卡人为凭吊死者时行进的路线和标志，也有人这样想。

地画是印第安人的灌溉系统，一部分这么认为。

地画很可能是印第安人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场所，有些人如此思。

地画很可能是观测天体，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的，还有些人这样异想天开。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地画是奇特的天文日历，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学书籍”。

瑞士的厄里希·丹尼斯则大胆地想象地画是外星人制作的，其笔直的线条可能是其它星球的宇航员乘坐的飞行物的跑道。

种种猜测，类类论证，实在很难加以统计。

纳斯卡地画如此神秘的磁性，将许多人吸引到它的周围。许多研究者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女人类学家玛丽姬·莉切特别值得一书。

1932年，莉切读到了一本关于秘鲁印加太阳观测台的书，这使她对印加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她便来到了秘鲁。她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印加文化。1946年她开始研究纳斯卡地画。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她对该地画进行过测量、摄影、清扫和保护。因此，世人赞誉她为纳斯卡地画的“守护天使”。

莉切终生未嫁，她几乎把整个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该地画的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劳必有得。最后，她写出了一本名叫《秘鲁的纳斯卡——潘帕的秘密》的书。该书是用德文、英文和西班牙三种语言写成的。“潘帕”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原野”。该书图文并茂，是莉切女士一生心血的结晶。她通过对多数直线方向计算测量，认为其中有若干根线条与特定的星座运行方向是一致的。她倾向性地认为，纳斯卡地画与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有关。地画很可能是一幅天体观察图，那些动物图像是表示星座的。

美妙的人类杰作必将吸引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去欣赏，去观光。但是，现今去观光欣赏纳斯卡地画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游人可以爬到山坡上，通过观望塔去看附近的画面；其二是乘空中游览车一睹世界第八大奇迹。

七、云中古城——马楚皮克丘之谜

纳斯卡地画之谜，着实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博大精深的印加文化却有着无数令人神往的谜。云中古城——马楚皮克丘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

被游人称作“秘鲁珠宝”的云中古城——马楚皮克丘距印加王国都城库斯科西北只有 120 公里。它高高屹立在安第斯山区最难通行的一座山峰上。马楚皮克丘古城并不是它的真名。其真名已随印加王国的覆灭而早已为世人所遗忘。只因为古城所在的山峰之中，有一座山名叫马楚皮克丘，所以，考古学家才这样称呼这座云中古城。

马楚皮克丘古城的发现是与一个神奇的探险故事分不开的。多少年来，这座“秘鲁珠宝”古城不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因而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传说库斯科北面茫茫的崇山峻岭中有这么一座披着神秘面纱的美丽古城。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希南·宾诺姆深深地被这些传说所吸引。好奇心和他的探险精神驱使他作出了寻找这一古城的决心。于是宾诺姆教授就和他的考察队跋涉在安第斯山脉无数的羊肠小道和峡谷丛林之中。探险的艰难寻觅行动开始了。最初的努力毫无结果，许多人兴致尽无，失望至极。但是，教授本人却对此充满信心。

1911 年 6 月，宾诺姆教授决定作最后一搏。他和两位科学家从库斯科出发，随即便消失在茫茫群山丛林之中。六天的行程下来，他们来到了乌鲁班巴河畔一家私人旅店借宿。也许是六六大顺，在这里，他们听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旅店里，店主告诉他们，马楚皮克丘山中的瓦伊纳皮克丘山顶上有一片废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教授便决定去那里搜寻。当时天正下雨，同行的科学家不愿前往。宾诺姆教授便在店主的陪同下上路了。教授历经千辛万苦，在当地印第安人的热情支持下，终于来到了印加古城脚下。宾诺姆教授成为 300 多年来第一位踏上马楚皮克丘古城的白种人。正是他，发现了印第安人的人间奇观。

映入教授眼帘的是这样的奇观：一排排极为美丽的辉煌的石阶建筑，间以颓垣残墙的废墟。高约 10 英尺的数以百计的石坡台阶均长数百英尺。古城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岩石嶙峋。当年曾是花园和农田的城外陡峭的山坡，长满了野生植物。城内精心建造的房屋，引人注目的当属 12 座殿宇。由于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并不知此地，所以它们至今仍完好无损，这实属庆幸。

在此后的岁月里，教授和他的考察队开始了对古城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要在海拔 2400 米的山峰顶上工作，其难度是相当大的。教授和他的考察队克服了重重的自然困难和人为困难，终于使云中古城再现出昔日的辉煌：

城周围有石墙环绕，内有宫殿、庙宇、作坊、民房和牢房。这些建筑由数以百计的石阶小径纵横其间，有的石阶小道多达 160 层之多。城内有一石阶通道，纵贯南北，恰似主街道，是进入城内的唯一道路。城内整片房屋由狭窄的阶梯连接起来。城内饮水系统也别具风格。其水引自一公里外的几处山泉，流水蓄在多处公共取水槽和水池子里，再由一套精心设计的滴水管道输送到各层建筑物附近。古城建筑全部用花岗石砌成，依山就势，雄伟壮丽；犹如天工为之，显得自然和谐。石城之间紧密相连，没有任何粘合材料，全是工匠们用简单工具巧夺天工而成。

城内的“主神殿”，坐北面南，朝向祭祀广场。神殿中建有高大的花岗石圣坛，可能用来存放最受尊敬的死者的木乃伊。坛上还有许多小壁龛，收

放祭物。祭祀广场另一边是“三窗殿”，从此眺望，周围美景尽收眼底。

城外是另一番风景。城外的梯田层层，种植着许多植物。除了种植作物的绿地外，还有许多墓地，众多印第安人就长眠在这里。

马楚皮克丘古城再现天日，辉煌无比，然而，其中的不解之谜仍然萦绕在世人脑际。

关于这座云中古城的来历，众说不一。

宾诺姆教授认为，该城是一座圣城，它是印加文明的发祥地。教授认为，城内的“主神殿”与传说中的一座房子一模一样，据说第一批印加人就是从这座房子出发去建立王国的。如果这假设属实，它应该是印加文明的摇篮。

宾诺姆颇带浪漫色彩地认为，第一位印加王曼科·卡帕克曾从此出发，建立了王国都城库斯科。西班牙殖民者到达库斯科以后，一群印加女仆为躲避殖民者的奴役，逃到了这块不为外人所知的“世外桃源”，并乞求天神消灭外来入侵者。因为教授在挖掘坟墓时曾挖出了 173 具骨骼，其中 150 具均属女性。据此，教授认为该城是女人居住的城堡，至少在印加王国的最后阶段是这样的。教授认为，1572 年，最后一位印加王图帕克·阿马鲁死后，印加王国随之解体，古城中的印加人在国王尸体边集体殉国。该城也就变成了一座死城，为人所遗忘。

与此不同是，考古学家认为，该城是印加王国最后期的典型建筑，因此可能是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 100 年建成的。还有人相信，古城是印加王朝第八位国王维拉科查建造的用来抵御敌人的城堡。也有一些人认为，古城是印加王室成员和达官显贵登高远眺、观山赏景之憩息场所……

总之，看来这座云中之城到底是什么城池，一时还是十分难解之谜。

关于古城边上的“因蒂华坦娜”碑，也是古城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难解之谜。

“因蒂华坦娜”碑，意思是“日光柱”，或称“日晷仪”。其上面有着许多神秘的符号和奇妙的图案。一些学者认为，太阳是印加人崇拜的星体，所以每座印加古城都造有一个神圣的“因蒂华坦娜”，用来标明太阳的运行情况，以便象征性地捆住太阳，防止它落下去。与此不同，有的学者则深信，“因蒂华坦娜”是一座太阳天文台，是计时仪器，聪明的印第安人利用它与太阳影子的斜角大小以及太阳影子的长度来计算时间。

云中古城也促使人们去想象，去猜测，为什么印加人要在这片人迹罕至的险峻高山中建筑这座古城？是何原因迫使他们又遗弃了这座城？修建古城建筑所用的花岗石，小的数吨，大的达 20 余吨，而最近的采石场也有 15—30 公里。印加人怎样将巨石运往数千米高，陡峭如削的山峰的呢？他们又用何种工具切割样式各异、大小不同的巨石呢？又怎么天衣无缝地垒砌成那众多的建筑物呢？

这一切的一切，又给这座传奇色彩的美丽古城罩上了层层神秘的面纱。

八、莫阿伊斯的诉说——复活节岛之谜

在烟波浩渺的南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孤岛——复活节岛。它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茫茫的南太平洋上，在海雾中时隐时现，神奇无比。

复活节岛是由荷兰航海家雅可布·罗杰文命名的。当时 1772 年 4 月 5 日，正值复活节。也正是在这一天，雅可布登上了这座美丽的小岛，遂将其命为此名。不过岛上的土著居民则形象地称复活节岛为“太·皮托·澳·大·希努阿”，意思为“地球的肚脐”。

该岛略似一个钝角三角形。拉诺高、蒙格特利和卡蒂亚三座火山的山顶，分别位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上。该岛地处南温带以北，气候温和，年均气温为摄氏 22 。火山口布满了杂草。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大的火山口底部已变成了蓝色的湖泊。湖边嫩绿的芦苇，随风摇曳，整个小岛充满着幽绿的神秘之美。目前，面积仅有 179 平方公里的复活节岛上，住有 1600 多居民，其中约 400 人为智利大陆人，其余为当地土著居民。

令人惊奇的是，复活节岛却有着辉煌的人类文明遗址。因为人们在此亲眼目睹了上万个人类居住过的遗址，350 多个石造的祭祀场以及大约一万个巨石人像以及诸多的岩画。

那么，就在九九方圆一棋之地的复活节岛上，是谁创造了这些文明？也就是说，岛上土著居民的祖先是谁呢？为解开此谜，许多学者为此作了不懈地努力，但是，结论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大体说法有两大派：一派认为，土著居民的祖先为波利尼西亚人。他们认为，约公元 300 年左右，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在汤加群岛和萨摩亚群岛定居。后来，他们向北扩张到夏威夷群岛，向南扩张到新西兰。约公元 10 世纪，他们又向东扩张到复活节岛。1980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的多萨教授在其《对复活节岛的新探索》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是在大约公元 500 年到达此岛的。另一派认为，该岛的土著居民祖先是利用东南季风和洋流，从南美洲西岸漂来的印第安人。为了论证此说法，有人于 1947 年用秘鲁丛林中的一种树木，仿造早期印加人的木筏，从秘鲁卡亚娥港出发，随波漂流几千公里，历时十天，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土阿莫土群岛。1955 年，此人又专程前往该岛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岛上早期的住宅一律为石墙草顶，入口处开在顶篷的圆形石屋处。这种建筑在波利尼西亚其它岛屿上都是没有的。

虽然一种说法不能成立，但是前一种说法也并不为所有人认同，因此，该土著居民的祖先到底为何人，仍属千古之谜，有待后人去揭秘。

复活节岛上的“莫阿伊斯”一语是当地人对巨石人像的称谓。之所以说成是“巨石”，是因为人像高度从 3 米至 20 米不等。至今，拉诺·拉拉库山坡上仍残存着立姿、躺式的众多人像，以及制作完成后仍在原地搁置着的 150 多个“莫阿伊斯”。

巨人石像几乎都是半身像，石像大都昂头、噘嘴、挺胸。其头部约为像身高的 2/5，狭而扁平，额头较窄，头发很短，耳朵细长，眉弓突出，眼眶深凹，圆卵形的眼白是用发亮的黑曜石制作而成的，瞳孔用贝壳制成，鼻梁高大，鼻孔很粗，下巴突出有力，两臂僵直地垂在没有脚的身躯旁，双手规规矩矩地摆在隆起的肚皮上。

值得一提的是，岛上最古老的石像是被雕刻成跪坐姿态的莫阿伊斯。这

一样式与澳大利亚的石像十分相似。

栩栩如生的“莫阿伊斯”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自己的秘密，然而，我们却无法真正读懂他们。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制作如此多如此大的巨人像呢？这可能与祖先崇拜的宗教密不可分。在复活节岛上，人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石祭坛。这些祭坛是首领或贵族作祖先祭祀的场所。巨人石像则可能是把村落首领神化为保护神的产物。据说，石像的白色眼睛是在石像制成后才镶上去的，在安放石像时，村民们还得举行盛大仪式。安放石像的石座必须朝向村落建造，石像瞪大的双眼必须凝视着自己的村落，以示守护村民。

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有的竖在祭坛上，有的屹立在绿草丛中，有的翻倒在地上，还有的被扔在山坡上，它们何以有如此多的摆放姿式呢？

据估计，这是与资源枯竭、战乱横行和岛人礼仪有关。当人们还热衷于建造偶像之时，各个村落间展开了比赛，看谁的石像更大。于是森林资源发生匮乏。冬天的雨水强烈地冲蚀着土地，土壤流失严重，人民只得向海岸地带迁徙，因而留下了诸多制作完工后仍旧躺着的石像，以及一些更大的但尚未完工的雕像。

公元 17 世纪，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显著下降，资源枯竭，人口增加，食粮不足，使岛上大乱。于是，敌对村落之间经常把对方的石像搬倒，致使许多石像要么倒地，要么仰在山坡上。

战乱又导致了鸟人礼仪的兴起。由于战乱，武士阶层显赫起来。他们既要从小村庄掠夺粮食，又得负责本村落的安全。于是他们简化了祖先崇拜的仪式，改为围绕一种叫做乌燕鸥的海鸟的蛋而举行简单的仪式。为之，他们在奥坤勾海岬还建造了专为举行鸟人礼仪的岩石屋。

“鸟人”仪式上的最重要祭品是一个乌燕鸥蛋。蛋的特殊性在于，蛋只能是来自岛西南角上一个名叫莫托·涅的小岛，不仅如此，还必须是乌燕鸥的第一个蛋。据说每年有很多的竞争者，停留在欧洛歌圣地，等待信号。一旦得知岛上有蛋，他们便带着食物和水，立即跳下欧洛歌悬崖，游向莫托·涅小岛，去抢夺那第一个鸟蛋。当谁有好运得到首只鸟蛋，便迅速游回，爬上悬崖，他因此被认为是当年的“鸟人”。新“鸟人”应该剃掉头发、眉毛和睫毛，并把自己画成白色，离群独居，直到来年产生一个新的“鸟人”来顶替他。

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重达百吨左右，如此笨重的石像，在当时极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是怎样运到岛上去的呢？如果没有起重机的帮忙，又是哪来的神奇之力将这些巨石像竖立在基石上面呢？这些巨人石像中，有的帽子竟高达三米，而像这样的帽子要达数十吨重，它们又是怎样戴上去的呢？实在令人费解。

不仅如此，复活节岛上的岩画遗址也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直到 1981 年，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注意到岛上的岩画。目前他们已发现了一千多处岩画遗址。由于岩画线条细，又刻在洞沿窟顶部，很难发现。所以只有在特殊光线照射下或经塌方，才可见到。1981 年，考古学家在一个陡峭的悬崖山洞——“食人洞”顶部发现了一幅极为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岩画。全是用红白两色在窟顶上描绘出的种种飞翔的鸟类。鸟栩栩如生，令人赞叹不已。

复活节岛上的岩画，随地区不同而形象各异。不过，其题材主要有三大

类：鸟人、人面像、特种鸟类乌黑的燕鸥。其它的动物也有所表现，如鱼类、海龟等，此外，还有船只和渔钩等等。

岩画中的“鸟人”图案，主要集中的欧洛歌一带。“鸟人”是一种与神人同形的热带猛禽的形象，有着长长的嘴和粗犷的喉囊。最重要的“鸟人”岩画，是欧洛歌的拉诺·卡地区发现的。岩画遗址坐落在一个火山口的边缘。它的南部，悬崖直落 350 米，直插大洋之中；它的北面，是一个由陈旧的火山口形成的清水湖。玛塔·格拉岩画“鸟人”图形可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作品，其线条往往采用琢磨的研磨之法，图形狭长，单薄，是一种侧面的波浪状的形象，不太注重对手脚和喉囊的刻画。后期作品采用浅浮雕的形式，刻画出了蜷曲着的侧面形象，背部成圆形，手部和脚部的刻画较精细。有的手中握着一只鸟蛋。头部、尖嘴和喉囊也表现出了海上猛禽之特点。玛塔·格拉的早期鸟人岩画常常全部或部分地被后期的作品所覆盖。这说明鸟人岩画形象在其形成期是没有固定模式的。等到“鸟人”成为全岛的宗教，在祭祀仪式和艺术风格方面，鸟人岩画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传统规范。所以，后期的作品也就极少有对这一规范的突破。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岛上的鸟人崇拜才逐渐衰落下去。

岛上的岩画，除了“鸟人”这一主题外，还有别的许多有趣的主题。人们像以玛塔·格拉发现的神灵图像最为出名，它们一般是神人同形。岛的北部海岸没有鸟人岩画，绝大部分是船只图形，目前已发现了其形状和大小基本相仿的 60 多个船只图形；同时也有少数海龟图形。海龟是岛上的稀有动物，对于一般岛民来说是属于禁忌的，只有岛上的国王才能食用它。岛的北部顶端上的岩画，主要是描绘金枪鱼尾巴的岩画，这在岛的其它地方是不曾有过的。另外还有人和章鱼结合的岩画，以及人和海豹结合的岩画等等。

总之，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岩画，其线条优美、均衡鲜明，反映出了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但要破译这一人类文明现象，却是十分困难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岛上的文字之谜。1809 年，一名法国传教士——艾德劳在复活节岛上发现了刻有文字的木板。这些木板被称作“说话板”。

在此之前的岁月里，岛民一直把木板当作木柴来烧火做饭。许多的文字就这样令人遗憾地被付之一炬！令人深感可惜。因为，考古学家正是通过这些木板，才能够了解岛上先人的历史，才能破译诸多的复活节岛之谜。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收集到 21 块木板和几件刻有文字的手工制品。虽然少了点，但是毕竟有了了解开岛上文字之谜的“历史教科书”。

在这些木板上，密密麻麻的细小表意符号随处可见。它们有的像人，有的像鸟，有的像鱼、祭坛、草木和船桨，有的纯粹是几何图形。在这些“说话板”上，第一行刻完后，再刻第二行时，文字符号竟是倒置的。这真是奇中之奇，谜中之谜。

对于这些文字符号，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识别它。许多学者却认为，木制图案和物像都受到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在航海技术欠发达的昔日，这种东方文化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到复活节岛上的呢？实在令人迷惑不解。

第五章发展之梦经济道路

当旭日东升的时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然而，他们的处境是迥然不同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之中。相反，另一部分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流离失所，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目不识丁，无业可干，美好的生活前途恰似海市蜃楼……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组成了全球有机体的“许多部位”，因此，它们未来发展的实质和特点应当是不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所有国家必须首先要考虑的。在二十世纪的后一段时间和二十一世纪，不会再有两种前途——即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的局面。用一位诗人的话来描述，就是：“世界要么仅有一个未来，要么什么也没有。”

——[美]迈克尔·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纪》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不仅是第三世界的呼声，也是世纪之交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早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曾指出：“未来的年代里，富国与贫国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将进一步扩大，并且中等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将增大。……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现为7.5亿，不久将达到10亿。”10多年后，我们不得不钦佩经济学家们非凡的预见性。虽然以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为代表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就整体而言，正如报告所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198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人均收入已达到10750美元，而全世界处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不足370美元的人口已超过10亿。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帕德马·德塞所说：“第三世界由于其广泛的贫困而日趋重要。”

让我们仍然把目光投向拉丁美洲，在这块总面积达2070万平方公里，人口4.2亿，包括45个国家和地区的神奇土地上，人们正经历着怎样的欢乐和痛苦、成功和失落、机遇和挑战。

一、新时代的“多洛雷斯呼声”

人们不会忘记，在那如火如荼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年代所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西蒙·波利瓦尔，何塞·圣马丁；人们更不会忘记墨西哥小镇多洛雷斯的独立呼声——伊达尔戈在激越的钟声中问大家，为什么会有不平等和罪恶，为什么会有剥削和奴役？殖民主义是万恶之源！起来吧，勇敢的人们！

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过渡，到十九世纪，拉美国家已纷纷独立，一个个主权实体诞生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大陆上。然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发现，虽然宗主国的政治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但是刚刚独立的国家却又不知不觉地被带入了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剥夺弱者的国际大赌场，“殖民主义”刚刚从门内被赶出去，然而它又从窗户里爬了进来。

（一）一朝落后，永远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之后的拉丁美洲是具有发展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的。首先，即使在独立之前，由于西班牙、葡萄牙的经济霸主地位已被英国取代，在军事上又受到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威胁，实在无暇两顾，殖民地具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发展道路自由选择权。其次，整个拉美所蕴藏的丰富资源，远非欧洲所能比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第三，中南美洲为两大洋所环抱，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些新兴国家成为远离战争与动乱的“世外桃源”。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拉丁美洲正面临着绝好的发展契机，至少，这一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差距甚微。

不幸的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拉美民族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性远不及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的执著力，来自英国的理论和制度的诱惑使西欧国家未费兵一卒就再次把拉美变成了殖民地。这一次所造成的损失是持久的，惨重的。

出于理论与实际的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位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创立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学说，为贸易的自由化鸣锣开道。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在本国产品体系中成本最低的那种产品，再与其他国家交换，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节省资源且又能取得最大利润的选择，因而也就是国际分工的最佳模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普遍认为英国的“世界工场”地位是与贸易自由化相关联的，效法英国的制度将会取得类似的成果。

显然，按照当时的自然禀赋和生产能力，拉美以第一产业的产品即初级产品作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是“最为理性”的选择，至于国内所需的工业品呢？当然没有必要生产，因为英国货既便宜又实用，本国生产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这种貌似理性的行为所结出的苦果却是拉美各国所始料未及的。主导产业的选择，直接导致了三种拉美“社会病”。第一，社会和经济的两极分化。糖、靛青、咖啡、可可、棉花和小麦的出口使中南美洲的大种植园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大种植园主成为土地和财富的最大拥有者，而大多数公民的处境同他们在殖民地时代相比，即使不是绝对的恶化，也是相对的恶化。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独特的拉美现象，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在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地位时，其内部所存在的庞大的赤贫集团也是令人惊异的。种种数据可以证明，拉美的贫富分化堪称世界之冠。

表1 某些国家的收入分配

| 国家 | 年份 | 最低 的 20 % | 第二 个 20 % | 第三 个 20 % | 第四 个 20 % | 最高 的 20 % | 最高 的 10 % |
|-------|------|--------------|--------------|--------------|--------------|--------------|--------------|
| 巴西 | 1972 | 2.0 | 5.0 | 9.4 | 17.0 | 66.6 | 50.6 |
| 阿根廷 | 1970 | 4.4 | 9.7 | 14.1 | 21.5 | 50.3 | 35.2 |
| 智利 | 1968 | 4.4 | 9.0 | 13.8 | 21.4 | 51.4 | 34.8 |
| 哥斯达黎加 | 1971 | 3.3 | 8.7 | 13.3 | 19.9 | 54.8 | 39.5 |
| 墨西哥 | 1977 | 2.9 | 7.0 | 12.0 | 20.4 | 57.7 | 40.6 |
| 秘鲁 | 1972 | 1.9 | 5.1 | 11.0 | 21.0 | 61.0 | 42.9 |
| 委内瑞拉 | 1970 | 3.0 | 7.3 | 12.9 | 22.8 | 54.0 | 35.7 |
| 平均 | — | 3.1 | 7.4 | 12.4 | 20.6 | 56.5 | 39.9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表 1 可以看出，拉丁美洲七个国家平均最穷的 20% 的人口只能得到社会总收入的 3.1%，而最富有的 10% 和 20% 的人口则分别得到了 39.9% 和 56.5% 的收入。

分配的不平等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财富的过分集中必然导致社会民众的普遍不满，经济因素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拉美政变频繁，游击队出没，盗匪横行，政局混乱。

第二，单一产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拉美经济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拉美各国大多以单一作物生产作为国民收入和出口换汇的主渠道，事实证明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国际市场上原料的价格波动幅度很大，整个国家经济无异于“悬命于一丝”。除了秘鲁、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在独立时就开始实行多样化的经济政策，大多数拉美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都陷入了“繁荣和破产”的循环往复；并且由于这种循环受国际市场供求的绝对影响，作为生产国只有等待、等待、再等待，盼望市场繁荣成为拉美人的共同愿望。

以巴西为例，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巴西经济史的特点是以一系列不同的农产品生产周期作为标志。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中，巴西先后在红木、蔗糖、黄金、钻石、橡胶、可可和咖啡等产品的出口上占据过世界的主要地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丁·F·诺尔马诺在《巴西经济类型的研究》一书中所写的：“巴西的经济史是具有一系列巨大成就的历史，以一连串的惊人的波动为其特征；事实上，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整个经济制度时兴时衰的历史。它的主要特征是产品性质经常性的变化。”

据测算，主宰巴西经济的主导产业周期表大致如下：

| | |
|---------|-------------|
| 巴西红木周期 | 1500—1550 年 |
| 甘蔗周期 | 1550—1700 年 |
| 黄金周期 | 1700—1775 年 |
| 橡胶和咖啡周期 | 1850—1930 年 |

巴西经济发展进程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三十年代的“咖啡危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巴西成为世界咖啡市场的垄断者，到 1929 年，巴西的咖啡年产量达到二千九百万袋。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使国际咖啡市场的需求锐减，从 1929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咖啡的世界市场价格从每

磅 22.5 美分跌到每磅 8 美分，这种下跌趋势一直延续到 1939 年。1929 年，咖啡出口量为一千四百万袋，不及总产量的一半；仅从 1930—1934 年，就有五千万袋咖啡置于市场流通之外，其中被迫烧毁了三千四百万袋。到 1944 年，咖啡的销毁量达到七千八百万袋，相当于 1929 年出口总额的 5.5 倍。

这一持久而沉重的打击把巴西经济推向了深渊，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今后又怎么办呢？

第三，借以维持单一产品经济的自由贸易政策给拉美经济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哥伦比亚堪称典型例证。它废除了一切关税，于是英国产品像决堤之水涌入该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国的民族工业全部被淹没在米字旗的汪洋大海中。阿根廷的情况甚至更糟，长期的经济失调使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一直处于“幼稚”状态。

与此同时，北半球的美国却无声无息而又是极其迅速地进行着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新兴工业发展的“温室”，最后，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这位新的工业巨人。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拉美各国在二战之前陷入了“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困境。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和逐步拉大的南北差距，经济学家们也只有借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一句名言：“对已经拥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已有的也要夺过来”，以慨叹经济规律的无情。

（二）第二次独立战争——经济民族主义

在如此幅员辽阔、资源丰饶的土地上却滋生出了持续的贫穷、奴役和不平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又要探寻造成自身落后的原因，并且又一次把目光从国内转移到了国际间。独立的警钟再次回荡在拉丁美洲上空。

殖民主义、反抗、革命、胜利……一连串激动人心的字眼伴随着对于美好的前景的预期再次点燃了这个本来就容易热血沸腾的民族心中的火焰；再进行一次革命吧，我们将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

1. 国际二元性和中心—外围理论

谁是新时代的伊达尔戈？毫无疑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书记、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是当之无愧的。他起草的拉美经委会两份纲领性文件——《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和《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成为拉美二十世纪的“独立宣言”。

普雷维什认为，现存的国际贸易模式使世界形成了一种由“中心”（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外围”（不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心的富裕与外围的贫穷使国际经济格局呈现出显著的二元特性；并且由于整个经济体系的构成、运转均服从“中心”的利益，所以这种二元化的趋势还在逐步深化。这一理论从近代工业化的角度指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最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成果，其经济特点呈多样化、均质化。而在外围国家，技术进步的成果只在少数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得到运用，其经济结构具有专业化和非均质化的特点。当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时，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性特征非但远未消除，而且还在逐步加强。其重要原因是技术改造在工业部门要比农业部门快得多，因此，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的增长也比农业部门快得多，由此导致的贸易条件的不平衡，使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距离不断扩大。这样，外围国家便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差距严重影响了资本积累能力，资本的进口也受到了极大限

制，技术、资金的严重匮乏使工业化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各国又只能回到农产品出口的老路上。

可是，农产品的出口靠得住吗？拉美各国发现，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把他们口袋里的最后一便士也将取走。

2. “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论

普雷维什认为，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压榨还表现在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经常性的国际收支逆差。他以 1876—1938 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指数代表原料和制成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并以 1876—1880 年的原料与制成品价格比为 100，计算二者的贸易条件，结果表明，到 1936—1938 年，原料与制成品的比价为 64：1，说明：二者价格的比例呈递减趋势，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可以由下列公式表示：

$$Y = \frac{L_p \cdot P_p}{L_i \cdot P_i}$$

其中， L_p 代表初级产品生产的平均劳动生产率， P_p 代表初级产品的价格； L_i 代表制成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P_i 代表制成品的价格，这就清楚地表明两个生产领域就业者实际收入的差异，即中心国家与外国国家实际平均收入的差异。普雷维什在解释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时指出，现存的国际分工模式是工、农业发展的固有特点，使得部分技术进步的成果在交换过程中“转移”到中心国家。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从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不但周期性下降，而且结构性下降。因此，外围国家贸易条件将长期恶化，外围国家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利益。这一观点完全摒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

3. 新殖民依附模式

如果说，普雷维什的理论仍主要是从经济学和历史的角度的话，那么，随之而形成的“依附论”流派则是一个庞大的、在理论分析中掺杂着浓厚感情色彩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拉美知识分子集团——“觉醒的一代”。

他们从“历史—结构”的角度分析拉美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其批判力度是惊人的。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及理论有，巴西学者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鲁伊·马里尼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哈诺的边缘化理论，巴西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索·法莱托的依附性发展理论，巴西学者瓦西亚·班比拉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理论，等等。

新殖民依附模式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平等交换理论。

它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不平等交换直接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工资差别。低工资人为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贸易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变富，而是变穷。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只是对某些上层集团有利，而对经济发展不利。贸易加剧了国际二元性也拉大了国内阶级差别，罪魁祸首是经济殖民主义。

第二，外国资本的消极作用。

依附论认为，跨国公司向欠发达国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达到其全球战略目标，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外国资本与当地垄断资本结合起来牟取暴利，其结果只能使对外依附进一步加深。因此，如果大量

引进外资，并由外资提供技术，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

智利学者弗朗西斯科·恩西纳在《我国的经济劣势：其原因与后果》中大声疾呼：“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智利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掌握在智利人手中。可是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外国商业却窒息了我国在国外的商业主动精神，在国内，则把我们排除于国际贸易之外，取代了我国大部分的零售贸易……以及国家银行等等。”

第三，扭曲的消费模式的破坏性影响。

依附论认为，由于拉美国家盲目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造成消费和生产结构的扭曲。工业化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增加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需求基础之上，而面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大部分居民十分低下的收入水平使得新兴消费品工业的国内市场十分狭窄。所以，工业增长实际是依附靠高度集中的财富和收入来维持的。这种扭曲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对外经济关系不平衡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根源。

“新殖民依附模式”流派最响亮的号角是由多斯桑托斯吹响的。他慷慨激昂的论述响彻安第斯山区，回荡在亚马逊平原：

“不发达，并非构成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它被看作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和特定的形式……依附是一个条件作用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是以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为条件的。两个或更多经济之间或这些经济和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成为一种依附关系。这里，某些国家能够通过自我冲动得以扩展，而处于依附地位的其他国家只能根据面对支配地位国家扩张所作出的反应进行某种经济扩展。因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可以对依附国家的直接发展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在任何情况下，依附的基本状态是使这些国家既落后又受剥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对处于依附地位国家拥有技术、商业、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形式随特定历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们能够剥削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榨取这些国家所生产的部分剩余产品。因此，依附就建立在这样的国际分工基础上——这种国际分工能使某些国家的工业得到发展，同时限制某些国家的工业发展。”

拉美民族从这些先知们的呐喊中看到了希望，“走出依附、奔向独立”成为各国的共同呼声。各种肤色的人们，凭借着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漂洋过海的冒险精神，以双手创造美好世界的强烈愿望，以及对繁荣、富裕的追求，一往无前地走上了拉美式的发展道路。

二、安第斯山的崛起——第三条道路

拉丁美洲的经济起步时期，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白热化的年代。摆在拉美各国人民面前的无非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自由放任的，还是集权统制的；同时，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竞相在拉美展开政治与经济攻势。抱有强烈独立自主愿望的拉美国家始终以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发展的宗旨，正如普雷维什所说的，拉美的最终出路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是指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自由主义是指与政治自由紧密结合的经济自由。”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拉美国家迅速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发展战略。

（一）市场失灵与发展计划

从理论体系上看，以普雷维什为首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因而其主导思想必然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通过“斟酌使用”的宏观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使经济运行达到最佳状态。为了摆正政府的地位，发展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市场经济效果的大讨论。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市场是失灵的；既然是失灵的，就应该被抛弃。”

1. 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

敏感的拉美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矛头直指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有效和微观均衡理论。他们指出，市场经济只能使穷人越来越穷，穷国民不聊生，长期以来对市场的信奉已经使拉美到了社会极不公平，经济运行无效的崩溃边缘，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较为理性的学者则指出，拉美的市场处于组织结构和运行的不完善状态，在商品和要素市场上价格扭曲的存在通常意味着厂商和消费者对市场作出反应所依据的经济信息和经济刺激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那些产品、劳务和资源的实际成本。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市场和调整价格上起积极的作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将导致现有的和未来的资源不合理配置，或者至少会导致不能反映社会长期利益的分配。

到了1970年，市场失灵和经济计划化的观点流行一时，并写入了该年度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报告：“在工业扩张的过程中，政府不能也不应该仅仅起被动的作用。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本质的部分。因为市场本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结构僵化问题。目前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已被普遍认可。……在发展中国家，计划要比发达的市场经济更为可行和合理。更为可行是由于必须被考虑的变化因素非常少；更为合理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不发达的经济中，协调个体行动功能的自动机制与发达经济相比很少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由于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来保证个人的决策，能根据社会的偏好和经济目标，使经济成就最大化，所以计划就变得很必要……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它的不完善有时是因为理论上的设计与实际经济形势相脱节。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不能完全考虑到投资的外部效果。”

这一极具思辩性的政策和论述代表了当时的思想潮流，人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人们在呼唤权威。

2. “大推进”与资源优势

拉美经委会看到，资源不足（或称资源劣势）是拉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

题。资本、高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严重匮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这种资源约束又反过来造成国民收入水平低下和资本形成能力的进一步削弱。要打破这一僵化局面，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也就是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国家最适宜的地区大规模实行工业化，才能形成资源优势 and 良性循环。但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私人资本不足以承担诸如水电站、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以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

另一方面，拉美各国有限的资源经不起投机性的冒险，“要把财富用在刀刃上”成为各国发展的共识，大家看哼0，只有政府才有可能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合理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能。

3. 种族、民族与集团心理

拉丁美洲的种族、民族和社会阶层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西班牙、葡萄牙后裔，亚洲人，各部族的印第安人，以及黑人，共同组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的各个层面。且不论有没有“超阶级的政府”这个争论不休的命题，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贫民阶层的日益壮大和国内市场的日趋狭小，同样会给富裕阶层带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之，在市场交换被认为是“掠夺”和雇佣制度被斥为“剥削”的激进时代，政府领导人民开展消灭贫困、愚昧无知和疾病的努力，无疑会赢得各阶层的拥戴。因此，如果一个开明的政府能越过阶级、社会等级、种族和宗教集团之间的障碍而寻求广泛的支持，则它的经济计划在理论上是可以“共同追求广泛的物质和社会进步”的形式，来克服地方主义和保守势力等阻碍发展的力量的。因此，拉美的经济起飞大多是在“紧”的政论环境中进行的；甚至形成了一种“民主的悖论”：在阶层纷繁、矛盾尖锐的社会中，“民主”所带来的混乱和无秩序给经济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拉美诸多经济模式中一大特点就是军政府保驾下的经济增长。

4. 调控与国有化——政府行为的“双轨制”

在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担当着双重角色：所有者和管理者；因此，在经济领域中，政府以宏观调节国有企业投资和经营两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在拉美模式中，国家的调控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编制和监督执行国家、地区和产业发展计划来调节经济总量和结构。这类计划的目的涉及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方面，虽然仅对国有部门有约束力，但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安排、内部潜力挖掘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二，拉美各国基于承认私人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共识，通过税收、信贷、物价、外汇管理等政策来促使民族工业的发展，保护幼稚工业，加强进口替代。墨西哥、巴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都通过了向私人企业提供优惠的专门法律，以刺激私人资本创办新的制造业部门，或在传统的生产部门采用现代工艺、技术。政府还采用官方订货、低息贷款等方面资助本国制造商。

国家作为所有者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受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自三十年代大危机后，各国纷纷建立国有企业。五六十年代，受经济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学说的推动，国有企业戴上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光环，在活动范围、数目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国有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理论上市场失灵的部门，如提供公共品的邮电、供水、公共

运输和动力等；另一类是需投资量大，回收期长，一般私人资本无力承担的部门，如采矿、冶金、石油化学工业等。

国有企业的建立一般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通过国有化或本国化，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最著名的是 1934—1940 年间卡德纳斯政府的“墨西哥化”，规定在采矿、冶金、建筑材料等企业中国本资本应占 51% 以上，而外资不得超过 49%。1938 年，墨西哥将英、美、荷兰等国开办的 17 家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建立了该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墨西哥石油公司。60 至 70 年代，拉美的国有化运动进入高潮。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仅在 1970—1976 年间，被拉美国家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就有 163 家。

第二，投资大、见效慢、却有助于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企业，由政府直接投资创办。如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局，乌拉圭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智利石油公司、秘鲁矿业公司、电力公司和石油公司、哥斯达黎加炼油厂等。

第三，在本国私人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国有企业。这种形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将本国私人垄断资本收归国有——在国有化较为激进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将特鲁希略及其亲信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营糖业委员会；委内瑞拉政府没收了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家族的炼油厂、纺织厂、榨糖厂和海运公司以及种植园，改组为国有企业。其二，接管濒于破产的私人企业。六十年代，巴西接管了不少陷于困境的小企业，由国家经营；墨西哥政府则以收购经营不佳的私人企业股票，建立合资公司，成为“准国有企业”。

为了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各国先后成立了国营投资银行以融通资金。规模较大的有：阿根廷工业银行、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墨西哥国家金融公司、智利开发公司、哥伦比亚工业发展委员会等等。

国有企业在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二）进口替代战略与工业化进程

根据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国”理论，拉美国家要摆脱不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必须实行工业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是拉美发展战略的核心。拉美各国把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扔进了垃圾堆，从五十年代起大规模地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政策。各国以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来保护和扶植本国的制造业，以本国产品逐步取代进口产品，为最终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主要的政策手段是对替代进口的产业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抵制外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同时，以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合理调配资金。六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大国工业化的日趋成熟，它们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工业发展战略，引进外资和技术，利用国内劳动力和资源，奖出限入，使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得以立足。据统计，1965—1970 年，拉丁美洲制成品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近 17%，而到 1970—1975 年间，这一数字提高到了 20%。

自 1960 至 1980 的 20 年间，拉美的工业增长是神速的，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拉美工业总产值在 1960 年为 305 亿美元，1970 年为 569 亿美元，1980 年则增加到了 1014 亿美元。工业在 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31.7% 上升到 1980 年的 34.5%，而同期农业的比重则从 17.2% 下

降到 10.9%。从制造业的发展情况看，它在拉美地区 GDP 中所占的比重也从 1939 年的 16.5% 上升到 1950 年的 19%，1969 年的 20.7% 和 1980 年的 25%，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四分之三以上，并且提供了占全地区人口七分之一的就业机会。

拉美制造业的飞速增长是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的直接后果。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战后各主要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实施了不平衡增长的政策措施，以重工业为龙头，带动制造业的全面增长。六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的优先发展，基本消费品的自给问题得以解决。到七十年代中期，一般的生产资料也自给有余。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机电设备已行销世界各国。从 1950 年到 1975 年，拉美地区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9%，产量增长 5 倍。1975 年，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中，拉丁美洲占了 56%，居于领先地位。拉美制造业产值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60 年为 4.1%，1970 年为 4.2%，1975 年为 4.8%，1978 年增长到 5.5%。但是，拉丁美洲各国制造业发展很不平衡，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国制造业产值在 1976 年就已占各自 GDP 的四分之一以上，它们在全地区制造业中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70% 增加到 1980 年的 76.8%。另一方面，各国的工业制成品自给率可谓有天壤之别。

表 2 主要拉丁美洲国家工业自给指数

| 年份 | 1970 | 1975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
|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 | 0.28 | 0.23 | 0.33 | 0.30 | 0.36 | 0.69 | 0.72 |
| 国家 (LAFTA) | | | | | | | |
| 巴西 | 0.18 | 0.25 | 0.65 | 0.93 | 0.91 | 1.50 | 2.24 |
| 阿根廷 | 0.19 | 0.27 | 0.24 | 0.26 | 0.48 | 0.39 | 0.42 |
| 智利 | 1.48 | 1.33 | 0.91 | 0.87 | 0.91 | 1.34 | 0.91 |
| 墨西哥 | 0.23 | 0.22 | 0.16 | 0.11 | 0.18 | 0.81 | 0.66 |
| 秘鲁 | 0.70 | 0.21 | 0.72 | 0.28 | 0.48 | 0.48 | 0.61 |
| 哥伦比亚 | 0.09 | 0.25 | 0.23 | 0.21 | 0.19 | 0.15 | 0.17 |
| 委内瑞拉 | 0.02 | 0.02 | 0.07 | 0.07 | 0.06 | 0.13 | 0.19 |

注：1. 工业自给指数指制成品出口对制成品进口的比率

2. 资料来源：泛美开发银行

(三) 改造传统农业

拉丁美洲拥有广阔的草原、肥沃的火山土、丰沛的降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在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比例。小麦、甘蔗、香蕉、咖啡、可可等都是拉美的特色产品。战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而拉美的农业现代化步伐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快。从 1950 年至 1979 年期间，拉丁美洲农业灌溉面积增加一倍，拖拉机拥有量增加了六倍，化肥投入量增加了二十三倍，并利用生物技术，培育和推广了许多优良品种。到六十年代末，拉丁美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根据 1978 年的数字，拉美每千公顷耕地的拖拉机平均拥有量是非洲和远东平均水平的四倍。1950—1980 年，农业产值增长 1.5 倍以上，

年平均增长率为 3.3%。

但是，由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过分强调工业发展和减少对传统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依赖，忽视了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农业基础，因而农业长期处于相对欠发达的状态。

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拉美的农业发展战略与农业增长呈一种由“峰谷回升”的波动态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业仍是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拉美各国对农业生产基本上采取了促进和推动的政策。这十多年间，拉美地区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 3.5%。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各国纷纷实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许多国家农业生产出现较大的波动甚至停滞。由于政策倾斜，五分之一的国内外资金投放到城市工业上，农业投资不断下降。投资的失调导致产生的失调和收入分配的进一步不均，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拉美有十四个国家的农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增长率差距十分显著。素有“世界面包篮”之称的拉丁美洲自七十年代以来粮食进口量激增，1978 年粮食进口开支近 50 亿美元，1969 至 1978 年的 10 年间，拉美食品出口量增加了 38%，而进口量增加了 98%。发展战略抉择带来了城乡比例、工农比例和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比例的严重失调的负面效应。

第三阶段（七十年代中期—）拉美各国看到了片面强调工业化的危害性，纷纷重整河山，先后制定了新的农业发展政策。巴西在七十年代中期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把农牧业作为“经济的优先部门”，“拨付最大部分的支配资金”。墨西哥在 1977 年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动力”的发展方针，把农业提到与石油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 年，墨西哥政府颁布“墨西哥粮食体系”计划，提出了争取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也先后调整了农业发展政策，鼓励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总体而言，拉美各国的“新农业政策”主要包括：第一，继续推行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为辅的农业发展政策；第二，强调国家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与调节作用；第三，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实现多种经营，争取粮食自给，扩大农牧产品出口；第四，开展农业技术改革，培育农业科技人员；第五，吸收外资，为农业生产和农业开发建设提供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

（四）掌握命脉：能源发展战略

拉丁美洲能源丰富而地理分布十分不均。拉美能源消费的 80% 是石油和天然气，但只有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七国是石油净出口国；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的 80% 和产量的 75% 集中在墨西哥湾和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盆地。大多数拉美国家需进口石油，其中巴西一国进口量占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二。1972 年拉美进口石油支出 10 亿美元；经石油危机打击，拉美进口石油开支从 1973 年的 16 亿美元猛增至 1980 年的 180 亿美元。有理由认为，石油危机是拉美经济由盛转衰的契机，因此能源问题是拉美发展生死攸关的生命线。

在民族主义的经济思想影响下，拉美各国主张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绝对所有权，因而在国有化运动中，石油资源和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是最主要的内容。自玻利维亚在 1936 年把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在当地的产业收归国

有时起，此后的四十多年中，墨西哥、圭亚那、厄瓜多尔、牙买加、苏里南等国相继收回了外国企业的开采权。1976年，委内瑞拉一鸣惊人，全面实行石油国有化，征收了英、美等国所属的十九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回了它们所占据228万公顷的石油租让地。但是，由于技术、市场等因素的限制，拉美各国的石油工业在技术、管理、销售等环节上仍受到跨国石油企业的制约。

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各国适时地调整了能源开发与利用战略，采取了开源、节流以及多样化等多种能源政策。

首先，拉美各国大量投资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七十年代末，拉美各国对陆地和海上的石油勘探投资仅次于美国。同时，拉美国家制定了以限制交通运输为主的石油消费，因为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消费约占石油总消费量的一半以上。各国的政策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对汽油等轻油课以较高的税率，对用作热电厂燃料的重油消费则给予优惠税率；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在周末和晚间关闭加油站，限制或禁止高耗油汽车进口等强制手段；还有些国家则以提高石油价格来限制消费。通过这些节能措施，拉美地区液体燃料消费量的年增长率从1970—1973年的7.7%降低到1973—1978年的4.3%。

其次，能源的多样化开发战略降低了拉美各国对于石油的片面依赖。1980年12月，拉美22个国家的代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商讨制定拉美地区的能源开发计划。会议要求各国合理安排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开发常规和非常规能源，特别强调要利用好可再生能源。

在1960—1980年间，拉美大力开发水电资源，发电量由337亿千瓦时增加到2153亿千瓦时。在水力开发中，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纷纷携手合作，共同解决资金、技术难题，其中，由巴西和巴拉圭合建的矗立于巴拉那河上的伊泰普水电站堪称世界水电史上的一座丰碑。

同时，以煤代油、以核能代油的计划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都兴办了燃煤的大型热电厂。阿根廷则在核电建设事业中一马当先。1958年，阿根廷建成了拉美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1974年建成了拉美第一座核电站，此后又相继建成了第二座、第三座核电站，在70年代末，核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8%。“酒精计划”堪称巴西一绝。从1975年开始，巴西以甘蔗、高粱和木薯为原料生产燃料，替代汽油作为汽车燃料，1982年，酒精已替代了12%的汽油消费量。

（五）“内”与“外”之间的徘徊——对外经济政策

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史上，最让人捉摸不定的就是它的对外经济关系；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在此发生了“撞车”，经济的内向与外向成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

如前所述，著名的“普雷维什”命题促进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进口替代进程，从六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主要建立在发展民族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但是，发展民族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大部分国家显然没有能力承担要素的大规模供给，因此，只有从发达国家进口这一条路可走。无形中，拉美各国力图斩断的西方经济势力又被自己从门外恭恭敬敬地迎进了国家，经济命脉再次落入发达国家的掌握中。

尽管在经济民族化的进程中，各国纷纷对外国资本采取了极端措施，大量接管外国企业；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本国企业家未必能经营好这些企业，因此又提出了“外资有用论”的观点，认为只要由东道国掌握了监控的主动

权，利用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提供先进技术和管埋技能等。各国从七十年代初期起，逐步放宽了对外国资本进入的限制，于是外资再次汹涌而来。

表 3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单位：亿美元/年）

| 年份 | 1961—1965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 (平均) |
|-----|-----------|-----------|-----------|-----------|------|
| 流入量 | 3.30 | 7.26 | 17.12 | 37.10 | |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

在拉美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对外经济政策是最有争论的。引进外资不好，不引进又发展不了；出口受剥削，进口还受剥削；究竟该何去何从？拉美各国徘徊在十字路口上。

无论如何，拉美经济在六七十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口替代和经济民族化的成就是值得称道的。第一，拉美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成功，初级产品主导型经济逐步被制造业所取代，各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第三世界最为发达的地区。

第二，经济自主性大大加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各国工业的自我装备能力和供给能力增长很快。以钢铁工业为例，1950年拉美钢产量为130万吨，到1984年已增至3300万吨，并出口880万吨，创汇20亿美元。拉美的汽车工业发展也很快，巴西等国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出口汽车零部件，七十年代中期已能出口各类汽车。拉美的船只也远销欧、非各地。第三，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拉美各国实际总收入从1960年的1088亿美元增至1977年的约2840亿美元；总储蓄从1960年的314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约957亿美元。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拉美经济的黄金时代，它们的发展为全世界的落后国家编织起一个梦想——现代化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对于拥有三十三个主权国家和十二个地区的拉丁美洲来说，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人力素质的不同，虽然同样是工业化，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因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热托”与经济奇迹——巴西模式

1968—1974年，是所有巴西人为之骄傲的年代。这一期间，巴西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被世人称为“巴西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博克在《巴西：发展进程研究》一书中写道：

奇迹，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和已知的科学规律相违背的不寻常的事件，因而被认为应归因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当一位曾经在指导巴西经济发展的艰难尝试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前任财政部长，被问到巴西的经济奇迹，他以一种典型的巴西人所具有的幽默感和自豪感说到：“巴西的经济奇迹，正如我们后来所发现的，主要是由于马歇尔计划下的大量外援以及本国高度发展的科学和工业的基础设施。日本的经济奇迹则是由于较高的储蓄率，有良好纪律的和勤奋的劳动力，并有大量战后的外援。现在出现了巴西的经济奇迹。任何了解巴西和巴西的人必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的确，在这块“前途未卜的土地上”，并不借助于大量石油的发现和外国经济援助，突然出现了引入注目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纪录时，人们不得不惊呼——这就是“奇迹”！

在巴西奇迹出现的前前后后，众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研究奇迹的动因，殊途同归，焦点最后都集中到巴西最丰富的资源——“人力资本”上。巴西是幸运的。正如巴西人乐意承认的那样，上帝爱巴西人，他对巴西是仁慈的，他给了巴西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伴以可爱的蓝色海湾；他在山陵中埋下了黄金和蓝宝石，又在江河中撒下了钻石和黄金。他安排了免受飓风和地震袭击的气候，以及能生长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出来的果品的土壤。……然而，巴西人更乐意承认的是，“巴西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巴西人民。”

1. 民主与发展的交换

巴西的增长源于热情洋溢而又爱好和平的巴西人民。巴西人认为，他的秘密武器是“热托”（jeito），这一词在奇迹年代被广泛地使用，但在英语中还没有确切的对等词，其含义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任务或把事情办好的能力”。热托精神是巴西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其具体的体现就是：灵活地、富于创造性地去寻求完成目标的方法。巴西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为了发展，不惜一切。

（1）民主：自然与制度

民主源于阶层、民族和种族间的差别，正如有负才有正，有差别才有民主。巴西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自然，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统。巴西民族来自世界大种族，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欧洲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亚洲人（日本人）。正如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T·林恩·史密斯所指出的，与巴西这一真正的民族“熔炉”相比，美国只能称为“坩埚”。因为四百年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把这么多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容纳在一起，而彼此间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又这

样密切接触。

尽管人口构成如此复杂，巴西在统一文化方面还是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各种种族和国籍出身的全体巴西人中，存在着一种坚强深厚的感情，认为他们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情趣、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历史以及共同的幽默感。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哪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像巴西那样具有统一的宗教：有 92% 的巴西人信奉天主教，而这种教义掺杂了非洲、亚洲和各种思想。形形色色的传统经过独特的发展而熔铸成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

种族、阶级差别并不总意味着斗争，至少在巴西就是一个特例。尽管巴西的老观念依然存在：肤色越白阶级越高；但是政治斗争的温和性构成了几百年来巴西的社会特征，这在斗争激烈的拉丁美洲是独一无二的。巴西在政治稳健方面体现出了高明的技巧，部分是由于官继承了葡萄牙的传统，而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西班牙传统迥然不同。

也许巴西人天生民主意识薄弱，也许巴西人天性温和，但至少有一点是巴西人的共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只有稳定的政治才有增长的经济。

（2）发展：权衡与取舍

正如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巴西人历来宁可从不完善的但却是现实的办法中进行选择，而不愿追求理论上完善和理想的模式。因为他们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必须对发展模式进行权衡取舍。

众所周知，巴西经济奇迹始于军方政变。1961—1964 年，古拉特总统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由 10.3% 下降到 1.5%，通货膨胀率则激增至 144%。经济、政治局势混乱不堪。1964 年 3 月，军方在取得文职人员（如各大州州长）及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废黜了古拉特。

在布兰科元帅的领导下，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经济行动纲领”，到 1966 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 38%，经济增长恢复到 5.1%。

难怪大多数巴西人认为人民放弃一部分公民权和一部分政治权利是获取经济增长的一种有利的权衡取舍。

毕竟，发展是第一位的。

巴西奇迹 = 经济的激进性 + 政治的温和性。

2. 技术官员的崛起

由“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的“热托”哲学而产生的实用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人才战略成为支撑巴西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由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巴西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把知识界人士当作社会精华看待的传统。尽管受过系统而严格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仅占巴西人口的极小部分，但是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被授以公职。很多在军事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技术专家在巴西发展的方向、速度等关键性问题上发挥了主要作用。

巴西人一向认为，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步伐并不最终取决于它的资本或物质资源，而是取决于它的人力资源。正如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比森所看到的，“人力资源构成了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被动因素，人则是主动力量，他积累资本，开采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推进国家的发展。很明显，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使其

国民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中不能有效地利用，那么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得到发展。”

在人力资源决定论思想的指导下，巴西十分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

表 4 巴西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 年份 | 初等学校 | 中等学校 | 高等学校 |
|--------|------|------|------|
| 1960 年 | 95 | 11 | 2 |
| 1981 年 | 93 | 32 | 12 |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六十年代起，技术官员一直是主导巴西经济发展的“领路人”。即使在军政府期间，政策的制定都在经济学家、民族私人企业界人士、文职官员的共同支持下进行，因而军政府颁布的报刊检查、禁止政治集会、罢工，以及解散议会、政党等一系列法律都是为了给经济增长造就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遇到的社会阻力很小。这一期间，两位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经济学家、计划部长罗贝托·坎波斯和奥塔维奥·布良斯主持制定了 1964—1966 年“经济行动纲领”，以正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方法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他们选择的主要武器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和强制性工资限制，同时辅以货币政策和物价管制。这一计划使积累和收入向国家企业倾斜，为经济奇迹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空间。

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又就市场机制的建立、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表了足以影响全局的看法。1967 年 3 月，席尔瓦将军接替布兰科元帅担任总统，经济学教授、圣保罗州安东尼奥·德尔芬·内托出任财政部长，他被后人称为“奇迹之父”。在内托的经济政策中，充分体现了巴西人的“热托”哲学。他提出了“蛋糕理论”和“结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成为巴西模式的基础。所谓“蛋糕理论”即先增长后分配理论，它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经济增长”，“只有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分配。”“结的理论”即负债发展理论。它认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内积累不足，打开缺乏资金这个“结”，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使巴西经济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内托认为，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然的；因此，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由稳定转向高速增长。内托曾公开宣称，停滞比通货膨胀更可怕，1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负有一定的外债并不可怕，相反，合理地利用无异于“借鸡生蛋”。

从 1964 至 1974 这“发展的十年”来看，坎波斯和内托这两位技术官员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权力。有理由认为，在巴西的集权主义制度下，不允许国会参与决策，州长和大城市市长都由军方选定，因此这些文职技术专家无须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能够迅速得到政府的肯定和贯彻这些政策的充分支持。

3.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尽管巴西经济被人们公认为是资本主义式的，但是它的突出特点是政府承担经济与发展的主要责任。巴西人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加以指导的，而且利用市场规律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因此，巴西政府通过一系列管制、干预和鼓励措施，以财政和金融管理，在对市场作出指导和制定决策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1) 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与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巴西的经济计划是其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无论是文职官员还是军方领袖，都认识到一个大国发展过程中实施计划分配资源，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业化的必要性。巴西的经济奇迹共经历了三届政府：席尔瓦政府（1967—1969）、军事委员会（1969年8月—10月）和梅迪西政府（1969—1974）。这段时期，巴西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其间，累计经济增长78.5%，通货膨胀率由25.4%下降到15.1%，出口额增长2.29倍，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的计划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席尔瓦执政后，制定了1968—1970年经济发展计划。政府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巴西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型而主要是成本推进型，因此解决的方法不是压缩总需求而是不遗余力地提高总供给。巴西应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发展经济，增长优先于稳定。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有：鼓励银行信贷；推动民族私人资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金融财团的建立；颁布491号法令，规定出口产品免税额和出口补贴；建立价格委员会稳定价格。

军事委员会执政时期虽然短暂，却在巴西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政府行动基础和目标计划（1970—1971）”提出了向发达国家进军的口号。巴西政府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发达的沿海巴西”与“落后的内地巴西”之间的反差极为强烈，全国44%的人口集中在仅占全国领土面积的10，9%的东南部4个州，并拥有全国65%的国民收入。五十年代，库比契克政府曾为此而迁都位于中西部高原的巴西利亚，但地区差距仍然很大。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全国一体化计划（1970年1106号法令）和社会一体化计划（1970年12月），以政府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农业、交通运输建设，落实“土地再分配和鼓励北部、东北部工农业发展计划”，大力开发落后地区经济。

承袭军事委员会的经济计划，梅迪西执政后，制定了第一个全国发展计划（1972—1974）。该计划更加强调向发达国家进军的目标，实施以中心带动边缘的战略，以经济发达的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和米纳斯古拉斯州作为龙头，带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

历届政府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落后地区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扩大了国内市场，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另一方面，巴西政府在其宏观管理和干预中采取了更多的灵活性手段，大力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巴西的私人企业90%以上是雇员不足二十人的小企业，力量薄弱，在资金、技术、生产规模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巴西政府对私人企业一直是给予善意的支持和保护。巴西银行设有专门资助本国中小企业的开发局；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工业资助特别是不仅规定优先资助中小企业，而且对购买民族私人企业机器设备的厂商提供优惠贷款。

在国家的扶植下，巴西私人资本迅速扩张，市场范围也日益扩大。1973年，巴西私人企业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6%，超过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比重。

(2) 国有企业：经济推动力

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一直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巴西的经济奇迹阶段，国家资本企业进一步发展。1966—1976年间，巴西新建国有企业210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60%。这十年间，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在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5%左右，强大的国家资本力量是巴西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

1971 年，巴西最大的 25 家公司中有 17 家是国有企业，其资产总额占全部 25 家公司的 82%；迄至 1973 年，巴西最大的 1000 家公司中，国有企业拥有资产净值的 50%和销售总额的 17%。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主要是金融业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投资需求量大的部门。

第一，巴西政府控制了全国的银行业。政府拥有本国最大的银行——巴西银行的控股权。1972 年，巴西银行的存款额是本国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存款额的 9 倍。联邦政府还直接控制各大政策性银行，如巴西东北部银行、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全国住房建设银行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储蓄银行网。此外，巴西还有 32 家受州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

1972 年，整个金融系统给私营企业的贷款中，有 60%是由官方金融机构贷放的。到 1974 年，全国经济开发银行的全年贷款业务就达 13 亿美元，而同年全国住房建设银行的贷款额则接近 20 亿美元。

第二，巴西政府控制了钢铁工业。由于私人资本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提供钢铁工业在经济起飞时期所必需的投入，联邦政府就不得不成为新建钢铁企业的控股人。1971 年，国有钢铁公司的销售额占钢铁工业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其资产额占行业总资产的四分之三。此后，政府又投资创办了包括全国钢铁公司、圣保罗钢铁公司和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公司在内的巴西钢铁公司，国家在钢铁工业方面的控制权进一步得以加强。

第三，采掘业的民族主义色彩十分浓厚。成立于 1942 年的多西河谷公司是一家集铁矿、铝矾土开采，铝和钢制品生产于一体的国有企业。出于保护本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目的是，政府通过多西河谷公司垄断了本国的矿产开发。1974 年，多西河谷公司出口了价值四亿五千万美元的铁矿石，占巴西铁矿石出口的 75%以上。

第四，政府对石油开采和加工实施了垄断政策。巴西石油公司是巴西最大的企业，它完全垄断了石油勘探并几乎垄断了石油化工业。据美国《幸福》杂志的评定，1990 年巴西石油公司名列世界 100 家最大工业企业的第 52 位，当年资产总额为 71.3 亿美元，雇员达 5.9 万人，销售额为 165 亿美元。

巴西石油公司与世界老牌大石油公司，如埃索石油公司（ESSO）、英荷壳牌石油公司（Shell）、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Richfield）、德士古公司（Jexaco）展开竞争。1971 年，巴西石油公司占据了总销售额的 41%，拥有石油勘探、提炼和市场营销方面的资产总值的 81%。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奇迹时代也就是巴西国有企业的兴旺发达时期。此间巴西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运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诚然，国有企业虽然有国家财政的强有力支援，但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也是一切信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所普遍持有的观点。但是，一连串的数字可以说明巴西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例如在 1974 年，多西河谷公司六亿五千万美元的销售额中，纯利竟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在证券交易所中，许多巴西政府控股的企业——巴西银行、巴西石油公司以及巴西全国钢铁公司——的股票都成了投资者眼中的“热门股票”。

有理由认为，巴西国有企业的高效率来自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巴西的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愿意任用三十多岁的青年技术专家担任办公司的负责人，

并不惜工本培训公司员工。如巴西石油公司成立不久就聘用了美国大石油公司的第一流的地质学家，所付的薪金在当时看来是大得惊人。

(3) 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品供给

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看，交通运输、电力、通讯和科技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因而一般私人资本不愿承担这些产业的开发，政府便责无旁贷地成为这些公共部门的供给者。根据耶鲁大学教授赫希曼的观点，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瓶颈”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只有突破这一瓶颈，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据统计，政府支出份额占 GDP 的比重从 1957 年的 17% 扩大到七十年代初期的大约 30%，这样高比率的政府开支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上。

A. “公路时代”与交通运输建设

军政府提出了公路一体化计划，把公路建设作为交通运输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时期，巴西重点修建了三大公路体系：一是开辟通往内地新垦殖区的公路干线；二是修建通往边境城镇国际公路干线；三是连接各州首府和重要城市的州际公路干线。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巴西建成了东北州际公路、贯通南北的贝伦—巴西利亚公路、库亚巴—圣塔伦—布朗库公路，以及横贯东西的亚马孙大公路，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巴西的“公路时代”。

表 5 巴西的公路网 (单位：公里)

| 年份 | 已铺路面公路 | 未铺路面公路 | 总计 |
|------|--------|---------|---------|
| 1955 | 3.133 | 74.165 | 77.298 |
| 1965 | 26.546 | 109.192 | 135.738 |
| 1973 | 67.607 | 143.909 | 211.516 |

资料来源：巴西全国公路局

巴西大力发展了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业，从 1967 年至 1974 年，巴西远洋商船队的总吨位增长到 5 倍，铁路运输量也大为增加。

(B) 电力：实用主义的典范

直至六十年代初期，巴西的电力工业一直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两家公司垄断。巴西并没有简单地实行国有化，而是实行了政府与外商的联合经营，结果却是卓有成效的。从 1962 年至 1971 年，国有的巴西电力公司发电能力比重从 36% 上升到 45% 的用电量。

(C) 电讯业的大规模发展

电讯业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部门，巴西的国有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有绝对优势，1965 年，巴西电信公司成立，揭示了电讯产业民族化的序幕。自从 1969 年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开始到 1974 年，巴西基本建成了卫星通讯体系；1970 年，圣保罗建成了长途直拨电话系统；1974 年全国建成电传网，电传站达 1.13 万个，比 1968 年增加 15 倍。

现代化的通讯系统为现代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迅速、及时的信息服

(D) 科学与技术：投资保障

巴西政府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在科技上独立自主的重要性。1973 年 7 月，政府批准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本计划”，每年预算三亿美元，高于七十年代联合国每年对世界各国的技术援助总额。

这一计划的纲要如下：

- 第一，发展核能源和海洋技术，并促进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 第二，加强企业吸收技术的能力；
- 第三，建立全国科技的情报系统，以巩固各研究机构的相互支援制度；
- 第四，促进“产学结合”。

4. 负债发展战略

根据 1978 年巴西计划部提交的报告，从 1964 年起，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投资款项的源泉，就成为巴西经济模式的重要特点。军政府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1968—1974 年，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 27.87 亿美元，为 1964 年以前流入巴西的外资总额的 1.73 倍，其中四分之三集中于制造业。

奇迹期间，借贷资本成为巴西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1975 年借贷资本额比风险资本（直接投资）高 1.4 倍。另一方面，借款渠道由官方借贷为主转为私人贷款为主。基于巴西人的“热托”思想和“蛋糕理论”，以外债促发展成为主导性发展理论。1968—1978 年，巴西外债总额由 33.72 亿美元上升到 435.11 亿美元，增长了 10.9 倍。外债总额占 GDP 的比重由 11.4% 上升到 22.8%，外债本息占商品劳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33% 上升到 63%，这一期间，欧洲货币市场私人银行贷款比重由 28.6% 上升到 60% 以上。这一结构变化的意义在于巴西可以摆脱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种种约束，自由地借入资金，用于发展计划内的任何项目。

可以说，国外的资金是巴西经济奇迹的重要基石。尽管二十年后的人们对此有种种非议，但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只有大量吸收国外的资金，才能动员起巴西的人力、物力，造就巴西的经济奇迹。

（二）从专制到自由——原西属殖民地和发展模式

1. 阿根廷：独立的价值 = ？

从 1946—1976 年是庇隆主义统治阿根廷的三十年。庇隆执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正义主义”治国论，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大口号，庇隆把经济独立视为实现政治主权和社会正义的基石。利用阿根廷独立一百三十一周年的时机，庇隆政府专门发表了一篇《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庄严声明：“阿根廷人民的坚定目标是取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就意味着打碎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枷锁”，实现经济的“阿根廷化”。可见，经济独立是庇隆政府在经济上追求的战略目标。

庇隆政府主要的政策措施和听取得的经济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作用。庇隆就任总统后不久，就采取了赎买外国资本的重大行动。1946 年，庇隆以 1.5 亿英镑赎买英国资本的 24,000 公里铁路，以 1,100 万英镑赎买法资铁路，以 3.19 亿比索赎买了美资电话公司。在五十年代，即使在阿根廷经济严重恶化，急需外资补充本国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阿根廷人也表现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精神，显然不同于巴西的实用主义哲学。从 1945 年到 1955 年，外国资本从 42.6 亿美元下降为 18.6 亿美元，占国内固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 15.4% 下降为 5.1%，外资企业汇出利润从 2.53 亿美元下降到 1700 万美元。

第二，加强国家资本和政府经济生活的干预。庇隆大力兴办国有企业，由国家直接掌握命脉部门和重要资源。阿根廷现有的国有企业，如阿根廷航空公司、水利电力公司、阿根廷钢铁合营公司、国营石油矿藏管理局等，大多是由庇隆一手创办的。庇隆政府以政策、法律和财政手段大力干预经济。

主要措施有：成立阿根廷贸易促进会，负责农产品购销；改组国家银行，进行有力的金融调控；控制物价、提高工资、促进社会公平化。

这段时期，阿根廷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本国资本额从 1945 年的 233.94 亿美元增加至 1955 年的 349.24 亿美元，增幅为 49.3%。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获得发展，使阿根廷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加速工业化进程。庇隆政府于 1946 年 10 月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是发展内需为主的工业部门，规定在五年内投资 66.63 亿比索，进口两万套工业设备。

1945—1955 年，阿根廷 GDP 由 55.38 亿比索增长到 79.95 亿比索，增长了 44.4%；同期的制造业产值从 12.63 亿比索增至 23.33 亿比索，增幅为 84.7%，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45 年的 22.8% 提高到 1955 年的 29.2%，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1976 年 3 月，阿根廷武装部队发动政变，陆军司令魏地拉出任总统，以“恢复、调整、发展”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任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马丁内斯·德奥斯为经济部长。德奥斯一反庇隆主义思想，认为七十年代阿根廷经济“滞胀”的根源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太多和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因而他提出了“回到市场经济”的口号，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私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动力”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企业间的自由竞争。

魏地拉政府的经济措施有：（1）国有企业私有化；（2）减少国家干预；（3）削减公共开支；（4）鼓励出口，实行自由贸易政策；（5）对外国资本全面开放；等等。

自由主义政策在 1976—1979 年间带来了阿根廷的经济繁荣。（1）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外汇储蓄在 1979 年达到 104.8 亿美元；（2）财政赤字从 1975 年占 GDP 的 12.5% 下降到 1978 年的 2%；（3）通货膨胀率从 1976 年的 499% 下降到 1978 年的 75%；（4）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繁荣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危机却是毁灭性的。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自由主义政策使民族工业遭到外国资本的强烈冲击，制造业增长；外债从 1975 年的 60.26 亿美元激增至 1981 年的 356.71 亿美元；国内市场萎缩，失业率急剧上升；金融市场极度混乱；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率到 1981 年增至 42.9%；通货膨胀率到 1981 年又回到三位数（109.6%）。

阿根廷经济在风雨飘摇中进入了八十年代……

2. 墨西哥：“稳定发展”、“分享发展”和“石油发展”

墨西哥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发展史，是对自由模式和干预的不断选择过程。

（1）“稳定发展”战略：自由+干预

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墨西哥采取了适度的经济自由与适度的国家干预双管齐下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墨西哥奇迹”。

在此期间，墨西哥一方面在基础产业领域大规模进行国有化，另一方面又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新兴工业部门；一方面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励外国资本投资于本国制造业。

在农业中，墨西哥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力图建立现代化大农业；推行农业技术进行“绿色革命”；积极发展出口农业。

稳定发展战略的成效是显著的，1955—1970 年，经济保持了稳定、高速

的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为 6.5%，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19.2% 上升到 1970 年的 23.3%，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自给能力大大提高，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 1955 年的 7% 上升到 1970 年的 24.3%。粮食产量由 1950 年的 414.6 万吨增至 1970 年的 1258.4 万吨，墨西哥由粮食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2）“分享发展”战略：民族主义道路

鉴于稳定发展战略带来的对外资的依赖加深、国内贫富分化等问题，1970 年埃切维里亚政府执政后，提出了“分享发展”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加强国家干预；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实现非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在保持经济效率的同时力求平等的发展。

埃切维里亚政府大幅度提高公共开支，发展基础工业、农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改革财税制度，力求税率公平；调整工业结构，在基础产业中实行“墨西哥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大学和技术学校。

“分享战略”实施的最初几年，确实带来了经济增氏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双丰收”，1970...1975 年，GDP 年均增长 5.7%，经济结构进一步 4 步完善，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分配逐步平等化，但是，过大的公共开支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外债也在五年内增加了六倍，普通群众的新增收入也被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所抵销。

墨西哥陷于经济瘫痪和社会动荡之中。

3. “石油发展”战略：新一轮自由主义

1976 年 12 月，洛佩斯·波蒂略执政，为了克服危机，再次实行了较为宽松和开放的经济政策，迅速地恢复了墨西哥经济。

波蒂略总统在 1977 年 9 月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墨西哥在最近几年将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碳氢化合物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石油发展将有力地支持工业的发展并保证使国家的经济独立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波蒂略政府的《全面发展》计划提出以石油出口提供的资金发展钢铁、石化、电力和机器制造等部门，以实现进口替代。波蒂略政府还提出了改革农业结构、鼓励外国投资的经济战略，充分体现了指导思想的灵活性。

从 1978 年至 1981 年，墨西哥出现了以“石油繁荣”为特点的经济高涨时期，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8.3%。1982 年，墨西哥石油出口的收入达 140 亿美元。石油收入成为其他产业的重要投入，此间钢铁、化肥、石化和电力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失业率从 8.1% 降至 4.5%，居民收入也稳步提高。

但是，从 1982 年 4 月起，墨西哥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经济增长率为—0.2%，失业人数超过 1000 万，物价上涨率高达 98.8%，外债总额达 850 亿美元，仅当年还本付息就需 158 亿美元。其根源在于墨西哥经济对于石油出口的过分依赖，1981 年国际市场石油供过于求，价格连续下跌使墨西哥经济全面陷于困境。

墨西哥从一种“单一经济”中走出来，又回到了另一种“单一经济”的轨道上，其经济失败是不是一种历史无奈的嘲弄呢？

自由、统制；内需、外向；独立、开放……难道拉丁美洲永远也走不出发展的怪圈吗？

四、危机与再抉择

（一）危机：失去的十年

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之后，拉美经济陷入一系列深刻而尖锐的经济矛盾之中，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地区发展、贫富差距等社会与经济问题在八十年代同时爆发，使拉美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整个八十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评论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贫困的根源时，都爱借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拉丁美洲各国在八十年代却陷入了同一种困境——经济停滞、恶性通胀、债台高筑、投资锐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社会内聚力，以及由于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经济政策便缺乏一种连续性，拉美的经济进程一直处于忽左忽右的摇摆之中，发展所遇到的社会阻力断送了一切经济增长进程。

1. 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1950—1980 的三十年间，拉美地区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5.6%，而 1980—1989 年急剧下降到 1.1%。从 GDP 的总量来看，1960—1970 年累计增长 100.8%，1970—1980 年增长了 72%，而 1980—1988 年仅增长 11.66%。从人均 GDP 的角度看，六十和七十年代，拉美地区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8% 和 3.0%，而 1980—1988 年为—0.8%。1990 年的人均产值下降到了 1976 年的水平。1989 年和 1990 年，拉美地区 GDP 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为—1.5% 和—0.5%。一个地区的经济整整十年未能摆脱停滞和衰退实属罕见。

2. 通货膨胀居高难下

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美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由 1980 年的 56% 上升到 1990 年的 1491%。许多国家由于财政赤字严重，滥发货币，造成四位数、甚至五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1985 年，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创 23000% 的纪录，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破坏。此后在巴西、秘鲁、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等国也相继出现了四位数的通货膨胀，就是素以货币稳定著称的墨西哥，1987 年的通货膨胀率也创该国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160% 部分国家通过压缩公共部门的开支，整顿国有企业，控制货币发行量等各种措施，制止了通货膨胀，如玻利维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但是仍有许多国家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之中。1990 年，尼加拉瓜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8500%；其次是秘鲁，为 8291%；巴西居第三位，达到 2359%；阿根廷居第四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经济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资本大量外逸，社会矛盾激化。

3. 债务负担沉重，资金大量外流

债务问题是八十年代拉美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1982—1989 年，拉美国家以偿付外债的形式向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资金已接近 2500 亿美元，而本地区的外债总额仍不断上升，1989 年达到 4159 亿美元，比 1982 年增加了 1000 亿美元，相当于拉美各国当年出口总额的 300% 和地区 GUP 的 51%。在大量资金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外流的同时，拉美国家难以得到新的贷款，因而出现严重的资金往外流的现象，平均每年净外流的资金达 250 亿美元。

4. 投资大幅度下降

七十年代，拉美地区的投资额约占当年 GDP 的 22—25%。八十年代，在

债务重负下，拉美各国资金短缺，普遍采取了紧缩政策，从而导致投资的急剧下降。1980—1988年，拉美地区投资占GDP的比例平均为18%，投资的下降使拉美技术更新停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据统计，1982—1988年，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巴拉圭对资本品的需求减少了60%，巴西减少了55%。1989年拉美国家实际工业生产能力比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减少了15%，有些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的倾向。拉美地区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34.6%下降到1986年的32.6%。

5. 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减少

1980—1988年，拉美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减少了2983.9亿美元，其中出口减少了554亿美元，进口减少了2429.9亿美元。拉美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拉美国家的出口受到严重阻碍，在出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还债，拉美国家只有压缩进口。

6.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90年拉美地区人均消费水平比1980年下降了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八十年代的1.1亿上升到1989年的1.6亿。失业和半失业遍及所有国家。由于物价上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如墨西哥等国八十年代末工人的工资购买力仅为八十年代的50%。由于压缩公共开支，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险的预算减少，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深刻的危机使拉美各国政界和经济学界人士认识到，危机不仅仅是由于某些政策失误引起的，而是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因此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更新思想，寻找恢复经济发展的出路。

（二）再抉择：重振雄风之路

1983年5月，拉美经委会和拉美经济体系受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的委托，提出了《拉丁美洲对付危机的基础》一文，指出“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拉丁美洲结构的脆弱性，对外部因素危险的依赖性”，建议拉美各国改变战略，共同对付危机。

1983年8月，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政界、经济学界人士在玻利维亚集合，发表了《圣克鲁斯声明》，主张建立拉丁美洲新的发展模式。

1987年11月，拉美八国首脑会议确定了拉美发展的“国际化”、“自由化”战略。

在新的历史时期，拉美地区在发展战略的抉择上逐步形成了一致看法。

第一，注重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一致；

第二，注重效率与平等的一致；

第三，注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经济国际化、开放性的一致。

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拉美新一代领导人，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阿根廷的梅内姆、秘鲁的藤森，智利的艾尔文等，都先后领导拉美国家进行艰难的改革，向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迈进。

1. 甩掉包袱，轻装前进——国有企业改革

如果说，在拉美发展初期，国有企业起到了弥补私人资本不足、维护民族权益、扩大就业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进入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日益成为拉美各国的沉重包袱。

七十年代中期，拉美七大国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约占GDP的1%，八十年代初上升到4%。1985年玻利维亚矿业公司亏损了2.5亿美元；1992年巴

西石油公司亏损 2.4 亿美元。国有企业在政府批准下大量举借外债，到 1990 年，国有企业外债高达 1000 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外债额的四分之一。

自七十年代智利率先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来，至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高潮。

(1) 为国有企业确定明确的单一目标和任务。长期以来，拉美各国政府常常赋予国有企业以艰巨的多重性任务，例如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加快落后地区开发，扩大国内市场购买力……多重任务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企业效益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

墨西哥政府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了国有企业的单一目标。如全国人民食品供应公司以“可行的价格”提供基本食品为主要任务；联邦电力委员会的任务是以低于市场价格向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电力。对于其他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盈利目标是第一位的。

目前，大多数拉美国家正在步墨西哥的后尘，削减互相矛盾的多重企业目标。

(2) 重新界定战略要害部门的范围。为了引入市场机制，增强经济活力，拉美国家重新定义了原来不准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涉足的战略部门。七十年代智利军政府修改了前政府对要害部门的定义，八十年代进一步缩小其范围。1983 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缩小了战略要害部门的范围，使政府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避免对改革的掣肘。阿根廷于 1989 年颁布的《国家改革法》没有界定战略部门的范围，表现了它全面私有化的决心。

(3) 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智利和墨西哥先后取消国有企业的税收优惠；1988 年墨西哥取消了国有企业优先使用本国产品的保护性规定；1989 年，阿根廷也取消了优先购买国产货的所谓“购买阿根廷”的规定。

(4) 调整国有企业产品价格。长期以来，拉美各国出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直压低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不仅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收入而且浪费了资源。在改革中，力求以市场供求来确定国有企业产品价格。例如，阿根廷于 1991 年将部分石油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国际水平，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量完全由市场调节；1983—1988 年，墨西哥国有企业产品和劳务价格上涨幅度甚至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上升幅度。

(5) 强化经营管理。为了克服企业管理不善的弊端，一些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控制国有企业的借贷规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第二，增强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例如墨西哥、阿根廷和圭亚那等国纷纷建立企业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第三，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董事会”，使其成为国有企业和中央政府机构之间的“缓冲器”；第四，以承包、租赁等形式，国家保留所有权，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和管理。如尼加拉瓜的国有汽车公司、牙买加的部分旅游设施、墨西哥的几个港口以及阿根廷的一些高速公路，都采取了这种形式；第五，裁减雇员。

(6) 私有化。自八十年代末以来，私有化成为拉美各国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拉美的私有化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第一，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墨西哥的国营电话公司和牙买加的国民商业银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私有化的。第二，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向本企业雇员转让股权。智利国营电脑公司和国营发电厂的全部股权都卖给了雇员；墨西哥纺织业中 90% 的国有企业也卖给本企业雇员或工会组织。第三，债务与股权互换。智利的化学和矿业公司就是以这种形式卖给日本和美国投资者的。

阿根廷甚至在 1989 年的《国家改革法》中专门为外国资本以此形式参与私有化进程作出了明确规定。第四，将一些收归国有的中心企业所有权无偿地归还原主人。智利军政权在 1974—1975 年间把阿连德政府收归国有的 241 家企业退给原主。尼加拉瓜的 3 家国有糖厂也以此方式实现私有化。

(7) 关闭已经丧失生存能力的企业。秘鲁、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断然采取了这种方式；其中智利在 1974—1975 年期间关闭了 50 家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

拉美各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积极的效果。由于加强经营管理和调整产品价格。一些国有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例如，智利最大的 6 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数(1975 年 = 100)从 1976—1980 年的 129.4 上升到 1983—1988 年的 21。1970—1973 年，这些企业的亏损额占 GDP 的 6.7%；1983—1988 年，其年均盈余额占 GDP 的 9.6%。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秘鲁也收到了类似的效果。私有化也有利于吸收外国资金，减轻了债务负担。墨西哥国营电话公司的私有化使国家获得了 30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阿根廷国营航空公司和国营电话公司的私有化使国家减少了 70 亿美元的外债，约占阿根廷债务总额的 10%，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调动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了经济效率。

但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副作用。大量裁员使拉美的失业大军持续扩大，贫困阶层也随之膨胀。例如，阿根廷的国家卫生工程管理局的私有化使三分之一的雇员被解雇，而政府又找不到及时安置工人的有效办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样，在智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占 40%；在墨西哥，约占 50%，这些都是国有企业裁员的直接后果。

2. 走出温室——贸易自由化

进入八十年代，拉美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根本方针的进口替代战略。巴西《阅读》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五十年代初，政府建造了一种使巴西企业能够生长发育的温室，使巴西企业不被外国竞争所扼杀。为了建造这个温室，政府采取了税收鼓励、补贴、保留市场和严格控制进口等措施。过去几十年，这是个合理的模式。但是，今天的世界经济正按照与四十年前不同的方式发展，补贴、鼓励和关税壁垒等过时的措施对部分企业仍有帮助，但对整个企业界是有害的。有竞争激烈和讲究效益的外部世界，人们努力实现各国经济之间的分工合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掉保护主义的玻璃罩，又不使巴西工业由于气候变化而中毒死亡。”这段话确切地说明了当前拉美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拉美民族工业陷入了成本高、质量差，缺乏竞争力的困境。六十年代，拉美国家与亚洲四小龙的出口能力基本相仿，到了八十年代，差距已十分显著。

表 6 拉美与亚洲几个国家人均制成品出口值比较

| 年份 | 阿根廷 | 巴西 | 智利 | 墨西哥 | 乌拉圭 | 韩国 | 新加坡 |
|------|------|----|----|-----|-----|----|-----|
| 1960 | 4 | | 1 | 5 | 4 | 5 | 5 |
| 1983 | 44 | 43 | | 68 | 30 | 33 | 99 |
| 556 | 2415 | | | | | | |

资料来源：贝拉·巴拉萨《拉丁美洲正走向恢复经济增长》

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拉美各国都开始了贸易自由化的努力。

(1) 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1982年，墨西哥11000多种进口商品中有8100多种要申请进口许可证，而到1989年，98%的商品已实行自由进口。哥伦比亚则从1990年9月起取消了几几乎所有的商品进口限制；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2) 废除或减少出口补贴。墨西哥、阿根廷在八十年代曾实行的每年数亿美元的出口补贴基本上得以取消。

(3) 降低关税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各国的关税壁垒普遍得以减弱。

表7 部分拉美国家的关税税率(%)

| | 最高关税税率 | | 平均关税税率 | |
|-------|--------|-------|--------|-------|
| | 八十年代 | 1992年 | 八十年代 | 1992年 |
| 阿根廷 | 65 | 30 | 39 | 15 |
| 玻利维亚 | 150 | 10 | 12 | 7 |
| 巴西 | 105 | 35 | 32 | 21 |
| 哥伦比亚 | 100 | 20 | 44 | 12 |
| 哥斯达黎加 | 100 | 27 | 27 | 20 |
| 智利 | 220 | 10 | 94 | 10 |
| 墨西哥 | 100 | 20 | 24 | 12 |
| 秘鲁 | 108 | 25 | 66 | 18 |
| 委内瑞拉 | 135 | 20 | 35 | 10 |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

拉美主要国家的关税税率普遍降低一半以上，贸易自由度大大加强。

(4) 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本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第一，许多拉美国家采用了“以进养出”的策略，为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进口投入。为了降低进口投入的成本，各国向出口企业提供了不同的税收优惠。阿根廷允许出口企业以2%的关税税率进口所需的投入；牙买加则制定了企业出口退税计划；墨西哥的出口企业能享受免税进口相当比例的原料和设备。第二，改善出口部门的基础设施，及时向出口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信息，帮助出口企业加强营销和管理以及提高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例如，巴西政府在1991年启用了—个电脑系统，以取代出口企业在中央银行、政府贸易办公室和外汇银行等部门中办理的26道繁杂的公文手续。

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带来了结构优化和经济扩张的转机。1986—1987年，墨西哥制成品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40%，石油出口的比重已由1982年的75%下降到1989年的30%，而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由16%上升到56%。1982—1989年，虽然进口税收下降了，但财政赤字却也从占GDP的8%降至6%，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因此，正如巴西前总统科洛尔指出的，“拉丁美洲不能背着19世纪的结构和思想方法的重担，为进入21世纪作准备”。

表8 拉美经济开放度比较(%)

| | 贸易自由化前 | | 贸易自由化后 | |
|------|--------|------|--------|------|
| | 年份 | 开放度 | 年份 | 开放度 |
| 阿根廷 | 1987 | 38.6 | 1991 | 54.3 |
| 玻利维亚 | 1985 | 57.5 | 1991 | 84.0 |
| 巴西 | 1987 | 21.2 | 1992 | 25.3 |
| 智利 | 1984 | 45.0 | 1991 | 56.3 |
| 哥伦比亚 | 1984 | 28.2 | 1992 | 32.7 |

| | | | | |
|-------|------|------|------|------|
| 哥斯达黎加 | 1985 | 58.7 | 1992 | 79.0 |
| 墨西哥 | 19s5 | 22.6 | 1990 | 34.3 |
| 巴拉圭 | 1988 | 51.0 | 1991 | 63.1 |
| 秘鲁 | 1988 | 30.4 | 1992 | 41.6 |
| 乌拉圭 | 1987 | 38.0 | 1992 | 45.1 |
| 委内瑞拉 | 1989 | 49.3 | 1991 | 53.3 |

注：1. 经济开放度是进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可见，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成为拉美发展的总趋势。

“拉美需要世界、世界需要拉美”，是拉美各国的共同呼声。

3. 从“社会计划”到“民众经济”——向贫穷开战世界进入九十年代，然而贫穷却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仍然紧紧地缠绕着拉丁美洲的躯体。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拉美地区也许并不是世界最穷的地方，但却是世界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拉美社会动荡、经济无持续增长力的根源。据世界银行《1992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拉丁美洲当年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 1979 年的水平。占人口 20% 的富裕人口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由 1980 年的 51% 进一步上升到 1991 年的 66%。1980 年，拉美的贫穷人口为 1.36 亿，占总人口的 41%；而赤贫人口为 6240 万，占总人口的 19%。而到了 1991 年，贫穷人口增至 1.95 亿，占总人口的 43%；另有 1 亿人落入了赤贫的深渊，占总人口的 22%。随着近年来拉美的城市化，城市贫困人口的比重由八十年代的 30% 剧增至八十年代末的 36%；农村仍然是赤贫人口的集中地，农村赤贫人口从八十年代的 13% 激增至八十年代末的 37%。

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逐步尖锐的社会矛盾，以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拉美经委会又指出了一国内部的“中心—边缘”学说。拉美经委会指出，在拉丁美洲社会中出现了被排除于社会发展进程之外的“边缘人”，他们是城市贫民和农村少地或无地农民。他们在经济上贫穷，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社会、文化中处于隔离或半隔离状态，整个社会处于“边缘贫困化”状态中。

伴随着八十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崩溃、债务危机和国有企业裁员、城乡失业人口激增。1992 年，委内瑞拉有 50% 的人口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阿根廷的失业大军达 100 多万人，秘鲁的失业人口达 30 万，社会革命一触即发。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拉美各国的贫穷问题，1990 年，拉美经委会发表了题为《生产改造与公平相结合》的报告，指出“本地区生产结构的变革应在社会公正不断强化的框架内进行”，主张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生产变革的同时，要注意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要将“边缘人”吸收到生产活动中来，让他们融汇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进程，彻底变革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

（1）社会计划：成功与失败

在这一关系到国家存亡绝续的关键问题上，各国政府是不敢有丝毫疏忽的。对于长期以来影响国内市场扩大和政局稳定的贫困问题，拉美各国领导人是有切肤之痛的。到了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痛下决心，纷纷制定“社会计划”，用以偿还国家对贫穷人口拖欠已久的“社会债务”，力图解决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宣布调整经济政策，修改宪法，稳定主要食品和药品价。巴西则制定了“补偿性社会计划”，实行基本食品配额制，创造就业机会，建造居民住房。阿根廷实施“社会计划”，提高工人工资，

保护失业者，改善医疗条件，实行食品和住房救济。玻利维亚明确地提出了“偿还社会债务”的口号，计划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改善民众生活。墨西哥政府则制定了“全国互助计划”，旨在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贫穷状况。

但是，拉美的贫困人民在战后四十年发展中早已总结出了自己的生存经验——力量薄弱的政府是无力真正解决贫穷这一社会顽疾的，公共支出在林立的“贫民窟”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要想摆脱贫困，只有自己救自己。“自我雇佣”、自立谋生成为拉美社会经济中的一大“奇观”。

（2）民众经济：发展与壮大

在日益贫困的情况下，“边缘人”为了生存，自发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他们在城市街头摆摊设点，提供各种手工服务，还开展建筑、运输等业务，拉美的民众经济模式由此产生。

所谓民众经济就是非正规经济，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微型企业、“非正规”活动（流动小贩、个体工匠）和合作企业（由“边缘人”自行组织、经营的企业）。它们一般以家庭或非正式的合伙方式为基础，业务多样，范围很广，遍及零售、维修、运输、改装、装配等各行业。目前，民众经济已不再是单纯的独立行动了，而是形成网络，从事产、供、销一体化的活动，甚至包括了本地区的国际贸易；民众经济正在谋求与国家现代经济接轨，汇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进程。

拉美各国的民众经济，调动了民间储蓄，进行了有效的投资；并且，这类产业所需资金少，要求技能低，从而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赤贫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外，民众经济在活跃经济、促进流通、繁荣市场、增加国内储蓄和地方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因而有人称之为“新型的人民资本主义”。

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消除贫困的地区性计划”统计，1980—1987年，拉美国家拥有5名以下雇员的微型企业就业量增加了47.8%；有5—10名雇员的企业就业量增加了77.8%；与之相比，同期国有企业就业量只增加了17.1%，而大型私营企业就业量只增加了4.8%。可见，在拉美经济最沉闷的年代、民众经济的兴起，无疑给乌云密布的黑夜缀上了一两颗明星。

然而，拉美各国治理贫困的道路绝非坦途，种种危机一触即发。

（3）恰帕斯危机的启示

在拉美各国中，墨西哥是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相对开放、社会持续稳定的国家。然而正当墨西哥率先进入经济增长的日子里，南方清脆的枪声震惊了全国上下。

1994年元旦，上千名“查巴塔民族解放军”武装人员在恰帕斯州发起暴动，一度占领了圣克利斯托瓦尔等数座城镇。暴动者发表了印第安人“战争宣言”，宣称他们被迫“揭竿而起，反对政府当局多年来对印第安人不宣而战的战争”，表示要为“工作、土地、住房、食物、独立、自由、正义与和平”而斗争，为印第安人民的权益而斗争。暴动者与政府军一度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恰帕斯危机的爆发，引起墨西哥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墨西哥各在野党、宗教及社会团体纷纷表示反对用暴力解决社会问题，要求“政府和军队保持克制态度，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墨西哥议会正式呼吁“武装集团放下武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许多欧美国家表示反对墨西哥用武力解决冲突；美洲国家组织也发表声明，表示愿在冲突双方之间进行斡

旋。在各阶层努力之下，政府和起义者作出了和平谈判的姿态。

恰帕斯危机是极具典型性的。恰帕斯州是墨西哥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州，也是最贫穷的州之一。全州人口超过 320 万，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文盲率居全国之首。该州的教育、卫生、供电等条件极差，一半以上的土著人处于赤贫状态。以此观之，恰帕斯危机并非偶然，同时也给其他拉美国家敲响了警钟。

在拉美，农业经营的失败造就了 2000 万无地农民，有 56% 的农民家庭生活生活在贫困之中。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调查，拉美各国农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绝大多数国家需进口粮食；到 90 年代初，玻利维亚有 97% 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秘鲁、巴西则分别为 75% 和 73%；拉美地区处于贫困中的农民超过 7000 万。

“只要存在极端贫困，就不会有持久的社会稳定。”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过程中，拉丁美洲的步履显然要沉重得多。

4. 安第斯之魂——经济一体化

面对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拉美各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欧洲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已具雏型的亚太经济圈已林立世界之时，拉美各国普遍感到势单力薄，难以在强大的国际经济集团之中立足，他们认为，只有走经济一体化之路，以集体的经济实力打入国际市场，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正如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指出的，“拉丁美洲应实行新型一体化，以立足于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拉美各国应在自我援助上作出更大的努力。”这意味着拉美国家将进行宏观经济的协调，统一共同的利益，减少内部贸易壁垒，创造良好的投资与合作环境。但是，由于拉美国家独立经济，政治环境又不尽相同，在短时期内建成一个统一的拉丁美洲共同市场并非易事；因此，拉美各国主要通过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小地区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等形式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

到九十年代，拉美各国所形成的一体化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1) 自由贸易区。1990 年 6 月，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五国总统会晤，决定逐步取消各国之间的关税，到 1992 年建立起“中美洲自由贸易区”，保障成员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及成员国间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 共同市场。由 5 个安第斯国家组成的安第斯条约组织以减少对外依附为主要目标。协调集团内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外贸、外资政策，制定和实施一体化的工业、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内部免除关税，对外则实行共同关税。按照安第斯集团的计划，第一步到 1992 年 5 月确定 5 国对外的共同关税；第二步是在 1995 年取消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关税；第三步是到 1999 年建立“安第斯共同市场”。另外，由十三个加勒比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加勒比共同体”也以建立共同市场、协调对外政策为宗旨，并在逐步降低成员国关税、增加区域间经济往来、筹建加勒比开发银行等方面采取了实际步骤。13 国一致同意于 1993 年建立“加勒比共同市场”。另外，“南锥一体化组织”五国：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也在双边与多边谈判中取得较大进展。一致同意在 1995 年底完全取消相互间的关税。

(3) 部分经济优惠性组织。如以拉美自由贸易协会为前身的“拉美一体化协会”，以推动和协调双边和多边贸易，开展经济合作，争取建立拉美共

同市场为目标，目前正致力于消除拉美国家间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完成渐进式的一体化进程。

(4) 单项原料生产和出口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铜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拉美能源组织，国际铝土生产国协会，香蕉出口国联盟，拉美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协会，拉美咖啡多国组织以及拉美国家石油互助协会等。这些组织在维护拉美国家的经济权益、协调单项出口商品贸易条件、对消费国采取一致行动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5) 地区性开发组织。由阿根廷、巴拉圭等五国组成的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的宗旨是共同利用这一水域的水利资源和其他资源，促进各成员国在运输、水力发电、发展地区工业、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合作。由巴西、圭亚那和苏里南等八国组成的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的目标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地域联系，共同在亚马逊河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保护生态环境，兴建交通和通讯设施等。

(6) 一般协调性组织。如拉美经济体系，这个由二十五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旨在推动地区内合作以加速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并通过常设机构协调拉美各国在国际机构、国际会议或对第三国和国家集团采取共同的立场和社会经济战略。它的行动以独立、主权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为原则，并尊重本地区内的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

(7) 多国公司。如安第斯多国公司、拉美多国肥料销售公司和咖啡生产销售公司等。这些多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跨国公司在生产运输和销售领域的垄断，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地位。

近年来，随着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合作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主要的合作方式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贸易协定，可分为供应协定和贸易优惠协定。前者如阿根廷向巴西、巴拉圭、智利和秘鲁供应小麦的协定，玻利维亚向阿根廷供应天然气的协定，牙买加向委内瑞拉提供铝土的协定等。后者如洪都拉斯同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签署的地区优惠协议；巴拿马同中美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部分相互优惠关系等。此间最著名的是 1990 年 7 月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和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计划在 1994 年底之前建立阿根廷—巴西共同市场。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互惠贸易发展非常迅速，1990 年的贸易额达到 24 亿美元。

第二，经济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涉及通讯、运输、金融、工业和科技等领域。阿根廷和巴西是两个最热心于签署这类合作协议的国家。

第三，信贷协议。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提供进口石油的买方信贷；阿根廷和巴西向其他拉美国家提供用于出口资本品或制成品的双边信贷协议；此外，还有通过提供贷款以资助基础工程的建设。如阿根廷和巴拉圭之间、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巴西和巴拉圭之间在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上修建的两国水电工程；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修建的把玻利维亚的煤气输往这两个邻国的煤气管道工程等。

第四，共同计划。

共同开发边境地区共享的天然资源。如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搞的水电工程计划；秘鲁和厄瓜多尔关于利用普扬多—通贝斯河流域水利资源的协议；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合作经营乌苏马辛塔河地区的协议等。

开发不可更新的资源，组织单个国家无力进行的生产。如牙买加和墨

西哥关于开采铝土矿的协议；中美洲国家联合开发洪都拉斯奥兰乔的松树林以生产纸浆的计划等。

第五，技术合作。这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合作领域，协议形式可分为双边和多边两大类。多边技术合作，通过建立一系列地区性机构来完成。如，在运输领域，成立了拉美铁路协会、拉美公路运输协会和拉美装配协会等。在金融领域，建立了拉美金融机构协会、拉美银行联合会等。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设立了拉美工业协会、拉美罐头工业协会、拉美钢铁协会、拉美旅游组织联合会等。拉美各国利用这些机构进行合作形式的技术合作、交流信息和经验。

第六，直接投资。这种投资一般采用多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形式，即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外国集团同本地投资集团合营，一般以本地资本占多数。

第七，生产者协会。其目的是交流信息，进行技术合作，提高生产国的谈判能力以捍卫销售价格。

拉丁美洲虽然国家和地区林立，但是由于语言、习惯和民族、种族构成的相近，在民族文化上有团结一致、互相合作的传统。在拉美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大国帮助小国，富国支持穷国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典范。例如，安第斯集团在卡塔赫纳协议中对经济上较落后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作了一些优惠规定。同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于1980年达成《圣何塞协议》，决定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提供帮助。根据这一协议精神，两国把向这一地区出口石油收入的30%（约7亿美元）作为优惠贷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委内瑞拉设立了“加勒比特别基金，以推动本国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计划。1987年，哥伦比亚同海地签订了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双边合作协议。秘鲁同玻利维亚达成了有关边界地区一体化的21项决议等。这些经济合作协议和一般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不同，不带有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具有深厚的“拉美人民皆兄弟”的无私精神。

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发生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一体化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在马岛争端中，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封锁，使拉美各国对美国标榜的“泛美主义”失去了信心。正如经济学家沃尔特·哈尔斯坦指出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一元性和多层次性。它的实质是经济的，但其条件是政治的。政治若不以经济为支柱，只能是一句空话；但若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走不多远就会遇到障碍和利益冲突。拉美国家从中美洲冲突和马岛战争中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逐步向政治、经济一体化方向前进。

1983年1月，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四国外长在巴拿马孔塔多岛举行会晤，为解决中美洲冲突发表了《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纪要》，其宗旨是维护民族自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这就是著名的孔塔多拉精神。此次会议标志着拉丁美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屈从于任何西方大国经济、政治压力，以谈判和对话寻求和平与发展的政治集团——孔塔多拉集团。1985年7月，巴西、阿根廷、秘鲁和乌拉圭四国在利马开会，成立支持集团，维护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此后，拉美国家间许多冲突与矛盾的解决，都是围绕孔塔多拉集团或是按照孔塔多拉精神解决的。在孔塔多拉精神的基础上，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于1987年2月提出了推动中美洲各国的冲突各方实行停火、对话、民主和自由选举为宗旨的和平计划。随后，

中美洲五国总统于同年 8 月 7 日签署了第二个埃斯基普拉斯协议，体现了各国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政治意图。为了加强拉美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并使之制度化，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支持集团的代表于 1986 年 12 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八国集团（又称“里约集团”）和定期召开八国总统会议。1987 年 11 月，首届八国总统会议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城顺利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和平、发展和民主的阿卡普尔科协议》，阐明了八国对拉美的和平、发展和民主等重大问题的立场，重申了它们对拉美一体化的义务，在拉美国家中引起巨大反响。1988 年 10 月，里约集团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研究讨论成员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采取的共同战略和联合行动，发表了《乌拉圭宣言》。1989 年和 1990 年 10 月，里约集团又召开两次首脑会议，发表了《伊卡宣言》和《加拉加斯声明》，再次强调了政治联合和经济合作的决心，并为促进拉美一体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此时，里约集团的成员国也由原来的八国增加到十三国。

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日渐成熟，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必将看到一个“能意识到共同命运的新美洲”。

五、发展不再是梦想——二十一世纪的呼唤

世纪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尽管贫穷、疾病、无知、饥饿仍然在困扰着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而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地迎着从东方升起的那一轮新的太阳。也许明天会更好，正是这一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把人类从愚昧和野蛮带向了文明的繁荣；也正是这一永不低头的勇气，促使一代又一代富于创造力的人用双手雕琢出这伟大而又灿烂的人类文明。

无论是穷困还是富裕，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具有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们终将携手走向新的世纪。

拉丁美洲，这块神奇的土地，她所孕育的绝不仅仅是奔涌的石油、墨绿的森林、绚丽的黄金、喷香的咖啡；她赋予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拉美人民火一般的热情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贫穷、饥饿、不平等不属于这块土地，发展指日可待。

抛开经济学的一切模型和假设，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或许有一天会有诸多的经济学家总结出拉丁美洲发展的种种“秘诀”，正如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总结她贫困的根源一样，但是，让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看一看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波光鳞鳞的墨西哥湾，一望无垠的潘帕斯草原，一泻千里的亚马逊河……所有的人都会由衷地慨叹

让经济学家们饶舌的证明见鬼去，我只知道，如此伟大的土地没有理由不享有繁荣！

让历史作证。

主编后记

读者朋友们，当您步入中华文明那金碧辉煌的千年古殿对，您一定会梦回秦时月、汉时关，感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但当您暮然回首，放眼世界之际，你会在猛醒后看见，一个个优秀民族正巍然挺立于五洲之上，以强劲的生产力创造着崭新的现代文明和人间奇迹。这时，您不禁惊叹：我们要向世界学习！

向世界学习，这正是《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的要旨。

也许您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这套丛书呢？这还要从一个故事说起。清末年间，一个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考察，他走遍了中国的乡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褴褛、神情憨直、无知无识的国人，他极为失望他说，“中国没有文化！”后来，法国传教士来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热情款待。当他走进朱廊画壁、匾额高悬、古色古香的豪华餐厅，品尝着精美绝伦、丰盛无比的中国菜肴，听着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般的高谈阔论，他又感叹说：“中国太有文化了！”这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它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在一个小圈子里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没有普及开来，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可见，中国的文化分配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二元文化结构至今也没有改变。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民族素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的文化教育还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普遍提高，中国是很难真正强大起来的。

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一点实事，这正是我们编著这套丛书的目的。

我们是学子，不是先知。但沉甸甸的民族责任心告诉我们，经世致用是学问的根本。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向社会推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有益读物，这也是我们的时代责任。

这套丛书承蒙学界泰斗、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丛书编辑部主任吴振录老师的大力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初出茅庐，可谓鹰隼试翼，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乞读者见谅。

张晓

